

权力的脸谱：民粹主义如何塑造 我们的世界

猪刚鬣

2025 年 6 月 25 日

目录

引言：群众的怒吼	xi
第一部分 沃土——旧秩序为何崩裂	1
第一章 破碎的承诺：全球化的幽灵	3
1.1 “历史终结论”下的玫瑰色图景：全球化的黄金承诺	4
1.2 看不见的代价：被遗忘的角落与无声的怨愤	5
1.2.1 锈迹斑斑的工业带：去工业化的浪潮与失落的社群	5
1.2.2 机器的进击：自动化焦虑与技能的贬值	6
1.2.3 停滞的阶梯：中产的困境与日益扩大的鸿沟	7
1.3 致命一击：2008，信任堤坝的崩塌	8
1.4 “我们”与“他们”：精英的盛宴与民众的账单	9
1.5 案例聚焦：大西洋两岸的经济怒火——特朗普与英国脱欧	10

1.5.1	“让美国再次伟大”：铁锈地带的呼喊 与特朗普的崛起	10
1.5.2	“夺回控制权”：英国脱欧背后的经济 账本与民怨	11
1.5.3	共同的旋律：对失落的经济主权和尊 严的追寻	12
1.6	结语：怨恨的沃土与民粹的幽灵	13
第二章	失落的部落：身份与怀旧的政治	15
2.1	脚下的大地在移动：人口变迁与文化恐慌	16
2.2	昨日重现：怀旧的魔力与想象的共同体	19
2.3	故土的陌生人：当“我们”不再是中心	21
2.4	案例聚焦：欧洲文化保卫战的前线——勒庞 与德国选择党	22
2.4.1	法国的“去妖魔化”与文化壁垒：玛 丽娜·勒庞的国民联盟	23
2.4.2	德国的“主导文化”与历史修正：德 国选择党（AfD）	24
2.5	结语：当经济与文化怨愤共振	25
第三章	空悬的王座：主流政治的失灵	27
3.1	大趋同：当左右不再分明	28
3.2	“政治阶层”：一个自我封闭的特权世界	30
3.3	案例聚焦（一）：意大利——旧体系的崩塌与 “五星”的升起	32
3.4	案例聚焦（二）：巴西——腐败丑闻铺就的威 权之路	34

3.5	结语：被遗弃的权力真空	36
 第二部分 剧本——全球民粹主义操盘手		39
 第四章 右翼民族主义者：特朗普与英国脱欧派		41
4.1	剧本第一幕：绕过守门人——媒体的武器化	42
4.1.1	特朗普的“组合拳”：真人秀的狂欢与推特的战争	42
4.1.2	英国脱欧派的“立体战”：红色巴士的视觉轰炸与小报的舆论合奏	44
4.2	剧本第二幕：语言的魔力——“我们”与“他们”的创世神话	46
4.2.1	塑造“我们”：为“被遗忘的人民”加冕	47
4.2.2	定义“他们”：一个不断扩大的敌人名单	48
4.3	剧本第三幕：比较视角——独角戏与大合唱	50
4.3.1	个人崇拜的“独角戏” vs. 理念驱动的“大合唱”	51
4.3.2	体制外的“颠覆者” vs. 体制内的“叛乱者”	51
4.3.3	殊途同归：共享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内核	52
4.4	结语：剧本的胜利与民主的警钟	53
 第五章 非自由民主派：欧尔班的匈牙利		55
5.1	从自由斗士到非自由建筑师：欧尔班的蜕变	56
5.2	系统性“捕获”国家机器：欧尔班的权力巩固剧本	57

5.2.1	修改宪法：重塑国家基石	57
5.2.2	安插亲信，掌控法院：司法独立之殇	58
5.2.3	控制媒体：塑造“我的事实”	58
5.2.4	污名化公民社会：压制异见	59
5.2.5	操纵选举制度：确保长期执政	60
5.3	国际舞台上的“孔雀开屏”：对内宣传与对外挑战	60
5.4	有耐心的民粹主义者：欧尔班与特朗普的对比	61
5.4.1	战略与混乱：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62
5.4.2	制度的韧性与制度的捕获	62
5.4.3	为何欧尔班模式更具吸引力？	63
5.5	非自由民主的未来：对全球的警示	64
第六章	强人救世主：莫迪与杜特尔特	65
6.1	剧本第一幕：混乱的舞台与秩序的承诺	66
6.1.1	菲律宾的“罪恶之城”	66
6.1.2	印度的“政策瘫痪”与巨人苏醒的渴望	67
6.2	剧本第二幕：领袖即国家——一个人崇拜的精心构建	69
6.2.1	莫迪：从“人民公仆”到“世界导师”	69
6.2.2	杜特尔特：“父亲迪贡”与街头硬汉	70
6.3	剧本第三幕：划分敌我——用身份政治巩固权力	71
6.3.1	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剧本	72
6.3.2	杜特尔特的“反毒品”十字军东征	73
6.4	比较视角：为何此模式在发展中民主国家尤为盛行？	74
6.5	结语：救世主的代价	75

目录	vii
第七章 左翼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遗产	77
7.1 剧本分析：反帝国、反新自由主义的救赎史诗	78
7.1.1 第一幕：定义敌人，团结人民	79
7.1.2 第二幕：夺回主权，掌控命脉	80
7.1.3 第三幕：财富再分配，收买人心	81
7.2 比较视角（一）：查韦斯的遗产——当救赎走向毁灭	82
7.2.1 风险一：资源诅咒与经济的“荷兰病”	82
7.2.2 风险二：制度的腐蚀与威权主义的降临	83
7.3 比较视角（二）：AMLO 的“第四次转型”——左翼民粹主义的 2.0 版？	84
7.3.1 差异一：经济上的审慎与务实	85
7.3.2 差异二：对制度的“蚕食”而非“摧毁”	86
7.4 结语：永恒的诱惑，内在的风险	86
 第三部分 后果——民粹主义时代下的生活	 89
第八章 对真相的战争：从“假新闻”到“我的事实”	91
8.1 第一前线：处决信使——对“主流媒体”的系统性攻击	92
8.2 第二前线：罢黜专家——对知识权威的全面否定	94
8.3 构建另类现实：阴谋论的生态系统	96
8.4 心理的诱惑：我们为何渴望“我的事实”	98
8.5 结语：破碎的镜子	100

第九章 分裂的社会：“我们”的崩解	103
9.1 信任的消解：当同胞变成“敌人”	104
9.1.1 从政治对手到“人民公敌”	105
9.1.2 从媒体批评到“真相之战”	106
9.1.3 从社会多元到身份对立	107
9.2 政治极化：失去共同的“对话空间”	108
9.2.1 观点两极分化，中间派消失	108
9.2.2 “回音室效应”与“信息茧房”	109
9.2.3 污名化与人身攻击	110
9.3 社区崩解：日常生活中的“敌我”逻辑	110
9.3.1 邻里关系中的政治隔阂	111
9.3.2 家庭内部的政治战争	111
9.3.3 公民参与的“阵营化”	112
9.4 情感与心理代价：生活在“分裂”的阴影下	113
9.4.1 焦虑与恐惧	113
9.4.2 愤怒与仇恨	113
9.4.3 无助与绝望	114
9.4.4 身份认同的困惑	114
9.5 结语：守护共同的“我们”	114
第十章 失序的世界：从联盟到“本国优先”	117
10.1 旧秩序的基石：从废墟中崛起的全球共识	118
10.2 “本国优先”的利刃：对国际秩序的切割	120
10.2.1 案例聚焦（一）：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从盟友到交易对象	120
10.2.2 案例聚焦（二）：英国脱欧——一场自我放逐的“主权至上”实验	122

10.3 失序的涟漪：全球性挑战下的无力	123
10.3.1 气候变化的“拖延症”：	125
10.3.2 从多边主义到交易主义：	125
10.4 旧秩序的裂缝与民粹主义的趁虚而入	126
10.5 结语：碎片化的未来与共同的命运	127

第四部分 十字路口——民主的应对与权力的未来 129

第十一章 中间派能否守住阵地？建制派的反击 131

11.1 策略一：“卫生隔离带”——筑起高墙的原则 与困境	133
11.1.1 案例：德国的“防火墙”——历史记 忆与现实挑战	133
11.1.2 案例：隔离带的崩塌——瑞典与荷兰 的现实选择	135
11.2 策略二：“议题吸纳”——偷走对手的雷声 .	136
11.2.1 案例：奥地利的“神童”与丹麦的“左 转”	137
11.2.2 案例：英国保守党的“豪赌”	138
11.3 策略三：“另类愿景”——点燃一盏新的希望 之灯	139
11.3.1 案例：2017 年马克龙的“奇迹” . .	139
11.3.2 案例：拜登的“灵魂之战”	141
11.4 结语：没有灵丹妙药，唯有漫长而艰难的跋涉	142

第十二章 自下而上的力量：抵抗的崛起	145
12.1 草根社会运动：街头与数字空间的呐喊 . . .	146
12.2 独立新闻工作者的坚韧：在“后真相”时代 守护事实	150
12.3 公民社会组织：法律战线与倡导阵地	152
12.4 民主的韧性：每一次行动，都激起反作用力	155
12.5 结语：历史的终结之终结	157
结语：历史的终结之终结	159
12.6 整合升华：一场对现代性的全面反叛	161
12.7 未来框架：排他性民粹主义 vs. 包容性民主	163
12.8 致读者：在破碎的镜子前，成为一个清醒的 参与者	165
附录	169
12.9 术语解释 (Glossary)	169
12.10 建议阅读书目 (Suggested Readings)	178

引言：群众的怒吼

2021 年 1 月 6 日，华盛顿特区，寒风凛冽。但比天气更冰冷的，是弥漫在美国政治心脏的惊骇与暴戾。数以千计的民众，挥舞着各式旗帜，高喊着口号，如潮水般冲向国会山——那座平日里象征着美式民主庄严与秩序的殿堂。他们砸碎玻璃，推倒路障，与警察激烈冲突，冲进议事大厅，试图阻止一场他们坚信被“窃取”的总统选举结果的认证。摄像机镜头捕捉到一张张愤怒、迷茫甚至狂喜的面孔：有人头戴牛角帽，身披兽皮，如同原始部落的萨满；有人身着迷彩服，手持束缚带，仿佛城市游击队员；更多的人，则是平日里看似普通的美国公民，此刻却化身为“爱国者”，誓要“夺回”他们的国家。这场“勤王风暴”震惊了世界。电视屏幕前，全球的观众目睹了超级大国民象征的陷落，建制派政治家们语无伦次地谴责，评论员们则努力寻找恰当的词汇来形容这超现实的一幕——这是暴动？是政变未遂？还是一场失控的政治嘉年华？

而在大洋彼岸，或是在同一片土地的不同角落，类似的场景以不同的面貌上演。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

集会现场，往往是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汇聚的海洋。支持者们头戴印有他头像的帽子，挥舞着橙色的旗帜，聆听着他充满力量的演说，眼神中充满了近乎宗教般的虔诚与狂热。他们相信，莫迪是那个能带领印度走向伟大复兴的强人，是那个能涤荡腐败、捍卫印度教特性、让普通人扬眉吐气的领袖。这种原始的、喷薄欲出的集体能量，与那些在达沃斯论坛上讨论全球治理、在联合国会议厅里协商国际规则、在顶级学府里分析数据模型的精英们的冷静、理性与程序化形成了鲜明，甚至有些刺眼的对比。当“群众”以如此粗粂、直接、甚至破坏性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意志时，那些习惯了在既定框架内运作的建制派精英们，往往只剩下困惑、错愕，以及一种深切的无力感。

这便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困惑的谜题之一，也是本书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在一个全球化联系空前紧密、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类社会似乎正朝着更开放、更理性、更包容方向迈进的时代，为何来自截然不同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迥异的国度——从西方老牌民主国家到亚洲新兴经济体，从欧洲福利国家到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会同时将他们的选票、他们的信任、他们的希望，投向那些言辞激烈地抨击“体制”、不遗余力地寻找“替罪羊”、甚至公然挑战自由民主制度根基的领袖？

我们曾被告知，历史已然“终结”于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的胜利；我们曾相信，互联网会打破信息壁垒，让沟通更透明，让社会更扁平；我们曾期望，经济全球化会带来共同繁荣，弥合分歧。然而，现实却展现出另一幅图景：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我们”与“他们”的尖锐对立，阴谋论像病毒

一样传播；经济增长的果实分配不均，加剧了社会内部的断裂感；曾经被视为普世价值的民主规范和人权理念，在一些地方正受到前所未有的侵蚀。那些承诺“让国家再次伟大”、“夺回控制权”、“将权力还给人民”的口号，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魔力？那些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将特定群体妖魔化、将自身塑造为“人民唯一代言人”的政治人物，为何能够赢得如此广泛的拥趸？他们究竟触动了现代人心灵深处的哪一根弦？是经济的困顿、身份的焦虑、文化的失落，还是对现有政治秩序的彻底绝望？或者，是这一切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难以抗拒的时代暗流？

这股暗流，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粹主义”。它如同一个幽灵，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游荡，时而以左翼的面目出现，时而以右翼的姿态登场；时而表现为温和的抗议，时而演变成激烈的冲突。它让一些人欢欣鼓舞，看到了变革的希望；也让另一些人忧心忡忡，预感到混乱的降临。理解这股力量，剖析其运作的逻辑，洞察其带来的影响，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课题。

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尝试揭开“民粹主义”这个词语的神秘面纱。它几乎是当今政治评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同时也可能是被误解最深、被滥用最多的概念。媒体报道中，它常常被随意地贴在各种不满现状的政治运动或风格激进的政治人物身上，有时甚至被用作一个含义模糊的贬义标签，等同于煽动、非理性或反智。然而，简单地将其污名化，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和广泛影响。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民粹主义并非一种像社会主义、自

由主义或保守主义那样内容完整、体系严密的意识形态。它没有一套固定的政策纲领，比如对于税收应该多高、福利应该多广、或者国家应该如何干预经济等具体问题，民粹主义者内部可能存在巨大分歧。你很难找到一本类似《民粹主义宣言》的经典著作，系统阐述其核心教义和政治蓝图。相反，正如许多政治学者所指出的，民粹主义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政治逻辑**、一种**修辞风格**，或者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它像一个“空心”的框架，可以被不同内容所填充，可以与各种具体的意识形态相结合。

那么，这种政治逻辑的核心是什么呢？简而言之，民粹主义将社会想象成两个同质化且相互对抗的阵营：一方是“**纯洁的、统一的人民**”（the pure, unified people），另一方是“**腐败的、自私的精英**”（the corrupt, selfish elite）。民粹主义者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一场“人民”与“精英”之间不可调和的道德斗争。“人民”被描绘成勤劳善良、拥有常识、代表着国家真正意志和核心价值的沉默大多数；而“精英”则被指责为脱离群众、道德败坏、滥用权力、只顾自身利益，甚至与外国势力勾结，出卖国家和人民。民粹主义领袖则将自己定位为“人民”的唯一真实代表，是那个能够倾听“人民”心声、为“人民”代言、带领“人民”从“精英”手中夺回权力的救世主。

这种“人民 vs 精英”的二元对立叙事，具有极强的道德感召力和情感动员力。它将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简化为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为那些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感到失落、困惑和愤怒的民众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框架和情感宣泄的出口。它告诉人们：你们的困境不是你

们的错，也不是因为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而是因为有一小撮坏人窃取了本该属于你们的东西，背叛了你们的信任。

正是因为其“空心”的特性，民粹主义的逻辑可以灵活地嫁接到不同的具体议程之上，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当它与**左翼**的议程相结合时，通常表现为**经济民粹主义**。此时，“人民”主要指那些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劳动者、失业者或穷人，而“精英”则指向大资本家、金融寡头、跨国公司以及维护其利益的建制派政客。左翼民粹主义者承诺进行财富再分配，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保护本国产业和工人免受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强调社会公平和经济正义。拉丁美洲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这类民粹主义浪潮，近年来在一些西方国家，呼吁关注贫富差距、反对紧缩政策的运动中，也带有经济民粹主义的色彩。

而当它与**右翼**的议程相结合时，则更多地表现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或**文化民粹主义**。此时，“人民”通常被定义为特定民族、种族或文化群体的“土著”成员，他们被认为是国家特性和传统价值观的承载者。而“精英”则被指责为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纵容移民、向超国家机构（如欧盟）让渡主权，从而削弱了国家认同和文化纯洁性的“世界主义者”或“全球主义者”。右翼民粹主义者往往强调国家主权至上，主张限制移民，捍卫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并对少数族裔、外来者或被视为“非我族类”的群体持排斥态度。近年来在欧美国家兴起的许多民粹主义运动，大多属于这一类型。

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民粹主义者都倾向于宣称自己掌握着“人民的共同意志”（general will），并以此为由，质

疑甚至否定代议制民主中的权力制衡、少数派权利、专家意见以及独立的司法和媒体监督。在他们看来，这些机制往往是“精英”用来阻挠“人民”意愿实现的工具。因此，民粹主义的兴起，不仅仅是政策偏好的转变，更可能对民主制度的运作方式和基本原则构成深远挑战。理解了民粹主义的这一核心逻辑和多变形态，我们才能更清晰地把握它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轨迹及其背后的深层动因。

为了系统地解开民粹主义的谜团，本书将分为四个部分，带领读者进行一次深入的探索之旅：

- **第一部分：沃土——旧秩序为何崩裂。**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深入挖掘现代社会中催生民粹主义需求的土壤。我们将审视全球化浪潮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如何在一些地区和人群中留下了深深的失落感和怨恨；我们将探讨身份认同的焦虑、对传统生活方式逝去的怀旧，如何在文化层面为民粹主义的叙事提供了养分；我们还将分析主流政治的失灵——传统政党为何失去民众信任，政治精英如何变得与社会脱节，从而为民粹主义者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
- **第二部分：剧本——全球民粹主义操盘手。**在这里，我们将从“为何发生”转向“如何运作”以及“关键人物是谁”。我们将开启一场全球巡礼，近距离观察不同类型的民粹主义领袖及其独特的“剧本”。从美国的特朗普、英国的脱欧派，到匈牙利的欧尔班；从印度的莫迪、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再到拉丁美洲的左翼挑战者。我们将比较他们的崛起路径、动员策略、执

政方式以及他们如何巧妙地利用媒体和民众情绪来巩固权力。

- **第三部分：后果——民粹主义时代下的生活。**民粹主义的崛起不仅仅是政治版图的重划，它对我们的社会、我们对真相的认知乃至整个国际秩序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部分将分析民粹主义如何侵蚀共享的现实基础，发动针对独立媒体和专业知识的“战争”；它如何通过“我们 vs 他们”的对立逻辑，加剧社会分裂与政治极化；以及它内向的“本国优先”倾向，如何冲击着二战后建立的全球合作体系。
- **第四部分：十字路口——民主的应对与权力的未来。**在全书的最后，我们将展望前路。民粹主义的挑战是严峻的，但并非不可逾越。我们将评估主流政治力量的应对策略，分析其成败得失；同时，我们也将聚焦来自公民社会自下而上的抵抗力量，以及民主制度本身的韧性与革新潜力。本书无意提供简单的答案或宿命的预测，而是希望通过对这场全球现象的深度剖析，为读者提供一套理解我们这个动荡时代的思想工具，帮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权力的真实面貌，更有效地参与到塑造未来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一部分

沃土——旧秩序为何崩裂

第一章 破碎的承诺：全球化的幽灵

本章论点：20 世纪末的全球经济共识创造了巨大财富，却也遗留下了一个数量庞大、心怀怨恨的群体。

当历史的钟摆迈向 20 世纪末，世界似乎正站在一个崭新纪元的门槛。柏林墙的轰然倒塌，不仅象征着冷战的终结，更仿佛为一种全新的全球秩序——一个由资本、技术和信息自由流动所主导的“地球村”——铺平了道路。这便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一个充满玫瑰色承诺的时代。人们被告知，一个更加繁荣、更加开放、更加和平的世界指日可待。然而，二十余年倏忽而过，当我们回望这段镀金的岁月，却发现炫目的光环之下，阴影早已悄然滋长。那曾经被许诺给每一个人的繁荣，似乎并没有均匀地洒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反而在一部分人心中积聚起深深的怨恨。这怨恨，如同一个无形的幽灵，在全球化的盛宴散场后，开始在曾经的沃土上徘徊，并最终为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最直接的养料。

1.1 “历史终结论”下的玫瑰色图景： 全球化的黄金承诺

让我们将时钟拨回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弗朗西斯·福山那本著名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似乎为整个时代定下了基调。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结束，自由民主制与市场经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种乐观情绪弥漫在西方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迅速向全球扩散。

“全球化”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其核心理念并不复杂：拆除国家间的贸易壁垒，让商品、服务、资本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鼓励跨国公司将生产链条延伸至成本更低的地区；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创造前所未有的财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1995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签署（1994 年），以及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都被视为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

当时的政治精英们，无论是美国的克林顿、英国的布莱尔，还是德国的施罗德，都热情地拥抱了这一趋势。他们所推行的“第三条道路”或类似的政策，试图在传统的左翼与右翼之间找到平衡，其经济政策的核心，便是对全球化市场力量的信任。跨国公司高歌猛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全球布局；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宽松的监管环境，迅速融入全球产业链，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则享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廉价商品，从电子产品到服装鞋帽，选择空前丰富。

科技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更是为全球化插上

了翅膀。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国界，世界似乎真的变小了。人们相信，这种互联互通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还能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融合，最终导向一个更加和平与理性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叙事：蛋糕会越做越大，每个人都能从中分得一杯羹，即使分配不均，增长的浪潮最终也会惠及所有人。这个承诺，如此诱人，如此不容置疑。

1.2 看不见的代价：被遗忘的角落与无声的怨愤

然而，在这幅宏大而光鲜的全球化图景之下，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早已开始浮现，只是在当时震耳欲聋的赞歌声中，它们显得微弱而被忽视。那些被全球化浪潮席卷、甚至吞噬的群体，他们的失落与怨愤，正在悄然积聚。

1.2.1 锈迹斑斑的工业带：去工业化的浪潮与失落的社群

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的加速衰退，即所谓的“去工业化”。当资本可以自由地流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那些曾经以重工业为傲的城市和地区，便首当其冲地成为了牺牲品。美国的“铁锈地带”（Rust Belt），从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到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再到底特律和密尔沃基，曾经是美国工业的心脏，机器轰鸣，烟囱林立，为一代又一代蓝领工人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和体面的生活。然而，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随着工厂的

接连倒闭和外迁，这里逐渐变得锈迹斑斑。高耸的厂房被废弃，机器蒙尘，成千上万的工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

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打击，更是一种身份的剥夺和社区的瓦解。对于那些世代在工厂工作的家庭而言，工厂不仅是谋生之所，更是他们身份认同的核心。工作的失去，意味着尊严的丧失，意味着对未来的迷茫。曾经充满活力的社区，随着年轻人的出走和商业的凋敝，逐渐失去了生机。毒品、犯罪、家庭破裂等社会问题随之而来。类似的景象，也出现在英格兰北部、法国洛林地区以及德国鲁尔区等老牌工业区。那里的人们感觉自己被时代抛弃了，被那些在光鲜亮丽的金融中心和高科技园区里指点江山的精英们遗忘了。他们的父辈曾为国家建设流血流汗，而他们却成为了全球化“成本效益”计算中的那个可以被轻易抹去的“成本”。

1.2.2 机器的进击：自动化焦虑与技能的贬值

与产业转移相伴而行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自动化浪潮。机器人、人工智能、先进的生产管理系统，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无情地取代了大量重复性的劳动岗位。这不仅仅局限于制造业，银行柜员、行政助理、甚至一些初级分析师的工作，都面临着被机器取代的风险。

对于拥有高技能、能够适应新技术需求的劳动者而言，这或许意味着新的机遇。但对于那些技能相对单一、教育程度不高的普通工人来说，自动化带来的更多是焦虑和恐慌。他们曾经熟练掌握的技艺，在一夜之间可能变得一文不值。学习新技能需要时间、金钱和机会，而这些对于一个中年失业的工人来说，往往是奢侈品。这种对“技术性失业”的

恐惧，以及感觉自身价值不断贬低的无力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底层的焦虑情绪。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未来，在那里，他们可能不再被需要。

1.2.3 停滞的阶梯：中产的困境与日益扩大的鸿沟

全球化承诺的“共同繁荣”并没有完全兑现。虽然全球范围内的绝对贫困有所减少，但在许多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却在持续扩大。数据显示，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部分发达国家最顶层 1% 人群的收入和财富占比急剧上升，而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的实际收入却长期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

中产阶级，这个曾经被视为社会稳定基石的群体，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发现，维持父辈那样的生活水平变得越来越困难。房价高企，教育和医疗费用不断上涨，而工资却原地踏步。曾经清晰可见的向上流动的阶梯，似乎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断裂。他们努力工作，遵守规则，却发现自己离“美国梦”或类似的国家梦想越来越远。

与此同时，那些在全球化浪潮中如鱼得水的金融精英、跨国公司高管和科技新贵们，却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普通民众渐行渐远，仿佛生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这种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以及随之而来的机会不均等，侵蚀着社会的公平感和凝聚力。“我们”与“他们”的鸿沟，不仅体现在财富上，更体现在认知和情感上。

1.3 致命一击：2008，信任堤坝的崩塌

如果说去工业化、自动化焦虑和中产阶级困境是全球化背景下缓慢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那么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则像一颗引爆了所有潜藏不满的炸弹，彻底击垮了普通民众对现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信任。

这场源自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海啸，迅速席卷全球，将世界经济拖入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银行倒闭，股市暴跌，企业大规模裁员，无数普通家庭失去了毕生积蓄、住房和工作。然而，令人错愕和愤怒的是，那些制造了这场危机的金融机构高管们，大多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是一些“大到不能倒”的银行，动用了纳税人的巨额资金进行纾困。

“华尔街的贪婪，纳税人买单”，这句口号精准地捕捉了当时弥漫在社会中的普遍情绪。人们看到，在危机面前，精英阶层似乎总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普通民众则只能默默承受代价。政府的救援行动，在许多人看来，不是为了保护普通储户和投资者，而是为了维系那个制造了问题的腐败系统。这种强烈的被背叛感和不公正感，是前所未有的。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不仅暴露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监管的缺失，更重要的是，它彻底动摇了自冷战结束以来建立的所谓“精英共识”的合法性。人们开始质疑：那些信誓旦旦承诺会带来普遍繁荣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和金融家们，究竟是无能，还是根本就不在乎普通人的死活？信任的堤坝一旦崩塌，便很难修复。怀疑和愤怒的种子，开始在更广泛的人群中生根发芽。

1.4 “我们”与“他们”：精英的盛宴与民众的账单

金融危机的冲击，叠加此前数十年积累的经济结构矛盾，共同催生了一种强烈的社会情绪：这个世界被一小撮“精英”所操纵，他们制定规则，攫取利益，而把代价和风险转嫁给“人民”。

这种“我们”（the people）与“他们”（the elite）的二元对立叙事，在全球化的“输家”和感觉被剥夺的群体中找到了广泛的共鸣。这里的“精英”，指向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跨国公司的 CEO，也包括身居高位的政客、主流媒体的记者编辑、甚至大学里的专家学者。在许多普通人看来，这些人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自利的“建制派”，他们说着普通人听不懂的行话，享受着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特权，却对普通人的疾苦漠不关心。

全球化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大部分流向了这些人。当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时，他们却在讨论自由贸易的宏观效益；当自动化让一些人失去工作时，他们却在赞美技术进步的伟大；当中产阶级为生活苦苦挣扎时，他们却在达沃斯论坛上举杯庆祝全球经济的融合。这种认知上的巨大鸿沟，使得“精英”与“民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普通民众感觉自己的声音被淹没了，自己的诉求被忽视了。他们厌倦了主流政党那些陈词滥调式的承诺，厌倦了专家们那些脱离现实的分析。他们渴望有人能站出来，替他们说出不满和愤怒，挑战那个看似坚不可摧的“体制”。这种普遍的观感——精英阶层攫取了大部分利益，而

普通民众却在承担代价——为民粹主义领袖的登场铺平了道路。他们将以“人民的代言人”的姿态出现，承诺要将权力从“腐败的精英”手中夺回来，还给“真正的人民”。

1.5 案例聚焦：大西洋两岸的经济怒火 ——特朗普与英国脱欧

2016年，大西洋两岸接连发生的两件政治“黑天鹅”事件——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Brexit）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震惊了世界，也集中展现了积压已久的经济怨愤所能爆发出的巨大能量。尽管两者的具体背景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其背后都涌动着相似的经济叙事逻辑。

1.5.1 “让美国再次伟大”：铁锈地带的呼喊与特朗普的崛起

唐纳德·特朗普，一个毫无从政经验的房地产大亨和电视真人秀明星，却奇迹般地赢得了2016年美国大选。他的核心支持者，很大一部分便来自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备受打击的“铁锈地带”和传统制造业地区的白人蓝领阶层。这些人，曾经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拥有稳定的工作、体面的收入和强烈的社群认同感。然而，数十年来的工厂外迁和自动化浪潮，让他们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往日的荣光。

特朗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群体的失落与愤怒。他用

最直白、甚至粗俗的语言，将矛头直指他所谓的“糟糕的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和“不公平的国际竞争”（特别是来自中国和墨西哥的竞争），声称这些因素“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岗位。他承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要将制造业带回美国，要为“被遗忘的男人和女人们”夺回属于他们的未来。

他的竞选集会，往往更像是一场宣泄不满的狂欢。当他痛斥“华盛顿的沼泽”（corrupt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撒谎的媒体”（fake news media）和“全球主义精英”（globalist elites）时，台下爆发出阵阵欢呼。对于那些感觉自己被主流政治彻底抛弃的人来说，特朗普的出现，仿佛一道刺破黑暗的光。他不是一个传统的政客，他口无遮拦，他挑战政治正确，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局外人，一个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痛苦并为他们而战的“强人”。经济上的怨恨，成为了特朗普构建其民粹主义叙事的核心基石。他成功地将一群在经济上感到绝望和被背叛的选民动员起来，颠覆了传统的政治格局。

1.5.2 “夺回控制权”：英国脱欧背后的经济账本与民怨

几乎在特朗普崛起的同一时期，大洋彼岸的英国也经历了一场政治地震。在 2016 年 6 月的公投中，51.9% 的英国选民投票支持脱离欧盟。这场公投的结果，同样与深层次的经济不满密切相关。

“脱欧派”的核心论点之一，便是英国每年向欧盟缴纳巨额的成员国费用，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那个印在红色

巴士上极具煽动性的口号——“我们每周给欧盟 3.5 亿英镑，让我们把钱花在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上吧”——虽然其准确性备受争议，却成功地触动了许多英国民众的神经。他们认为，这些本应用于改善本国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资金，却被浪费在了布鲁塞尔那些遥远而官僚的欧盟机构身上。

此外，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原则，也成为经济焦虑的焦点。一些人认为，来自东欧等欧盟成员国的移民，拉低了本国低技能岗位的工资水平，并给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压力。尽管经济学家们对移民的整体经济影响看法不一，但在那些感受到竞争压力或公共服务紧张的地区和人群中，这种担忧是真实存在的。

“夺回控制权”（Take Back Control）是脱欧派最具号召力的口号。这不仅仅是指夺回政治主权，也包含了夺回对本国经济政策、贸易规则和边界的控制权。许多支持脱欧的选民，特别是来自英格兰北部和中部那些经历过去工业化阵痛的地区的人们，感觉欧盟的规则束缚了英国的发展，而脱离欧盟则可以让它们摆脱这些束缚，重振本国经济，优先照顾本国公民的利益。与特朗普的支持者类似，他们也对伦敦的金融精英和亲欧盟的建制派充满了不信任，认为这些人从欧盟成员国身份中获益，却忽视了普通民众的困境。

1.5.3 共同的旋律：对失落的经济主权和尊严的追寻

比较特朗普的胜选和英国脱欧，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共同的主线：两者都成功地利用了民众在全球化背景

下积累的经济焦虑和对精英阶层的不满。无论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是“夺回控制权”，其核心都是对一种失落的经济主权和国民尊严的追寻。

在这两种叙事中，都存在着一个“受害者”群体——那些在全球化浪潮中被边缘化、被剥夺、被遗忘的普通民众；也都存在着一个“加害者”——腐败自私的国内精英与不公平的外部力量（如其他国家、国际组织）。民粹主义领袖或运动，则将自己定位为这些“受害者”的拯救者，承诺要打破旧秩序，重建一个更公平、更符合“人民”利益的新秩序。这种基于经济怨愤的动员，具有强大的情感穿透力，因为它触及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不公正待遇的本能反抗。

1.6 结语：怨恨的沃土与民粹的幽灵

20 世纪末开启的全球化浪潮，无疑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然而，正如本章所揭示的，这场盛宴并非人人均沾。在繁荣的表象之下，去工业化的阵痛、自动化带来的焦虑、中产阶级的困境以及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共同织就了一张巨大的怨恨之网。2008 年的金融危机，则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许多人对现有体制的信任。

这片由“破碎的承诺”和普遍的经济不安全感所浇灌的土地，变得异常“肥沃”。它不再相信传统精英的陈词滥调，不再对主流媒体的报道照单全收，不再对既有的政治经济秩序抱有幻想。它渴望改变，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渴望寻

找到能够代表自身利益的强大力量。

正是这片怨恨的沃土，为民粹主义的幽灵提供了绝佳的栖身之所。那些承诺要倾听“被遗忘的人民”的声音、挑战“腐败的精英”、重建“伟大国家”的民粹主义领袖们，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纷纷登场。他们或许来自左翼，或许来自右翼，其具体的政策主张可能千差万别，但他们都精准地把握住了弥漫在社会底层的这种经济怨愤，并将其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动能。

然而，经济因素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民粹主义的崛起，同样深深植根于一种更为复杂和微妙的文化焦虑——对身份失落和生活方式受到威胁的恐惧。只有将经济的怨恨与文化的焦虑结合起来审视，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为何在 21 世纪的今天，民粹主义的浪潮会如此汹涌澎湃。全球化的幽灵，不仅在经济层面投下阴影，更在深层搅动着人们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

第二章 失落的部落：身份与怀旧的政治

本章论点：除了经济因素，民粹主义更深层地根植于一种文化焦虑——对丧失民族身份和生活方式的恐惧。

如果说上一章我们探讨的经济怨愤是点燃民粹主义烈火的干柴，那么本章将要深入剖析的文化焦虑，则是那片浸透了燃油、一触即燃的土地。当一个人的钱包变瘪时，他会感到愤怒；但当他感觉自己脚下的土地正在变得陌生，自己所珍视的传统正在消逝，甚至自己在家园中都仿佛成了一个“外人”时，他所感受到的，将是一种更为深刻、更具存在性的恐惧。这种恐惧，关乎“我们是谁”，关乎我们归属何方，关乎我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能否延续。民粹主义的操盘手们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深层的文化焦虑，并将其锻造成了比经济诉求更具凝聚力和动员力的强大武器。

在许多西方社会，尤其是在那些曾经拥有稳固主体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国家里，一种“失落的部落”情结正在蔓延。这个“部落”的成员，往往是那些在人口结构、社会规

范和文化景观的剧变中，感到被边缘化、被冒犯、被剥夺了文化主导权的群体。他们未必是经济上最贫困的人，但他们一定是文化上最失落的人。他们怀念一个想象中的“黄金时代”，并恐惧一个正在到来的、他们无法认同的未来。这种对身份的坚守和对过去的怀旧，共同谱写了一曲哀婉而愤怒的政治悲歌，而民粹主义领袖，则自告奋勇地成为了这曲悲歌的指挥。

2.1 脚下的大地在移动：人口变迁与文化恐慌

想象一下，你生活在一个你祖辈世代居住的小镇。这里的教堂钟声、街角面包店的香气、邻里间的方言问候，构成了你对“家”的全部记忆。然而，在短短一二十年间，你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在悄然改变。新的面孔越来越多，他们说着你听不懂的语言，信奉着不同的神，遵循着不同的生活习俗。老街区的店铺换上了陌生的招牌，空气中飘散着异域的香料味，学校里孩子的构成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许多欧美国家社区的真实写照。战后持续的移民潮，尤其是世纪之交后来自中东、北非和南亚等文化差异更显著地区的移民，深刻地改变了西方社会的人口版图。以法国为例，据估计其人口中拥有穆斯林背景的比例已接近 10%；在德国，2015 年难民危机一年之内就涌入了超过一百万寻求庇护者；在美国，拉美裔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白人人口比例的相对下降，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对于信奉多元文化主义的城市精英和知识分子而言,这或许是社会充满活力和包容性的体现。然而,对于那些身处变化第一线的本地居民,尤其是教育程度不高、流动性不强的中下层民众来说,这种变化带来的感受远比“多元”一词复杂得多。它首先带来的是一种物理空间上的“被侵占感”。他们感觉自己的社区、自己的城市,正在变得不再“属于自己”。这种感受与经济上的竞争(如担心移民抢走工作、拉低工资)交织在一起,但其核心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不安。

这种不安,在法国极右翼作家雷诺·加缪(Renaud Camus)提出的“大置换”(Le Grand Remplacement)阴谋论中得到了最极端的表达。该理论声称,欧洲的白人基督徒人口,正在被一个由“全球主义精英”精心策划的计划所系统性地“置换”,取而代之的是非欧洲的、主要是穆斯林的移民。尽管这一理论被主流社会斥为荒谬和种族主义,但它之所以能在特定人群中产生市场,正是因为它用一种夸张、偏执的方式,说出了许多人内心深处那种模糊的恐惧:我们正在被取代,我们的文明正在消亡。

当民粹主义者谈论“失控的边境”时,他们所触动的,并不仅仅是民众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更是这种对人口结构变化所引发的文化恐慌。他们将移民描绘成一种对本土文化纯洁性和生活方式的威胁。在他们的叙事中,移民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更是文化的“他者”,是潜在的社会秩序破坏者。这种论调在那些公共服务(如学校、医院)因人口快速增长而备受压力的地区,尤其具有说服力。人们将生活质量的下降,直观地归咎于“新来的人”,而忽略了背后更复

杂的政府投资不足、政策失当等结构性问题。

与人口变迁相伴的，是社会规范的剧烈摇摆。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价值观革命：女权运动的兴起、LGBTQ+ 权益的合法化、种族平权运动的深入，以及所谓“政治正确”话语的普及。这些进步无疑推动了社会的整体文明进程，但也让一部分固守传统价值观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感觉自己遭到了冒犯和围攻。

一个信奉传统家庭观念的父亲，可能会对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感到困惑和不安；一个习惯了在男性主导环境中工作的工人，可能会对工作场所日益强调的性别平等和反骚扰规范感到束手束脚；一个在成长过程中从未被要求审视自身“白人特权”的普通人，可能会对批判性种族理论感到愤怒，认为这是在否定他个人的努力和国家的历史。

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陌生”，充满了各种需要小心翼翼遵守的规则和不容置疑的新信条。他们所熟悉的那个“正常”世界——男人养家糊口，女人相夫教子，国家以基督教文化为荣——正在被一个由“自由派精英”和“社会正义战士”所主导的新秩序所取代。他们感觉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信仰，甚至自己的语言，都被贴上了“落后”、“偏执”甚至“歧视”的标签。他们成了自己社会中的“道德少数派”，被要求为自己未经选择的身份（白人、男性、异性恋）而感到羞愧。这种被剥夺了话语权和道德制高点的感觉，是一种巨大的羞辱，也催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民粹主义者正是利用了这种逆反心理，他们公开嘲笑“政治正确”，为那些感觉被压抑的传统价值观“正名”，让那些“失落的部落”成员们感到，终于有人敢于说出他们的

“心里话”了。

2.2 昨日重现：怀旧的魔力与想象的共同体

面对一个令人困惑和不安的现在，人们很自然地会向过去寻求慰藉。怀旧，这种对逝去时光的甜美伤感，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社会情绪和政治动员工具。民粹主义者深谙此道，他们是兜售怀旧情绪的大师，承诺带领人民“回到过去”——一个被他们精心美化和浪漫化的“黄金时代”。

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堪称怀旧政治的典范。这个口号从未明确定义美国“何时”伟大以及“如何”伟大，但这正是其高明之处。它为每个心怀不满的选民都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填充的想象空间。对于“铁锈地带”的失业工人来说，“伟大”可能意味着 1950 年代工厂轰鸣、工会强大、一人工作足以养活全家的时代；对于福音派基督徒来说，“伟大”可能意味着基督教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学校里可以公开祈祷的时代；对于许多白人来说，“伟大”则可能意味着一个种族等级分明、白人文化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社会秩序井然的时代。

这个被想象出来的“伟大美国”，是一个高度滤镜化的版本。它刻意忽略了那个时代的种族隔离、性别歧视、冷战恐惧以及社会内部的种种不公。但对于那些在当今世界中感到失落的人来说，这些历史的阴暗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过去”代表了一种确定性、一种凝聚力和一种国

家自豪感，而这些，正是他们感觉当下所缺失的。

同样，英国脱欧派的口号“夺回控制权”（Take Back Control），也充满了浓厚的怀旧色彩。它唤起了一种对“日不落帝国”荣光的遥远记忆，以及对一个能够独立自主、不受布鲁塞尔“官僚”掣肘的强大英国的向往。脱欧宣传中反复出现的二战意象——敦刻尔克精神、不列颠之战——都在暗示，英国正在面临一场新的生存之战，需要再次展现其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从“欧洲大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这种怀旧叙事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为复杂的现实问题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情感解决方案。你不必去理解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不必去分析自动化对劳动力的影响，你只需要相信，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源于我们偏离了那个“伟大的过去”。只要我们能“回去”，一切都会好起来。民粹主义领袖将自己塑造成那个能够带领人民穿越时空、重返伊甸园的向导。

这种对“想象的共同体”的怀旧，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文化姿态。它试图在一个日益多元、流动和碎片化的世界里，重新划定“我们是谁”的边界。这个“我们”，通常被定义为国家的“真正”人民，是那些继承了“纯正”文化血脉的“土著”。而所有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人——移民、少数族裔、信奉“全球主义”的精英——都被视为对这个共同体的威胁。因此，怀旧政治不可避免地与排外主义联系在一起。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就必须建起高墙，阻止“他者”的涌入；要“夺回控制权”，就必须脱离那个被视为异质文化集合体的欧盟。

2.3 故土的陌生人：当“我们”不再是中心

当人口结构的变化、社会规范的迁移和对过去的怀旧这三股力量汇合在一起时，便催生一种极具政治爆发力的情感体验：感觉在自己的国家里，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这种“故土陌生人”的感觉，在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对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茶党支持者的研究中得到了深刻的描绘。她发现，这些白人保守派选民感觉自己像是在排一个长队，等待实现“美国梦”。他们遵守规则，辛勤工作，耐心等待。但他们看到，队伍移动得越来越慢，而与此同时，他们感觉有很多人——少数族裔、移民、女性，甚至濒危的棕色鹈鹕——在“插队”，在政府的帮助下跑到了他们前面。而那些制定规则的“精英”（奥巴马政府），似乎还在指责他们这些排队的人是“种族主义者”、“落后者”。

这种“被插队”的感觉，是一种深刻的地位焦虑。它不仅仅是经济地位的焦虑，更是文化和社会地位的焦虑。在过去，作为国家的主体民族和文化核心，他们是当然的“主角”，他们的价值观就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正常”的生活方式。而现在，他们感觉自己正在被推向舞台的边缘，甚至变成了故事里的“反派”。他们所珍视的一切——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爱国情怀、他们的传统家庭观——都在被解构、被批判。

这种从中心到边缘的坠落感，是难以忍受的。它带来的是一种深刻的怨恨：对那些“插队者”的怨恨，对那些帮助

“插队者”的精英的怨恨，以及对整个“不公平”体系的怨恨。他们感觉自己被背叛了，被那些本应代表他们的政治家和制度所抛弃。他们成了“失落的部落”，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寻找着身份的庇护所。

民粹主义者正是这个“失落部落”的酋长。他们告诉这个部落的成员：你们的感觉是对的。你们不是偏执狂，你们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你们的困境，不是你们的错，而是那些腐败的精英和忘恩负义的“他者”造成的。他们用“我们 vs 他们”的简单叙事，为这种复杂的文化焦虑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敌人和宣泄的出口。他们承诺要恢复这个部落昔日的荣耀，让他们重新成为国家的主人。这种承诺，对于那些感觉自己一无所有、只剩下身份认同的人来说，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2.4 案例聚焦：欧洲文化保卫战的前线 ——勒庞与德国选择党

在欧洲这片古老的大陆上，关于身份与文化的焦虑尤为突出。法国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和德国的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是两个最典型的案例，他们都将自己定位为民族文化的“守护者”，以对抗其所感知的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

2.4.1 法国的“去妖魔化”与文化壁垒:玛丽娜·勒庞的国民联盟

玛丽娜·勒庞从其父亲让-马里·勒庞手中接过“国民阵线”(后更名为“国民联盟”)的领导权后,推行了一项精明的“去妖魔化”(dédiabolisation)策略。她努力与父亲那一代人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和反犹言论划清界限,试图将该党包装成一个更温和、更“正常”的爱国主义政党。然而,其排外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内核从未改变,只是换上了一套更精致、更符合当代法国政治语境的外衣。

勒庞的核心武器,是法国独特的“世俗主义”(laïcité)原则。在传统上,世俗主义旨在确保国家的中立,将宗教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但在勒庞及其追随者的手中,它被巧妙地改造成为一把针对伊斯兰教的利剑。他们声称,穆斯林移民的某些文化习俗——例如女性在公共场合佩戴头巾(hijab)或罩袍(burqa)——与法国的世俗传统和性别平等价值观格格不入。因此,以捍卫世俗主义为名禁止这些服饰,便不再是宗教歧视,而是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的核心价值。

在勒庞的叙事中,法国正面临双重威胁:自下而上,是“失控的”伊斯兰化,它正在侵蚀法国的文化认同;自上而下,是布鲁塞尔的“全球主义”精英,他们通过欧盟的超国家权力,试图消解法国的国家主权和独特性。因此,“国民联盟”的解决方案也是双重的:对内,要严格限制移民,强化对“法国价值观”的认同,捍卫一种以美食、美酒、特定节假日和生活方式为代表的“法兰西艺术生活”(art de vivre à la française);对外,则要从欧盟手中“夺回控制

权”，恢复法国的边境和法律主权。

勒庞的言论精准地击中了法国社会中那部分对国家身份感到焦虑的群体。他们或许并不认同老勒庞的粗暴，但他们确实对社区的变化感到不安，对伊斯兰教在法国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可见度感到警惕，对法国在全球化浪潮中似乎正在失去其独特魅力而感到失落。勒庞为他们提供了一套看似“理性”和“爱国”的话语，来包装和正当化他们的文化恐惧。她告诉他们，热爱法国、希望法国“保持原样”，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而是一种值得骄傲的权利。

2.4.2 德国的“主导文化”与历史修正：德国选择党（AfD）

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则与 2015 年的欧洲难民危机密切相关。这个最初由一群反对欧元的经济学教授创建的政党，在默克尔政府决定向中东难民开放边境后，迅速转型为一个以反移民、反伊斯兰为核心诉求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与勒庞相似，AfD 也试图为自己的排外立场寻找文化上的合法性。他们提出了捍卫德国“主导文化”（Leitkultur）的口号。这个“主导文化”具体指什么，往往是模糊的，但其核心指向一个以基督教传统、德语、德国历史和特定社会规范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AfD 的领导人反复强调，“伊斯兰教不属于德国”，认为其教义和实践与德国的启蒙传统、法治精神和男女平等的价值观根本上是冲突的。

AfD 的策略比勒庞更为激进，尤其是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德国由于其纳粹历史，战后形成了一种深刻的“政治正确”，即对任何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都保持高

度警惕。AfD 则公然挑战这种禁忌。其领导人亚历山大·高兰（Alexander Gauland）曾声称，希特勒和纳粹只是德国千年辉煌历史中的“一小撮鸟屎”，意在淡化纳粹罪行，呼吁德国人摆脱历史负罪感，重新建立一种“健康的”民族自豪感。

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的言论，在德国社会引起了巨大争议，但也吸引了那些厌倦了国家“赎罪文化”、渴望德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选民。尤其是在前东德地区，AfD 的支持率异常之高。那里的民众在两德统一后经历了剧烈的社会转型，许多人感觉自己被视为“二等公民”，其在东德时期的生活经历和身份认同未得到充分尊重。AfD 成功地将这种被剥夺感和对现状的不满，引导向了对移民和“柏林精英”的愤怒。

通过将文化焦虑、历史怨愤和对建制派的不信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AfD 成功地打破了德国战后的政治共识，成为了联邦议院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向那些感觉被时代抛弃、被主流话语压制的“失落的部落”成员承诺：我们将恢复你们的文化尊严，捍卫你们的德国身份，让你们的声音重新被听到。

2.5 结语：当经济与文化怨愤共振

本章的核心在于揭示，民粹主义的崛起，远非单一的经济现象。它深深植根于同样强大，甚至更为根本的文化土壤之中。对身份失落的恐惧，对生活方式受到威胁的焦虑，以及对一个想象中“黄金时代”的怀旧，共同构成了一股强

大的社会暗流。当这股文化上的怨愤，与上一章我们所讨论的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发生共振时，其所产生的政治能量是惊人的。

一个在经济上感到被剥夺的人，同时在文化上也感觉自己成了“故土的陌生人”，他所感受到的无力感和愤怒将是双倍的。他会觉得，不仅自己的饭碗被抢走了，连自己的家园、自己的灵魂归属地也正在被侵蚀。这时，任何承诺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政治力量，都将对他产生致命的吸引力。

民粹主义领袖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他们将经济问题“文化化”（例如，将失业归咎于移民，而非自动化），也将文化问题“政治化”（例如，将社会规范的变迁归咎于“精英”的阴谋）。他们编织了一个宏大的叙事，将“纯洁的人民”所遭受的所有苦难——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文化上的——都归结为同一个敌人：那个与“外人”勾结、出卖国家利益的“腐败精英”。

理解了这层文化和身份的维度，我们才能更全面地把握民粹主义为何在 21 世纪的今天如此势不可挡。它不仅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反叛，更是一场针对后现代文化多元主义的“部落战争”。然而，这些“失落的部落”为何会感到如此孤独无助？为何在他们看来，传统的主流政党无法再为他们提供庇护？这便引出了我们下一章将要探讨的问题：主流政治的失灵，是如何为民粹主义者留下了这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让他们得以“空悬的王座”上加冕。

第三章 空悬的王座：主流 政治的失灵

本章论点：民粹主义者并非凭空崛起，他们填补的是因信誉扫地和反应迟钝的主流政党所留下的政治真空。

想象一个古老的王国。宫殿依然富丽堂皇，国王头戴王冠，身披紫袍，但他的臣民在私下里却用嘲讽的语调谈论他。他们知道，国王的决策不再是为了王国的福祉，而是为了维系他与一小撮贵族的奢华生活；他们看到，法官的判决可以被金钱左右，将军的忠诚可以被权力收买。国王的命令仍在颁布，但已无人真心信服；王国的法典依然存在，但已沦为一纸空文。这顶王冠虽然还在国王头上，但它所象征的权威与信任早已荡然无存。王座，实际上已经空了。它只是在等待一个足够大胆的人，一个宣称能代表人民真正意愿的人，走上前去，将它据为己有。

这便是 21 世纪初许多国家政治图景的真实写照。在我们剖析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怨愤和身份认同引发的文化焦虑之后，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故事的第三个，也是或许最

关键的一个主角：那个本应扮演社会矛盾“减压阀”和民意“整合器”角色的主流政治体制。民粹主义的崛起，不仅是因为选民变得愤怒了，更是因为那些传统的“政治代理人”——主流政党和政治家们——失灵了。他们非但没能有效回应民众的诉求，反而自身成为了民众不信任和鄙夷的对象。

民粹主义者们并非是攻破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城堡，他们更像是走进了一座无人看守、大门洞开的宫殿。这个巨大的政治真空，是由主流政治的信誉破产、政策趋同和反应迟钝共同造成的。在民粹主义的幽灵登堂入室之前，王座早已空悬。

3.1 大趋同：当左右不再分明

冷战的结束曾被誉为“历史的终结”，它也深刻地重塑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光谱。传统的左翼与右翼之争——围绕着国家干预与自由市场、劳工与资本的根本对立——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过时了。在弗朗西斯·福山所描绘的那个由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大获全胜的新时代里，一种新的政治共识悄然形成，并迅速主导了几乎所有主流政党的议程。这便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英国的托尼·布莱尔、美国的比尔·克林顿、德国的格哈德·施罗德是这条道路最著名的倡导者。他们领导下的中左翼政党（工党、民主党、社民党）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转向”。他们不再高喊国有化和阶级斗争的口号，转而拥抱全球化、放松金融管制、强调财政纪律——这些在过去都是

中右翼政党的招牌菜。他们的逻辑是：我们接受市场经济的活力和效率，但要用其创造的财富来投资于教育、医疗等社会项目，实现“社会公平”。这是一种试图超越传统左右之争的实用主义，旨在将市场效率与社会关怀相结合。

在当时，这看起来是一个聪明的、与时俱进的选择。它帮助中左翼政党赢得了选举，也确实在这段时间内维持了经济的增长。然而，这种“大趋同”的深远后果，却在当时被严重低估了。当中左翼开始采纳右翼的经济政策时，中右翼政党为了保持区别，有时不得不在文化和社会议题上变得更保守，但在核心的经济议程上，双方的差距变得前所未有的微小。

对于选民而言，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无论你投票给工党还是保守党，你得到的都将是一个信奉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的政府；无论你选择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小布什之前），你都将面对一个对华尔街和跨国公司友好的执政团队。政治选择，从根本路线的抉择，退化成了管理风格和政策微调的差异。政治辩论的核心，不再是“我们应该走向何方？”这个关乎国家命运的宏大问题，而是“我们如何能更好地管理现状？”这个技术官僚式的问题。

这种政策上的“面目模糊”侵蚀了政党的根基。政党本应是代表不同社会群体利益、提供不同社会愿景的组织。但当它们看起来都差不多时，选民的忠诚度便开始瓦解。一位来自“铁锈地带”的失业工人可能会问：那个曾经代表工人阶级的民主党，现在和支持华尔街的共和党有什么本质区别？一位担心本国文化被侵蚀的保守派选民可能会想：那个拥抱多元文化和欧盟一体化的保守党，和工党的主张又有

多大不同？

当主流选项无法提供真正的替代方案时，一种深刻的无力感和政治犬儒主义便开始蔓延。人们觉得，政治不过是一场由一小撮精英阶层上演的“假面舞会”，无论谁上台，他们的生活都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这种“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别无选择）的氛围，为那些敢于打破常规、宣称要提供一个“真正选择”的局外人，创造了完美的登场机会。民粹主义者恰恰就利用了这一点，他们对着感到厌倦和失望的选民大声疾呼：“他们都一样！只有我，才能代表你们，带来真正的改变！”

3.2 “政治阶层”：一个自我封闭的特权世界

与政策趋同相伴而生的，是“政治阶层”（the political class）的固化。随着政党日益专业化和官僚化，政治不再是各行各业的公民代表参与公共事务的领域，而逐渐变成了一项“职业”。今天的政治家，很多都是从大学一毕业就开始其政治生涯：担任议员助理、进入党部工作、在智库任职，然后一步步攀上权力的阶梯。他们的人生轨迹高度相似，社交圈子高度重合，他们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

这个群体，无论其党派归属是左是右，都共享着一套相似的语言体系、行为准则和世界观。他们频繁出入于权力中心（华盛顿、布鲁塞尔、伦敦），与记者、说客、企业高管和高级官僚们构成了一个紧密的共生网络。这种脱离民众的“精英闭环”，让普通人感觉政治是一个遥远的、与己无

关的“他们”的世界。

而层出不穷的政治丑闻，则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摧毁了民众对这个阶层的信任。这些丑闻的形式五花八门：从直接的贪污受贿，到利用公款报销私人奢靡开销（如英国的“议会开支丑闻”），再到利用职权为亲信或金主提供便利。每一个被曝光的丑闻，都在反复印证着民众心中那个最糟糕的猜想：这群人不是在为我们服务，而是在为他们自己服务。他们满口“公共利益”，心里想的却是个人私利。

更具腐蚀性的是所谓的“旋转门”现象：政府高官在卸任后，迅速进入他们曾经监管的大公司或金融机构担任高薪职位。这不仅引发了严重的利益冲突质疑，更让民众确信，政府和资本已经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同盟。当一个负责制定金融政策的财政部长，卸任后立刻被华尔街的投行以千万年薪聘用时，人们有理由怀疑，他当初制定的政策，究竟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给自己未来的雇主铺路？

全天候的媒体周期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则将这一切无限放大。政治人物的每一次失言、每一次虚伪的表演、每一个丑闻的细节，都会被 24 小时不间断地报道、分析和嘲讽。这使得政治从一场严肃的公共辩论，变成了一场永不落幕的娱乐真人秀。公众对政治的观感，不再是尊敬，而是厌倦、鄙夷和不信任交织的复杂情绪。

当“政治家”这个词几乎等同于“骗子”时，任何将自己塑造为“反政治家”的人，都会自动获得巨大的道德优势。特朗普之所以能吸引众多支持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刻意表现出的“非政客”形象。他说话不打草稿，用词粗俗

直白，打破各种政治正确。在许多选民看来，这种“粗鲁”恰恰是“真实”的体现，与那些言辞优雅却谎话连篇的建制派政客形成了鲜明对比。

3.3 案例聚焦（一）：意大利——旧体系的崩塌与“五星”的升起

如果说有一个国家完美地展示了主流政治失灵如何为民粹主义铺平道路，那一定是意大利。意大利的经历，如同一场漫长而痛苦的政治实验，预演了许多其他国家后来发生的故事。

故事的序幕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拉开。一场名为“净手运动”（Mani pulite）的大规模反腐调查，如同一场政治地震，彻底摧毁了意大利战后建立的整个政党体系。执政数十年的天主教民主党和长期作为主要反对党的社会党等传统大党，几乎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无数政客锒铛入狱。这是一个国家政治体系的“熔断”。

在这片巨大的政治废墟上，崛起了第一代民粹主义者——媒体大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他创建了“意大利力量党”，将自己包装成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政治局外人，承诺要用经营企业的方式来“拯救”意大利。他利用自己掌控的媒体帝国，成功地绕过了传统的政治渠道，直接与选民对话。他的崛起，本身就是对旧有政治精英彻底不信任的产物。

然而，贝卢斯科尼的时代同样充满了丑闻和未兑现的承诺。在他与中左翼政党轮流执政的近二十年里，意大利

3.3 案例聚焦(一):意大利——旧体系的崩塌与“五星”的升起³³

的经济停滞不前，公共债务飙升。民众发现，换了一批人上台，但政治腐败和效率低下的问题依然如故。对建制派的失望，演变成了对整个政治体系的绝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更彻底、更激进的民粹主义力量——“五星运动”（MoVimento 5 Stelle）应运而生。它的创始人，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他通过博客和全国巡回的“吐槽”式演讲，用最尖酸刻薄的语言，将所有传统政客斥为“僵尸”、“寄生虫”，将议会称为“一个装满骗子的盒子”。

“五星运动”的核心理念是“反政治”。它拒绝被定义为左翼或右翼，宣称自己代表的是“公民”，对抗的是整个“特权阶层”（la casta）。它承诺要用网络直选来决定政策，实现“直接民主”，让每一个普通公民都能参与决策。它的口号极具煽动性：“把他们都送回家！”（Vaffanculo-Day，意为“滚蛋日”，是其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

在 2013 年的大选中，“五星运动”一跃成为国会第一大党，震惊了整个欧洲。在 2018 年，它更是成功上台执政。它的支持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对经济不满的年轻人，有对政治腐败感到恶心的中产阶级，也有感觉被传统左翼抛弃的蓝领工人。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对现有政治体系的彻底唾弃。

意大利的故事是一个警示：当主流政党因为腐败、僵化和脱离民众而失去信誉时，它们不仅仅是输掉一场选举，而是在摧毁整个政治生态的土壤。这片被污染的土壤，将不再能长出温和理性的政治果实，而只会为那些最极端、最煽动、最“反体制”的力量提供养分。

3.4 案例聚焦（二）：巴西——腐败丑闻 铺就的威权之路

在地球的另一端，巴西的案例则以一种更为惨烈的方式，揭示了系统性腐败如何成为民粹主义强人上台的催化剂。

从 21 世纪初开始的十余年里，巴西由卢拉·达席尔瓦和其继任者迪尔玛·罗塞夫领导的左翼劳工党（PT）执政。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劳工党通过大规模的社会福利计划，成功地让数千万人摆脱了贫困，巴西也一度作为“金砖国家”的代表，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劳工党，成为了巴西新的“建制派”。

然而，光环之下，腐败的毒瘤正在疯狂滋长。2014 年，一场名为“洗车行动”（Operação Lava Jato）的司法调查，揭开了一个堪称史上最大规模的腐败网络。调查发现，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的高管与多家顶级建筑公司相勾结，通过虚报工程合同价格，将巨额资金作为回扣和贿赂，系统性地输送给包括劳工党在内的几乎所有主流政党的政治家。

这场丑闻的规模之大、牵涉之广，令整个国家为之震动。它不仅涉及金钱，更涉及对民众信任的彻底背叛。那个曾经承诺要为穷人代言、涤荡腐败的劳工党，自己却成为了腐败体系的核心。与此同时，巴西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失业率飙升，暴力犯罪猖獗。经济危机、安全危机和政治信任危机三者叠加，点燃了民众滔天的怒火。数百万巴西人走上街头，要求总统下台，要求惩治所有腐败分子。

3.4 案例聚焦（二）：巴西——腐败丑闻铺就的威权之路35

在这样一个充满愤怒、恐惧和背叛感的社会氛围中，一个长期处于政治边缘的人物——雅伊尔·博索纳罗——看到了机会。博索纳罗当了近三十年的国会议员，一直是个无足轻重、以极端言论博眼球的“怪人”。他公开怀念巴西历史上的军事独裁时期，发表歧视女性、同性恋和少数族裔的言论，鼓吹用暴力来解决犯罪问题。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他这样的人绝无可能染指总统宝座。

但 2018 年的巴西，已经不再“正常”。当所有主流政客都被腐败丑闻所玷污时，博索纳罗这个从未身居高位、从未掌握过实权的“局外人”，反而显得“干净”了。他的粗鲁和极端，被许多人解读为一种不与腐败同流合污的“真诚”和“强硬”。他精准地抓住了民众最关切的两个痛点：腐败和犯罪。他承诺要用“铁腕”来扫除腐败、镇压罪犯，要“把巴西从社会主义手中拯救回来”。

他将自己塑造为“上帝、祖国和家庭”的捍卫者，对抗腐败的左翼精英、堕落的自由派媒体和制造混乱的犯罪分子。对于那些对现状感到极度失望和恐惧的选民来说，博索纳罗的出现，仿佛是乱世中的唯一希望。他们投票给他，不是因为他们完全认同他的所有极端观点，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这样一个“强人”，才能砸烂那个腐朽不堪的旧体系，带来秩序和改变。

最终，博索纳罗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 2018 年的总统大选。他的胜利，是巴西主流政治信誉彻底破产的直接后果。它雄辩地证明，当民众对民主制度内的纠错能力感到绝望时，他们会愿意将权力交给一个承诺要“打破一切”的威权人物，哪怕这本身就对民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3.5 结语：被遗弃的权力真空

民粹主义的浪潮之所以能在 21 世纪席卷全球，经济的困顿和文化的焦虑固然是催生不满的“沃土”，但主流政治的失灵，才是那个打开了泄洪闸的“扳机”。它为汹涌的民意洪水，清空了流向权力的河道。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从欧洲到美洲，主流的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陷入了一场“大趋同”，它们提供的政策选项越来越相似，让选民感到别无选择。与此同时，一个脱离民众的“政治阶层”悄然形成，他们被一连串的腐败丑闻和利益输送所玷污，彻底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政治，在许多人眼中，不再是实现公共福祉的神圣事业，而沦为了一场自私自利的肮脏游戏。

这个空悬的王座，这个被主流精英们因傲慢、腐败和迟钝而亲手制造出的权力真空，是民粹主义者收到的最丰厚的礼物。他们不需要进行艰苦的攻坚战，只需要走到台前，对着台下早已怒火中烧的民众说出他们最想听的话：“你们的痛苦，都是这群腐败精英造成的。他们背叛了你们。现在，把权力交给我，我将为你们夺回属于你们的一切。”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应对民粹主义的挑战，仅仅在经济上进行一些修补，或是在文化上呼吁一些包容，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它要求主流政党必须重新找回自己清晰的身份和愿景，提供真正有区别的政策选项；它要求政治精英必须重建与民众的信任链接，用行动证明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公众，而非自身的利益。

然而，在许多国家，当主流政治力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往往为时已晚。民粹主义者已经坐上了王座。接下

来，他们将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力？他们会兑现承诺，还是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在本书的下一部分，我们将开启一场全球巡礼，近距离观察这些“权力操盘手”们迥然不同却又暗合某种规律的“剧本”。

第二部分

剧本——全球民粹主义操盘手

第四章 右翼民族主义者： 特朗普与英国脱欧派

如果说本书的第一部分描绘了一片因经济不平、文化焦虑和政治失信而变得异常“肥沃”的土地，那么从本章开始，我们将聚焦于那些在这片土地上精准播种、并收获了惊人权力的“操盘手”。他们风格各异，背景不同，但他们手中似乎都握着一本相似的“剧本”。**这本剧本的核心，便是将弥漫在社会中的不满情绪，转化为一股排他性的、以民族为名的政治力量。**

2016 年，是这本剧本被演绎得淋漓尽致的一年。大西洋两岸，两场被主流精英视为“不可能发生”的政治地震，相隔数月，接连引爆。6 月 23 日，古老的英伦三岛用一场全民公投，选择挣脱它已融入四十余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11 月 8 日，美利坚合众国的选民将一位毫无从政经验、言辞出格的房地产大亨兼电视真人秀明星——唐纳德·特朗普——送入了白宫。

“英国脱欧”（Brexit）与特朗普的胜选，如同两面棱镜，

折射出右翼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在 21 世纪的强大威力。它们并非孤立的意外，而是同一股时代暗流在不同政治土壤上的两次标志性喷发。前者是一场由理念驱动、多头并进的“人民起义”；后者则是一场由个人魅力主导、颠覆政党的“个人秀”。尽管表现形式迥异，但剖开其喧嚣的表象，我们会发现，它们遵循着一套惊人相似的运作逻辑，一套足以颠覆传统政治游戏规则“剧本”。本章，我们将深入解剖这套剧本，看看这两场运动的操盘手们，是如何绕过旧的权力守门人，如何用全新的语言重塑政治辩论，并最终将“我们 vs 他们”的叙事，烙印在数千万选民的心中。

4.1 剧本第一幕：绕过守门人——媒体的武器化

传统政治中，信息流动的路径相对清晰：政治人物通过主流媒体（报纸、电视台、广播）这一“守门人”，将信息传递给公众。媒体通过采访、编辑和评论，对信息进行过滤和阐释。然而，特朗普和英国脱欧派深谙，要挑战建制派，首先必须打破其对信息渠道的垄断。他们不只是利用媒体，更是将媒体本身“武器化”，开辟了直达民众的全新战场。

4.1.1 特朗普的“组合拳”：真人秀的狂欢与推特的战争

唐纳德·特朗普本身就是媒体时代的产物。他在成为总统候选人之前，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真人秀《学徒》中那

位说出“你被解雇了！”（You're fired!）的霸道总裁。他深知，在注意力稀缺的时代，政治早已不仅仅是政策辩论，更是一场争夺眼球的娱乐秀。他将这一认知发挥到了极致。

首先，他将竞选集会（rally）变成了一场场精心编排的政治奇观。传统的政治集会往往是程序化的、略显沉闷的。而特朗普的集会，则更像是一场摇滚音乐会与摔跤比赛的结合体。震耳欲聋的音乐、巨大的屏幕、挥舞的旗帜，以及最重要的——特朗普本人长达一两个小时、几乎没有讲稿的即兴“独白”。他在这里不是在宣讲政策，而是在进行一场集体的情感动员。他用最简单、最口语化的词汇，讲述着一个“我们被背叛了”的故事。他与台下的支持者频繁互动，形成一种强大的“呼喊-回应”模式。当他痛斥“不诚实的媒体”时，人群会齐声高喊“CNN 烂透了！”；当他提到希拉里·克林顿时，人群则爆发出“把她关起来！”（Lock her up!）的怒吼。

这些集会不仅是为现场观众准备的，更是为电视直播量身定做的。电视台，尤其是 24 小时新闻频道，无法抗拒这种充满戏剧性和冲突性的“免费内容”。特朗普深知，争议就是流量。他越是口无遮拦，越是发表惊人言论，媒体就越是无法将镜头从他身上移开。据统计，在 2016 年大选期间，特朗普获得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免费媒体曝光，远远超过任何一位竞争对手。他成功地让媒体成为了他宣传的扩音器，即使那些报道大多是批判性的。对于他的支持者而言，媒体的批判恰恰证明了他是个敢于挑战“腐败体制”的局外人，反而增强了他的可信度。

如果说大型集会是特朗普的“常规武器”，那么推特

(Twitter) 就是他的“精确制导导弹”。这个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了他绕过所有传统媒体“守门人”的私人频道。每天清晨、深夜，他随时随地发布简短、有力、充满个人情绪的推文。他用它来攻击对手（“爱撒谎的泰德”、“不诚实的希拉里”），用它来反击负面新闻（“假新闻！”），用它来设定当天的政治议程，更用它来与他的支持者进行直接的、看似亲密的交流。

特朗普的推文风格是颠覆性的。它充满了拼写错误、语法问题和全大写字母的咆哮，这与传统政治家字斟句酌的公文文稿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这种“不完美”恰恰塑造了一种“真实感”。他的支持者觉得，这是特朗普本人在说话，未经任何包装，发自肺腑。当他发出那条著名的、不知所云的“covfefe”推文时，主流社会一片嘲讽，但他的粉丝却乐在其中，认为这正是他不受条条框框束缚的魅力所在。通过推特，特朗普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忠诚的数字部落。他不再需要《纽约时报》或 CNN 的认可，他拥有自己的报纸和电视台，24 小时不间断地向他的“人民”广播。

4.1.2 英国脱欧派的“立体战”：红色巴士的视觉轰炸与小报的舆论合奏

与特朗普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媒体战不同，英国脱欧运动的媒体策略更像一场多兵种协同的“立体战”。他们没有像特朗普那样独一无二的媒体焦点，但他们通过多种渠道，成功地将一个核心信息植入了公众的脑海。

这场战役中最具标志性的武器，无疑是那辆红色的双层巴士。车身上用巨大的白色字体印着一句极具煽动性的

话：“我们每周给欧盟 3.5 亿英镑，让我们把钱花在我们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上吧。”（We send the EU £350 million a week, let's fund our NHS instead.）这辆巴士巡游在英国的大街小巷，成为了脱欧派最强大的视觉符号。

这个口号是宣传史上的一个杰作。首先，它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英国的欧盟预算贡献）简化为一个具体、惊人且易于记忆的数字。其次，它将“付出”（给欧盟的钱）与一个深受英国民众珍视的“回报”（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NHS）直接对立起来，制造了一种“我们的钱被外国人拿去，却没有用在刀刃上”的强烈不公感。尽管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很快就遭到了经济学家和事实核查机构的广泛质疑和驳斥，但这已经无关紧要。在情感面前，事实显得苍白无力。当留欧派试图用复杂的经济数据来辩解时，他们已经输掉了这场宣传战。红色巴士的口号，已经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

如果说红色巴士是地面部队，那么英国强大的右翼小报（tabloids）就是他们的“重炮集群”。像《太阳报》、《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这样的报纸，几十年来一直在向它们的数百万读者灌输一种疑欧、反移民的情绪。它们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将欧盟描绘成一个由面目模糊的官僚统治、不断侵蚀英国主权、并用各种荒唐规定（比如禁止卖弯的香蕉）来束缚英国人民的“怪物”。

在公投期间，这些小报火力全开。它们连篇累牍地报道关于移民犯罪、福利被滥用以及欧盟官僚主义的故事，将留欧派描绘成不爱国、脱离群众的“精英”。在公投日当天，《太阳报》的头版标题是“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敦促读者“挣脱布鲁塞尔的枷锁”。这种长年累月的舆论铺垫，

为脱欧运动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民意基础。他们不需要从零开始说服民众，只需要点燃早已埋下的干柴。

此外，脱欧派也悄悄地运用了更先进的数字武器。像“投票脱欧”（Vote Leave）这样的官方竞选团体，与数据分析公司（如后来声名狼藉的剑桥分析公司）合作，通过社交媒体（主要是 Facebook）向特定的摇摆选民群体，推送量身定制的广告信息。这些信息往往聚焦于移民问题或主权问题，以激发目标受众的恐惧和焦虑。这是一场看不见的、在数字空间里进行的精准动员。

无论是特朗普的“推特治国”，还是脱欧派的“巴士 + 小报”组合，其核心都是一致的：绕过、甚至摧毁传统媒体的“守门人”角色，建立一条直达民众的情感和信息通道。他们明白，在新的媒体环境下，谁能定义议题、谁能激发情感，谁就能赢得战争。

4.2 剧本第二幕：语言的魔力——“我们”与“他们”的创世神话

如果说媒体策略是“术”，那么叙事构建就是“道”。右翼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最核心的技巧，在于将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为一个清晰、有力、充满道德色彩的二元对立故事：一边是“纯洁的、善良的、真正的我们”，另一边是“腐败的、邪恶的、虚伪的他们”。

4.2.1 塑造“我们”:为“被遗忘的人民”加冕

在这套剧本里,“人民”不是一个包含了所有公民的宽泛概念,而是一个经过精心筛选的、具有特定身份的群体。

特朗普口中的“人民”,是“被遗忘的男人和女人们”(the forgotten men and women)。他们是谁?他们是生活在“铁锈地带”的失业工人,是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煤矿工人,是中西部的农民,是那些感觉被全球化浪潮抛弃、被沿海地区的文化精英鄙视的白人蓝领阶层。他们曾是“美国梦”的基石,是国家的脊梁,但现在,他们感觉自己成了自己国家里的陌生人。

特朗普的语言,赋予了这个群体前所未有的尊严和力量。他告诉他们:“你们的痛苦是真实的,你们的愤怒是正当的。你们不是失败者,而是受害者。那些在华盛顿、在华尔街、在好莱坞的精英们背叛了你们。而我,是你们的声​​音。”他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精准地击中了这个群体对一个想象中的、更美好、更强大的过去的怀旧之情。戴上那顶红色的MAGA帽子,就意味着加入了这个“真正美国人”的部落,意味着从一个“被遗忘者”变成了一名“爱国者”。

同样,英国脱欧运动所诉诸的“人民”,也是一个特定的群体。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the silent majority),是那些相信“英国性”(Britishness)、珍视传统、遵守规则的普通人。他们感觉自己的生活方式正受到外来文化和布鲁塞尔法令的侵蚀。脱欧派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最喜欢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在酒吧里喝着啤酒、为小人物(the little guy)说话的普通人,以此来对抗那些在伦

敦金融城里喝着香槟、大谈全球化的“精英”。

“夺回控制权” (Take Back Control) 这个口号，与“让美国再次伟大”异曲同工。它同样诉诸一种失落感和对主权的渴望。它向“沉默的大多数”承诺，脱离欧盟将使他们能够重新掌控自己的边界、法律和命运。投票“脱欧”，因此被描绘成一场普通人反抗遥远而傲慢的精英统治的“解放运动”。

4.2.2 定义“他们”：一个不断扩大的敌人名单

一个强大的“我们”，需要一个或多个清晰的“他们”作为对立面。右翼民粹主义的剧本，提供了一份详尽的、可以随时增补的“敌人名单”。

1. **腐败的国内精英 (The Corrupt Elite)**：这是所有民粹主义故事的头号反派。在特朗普的叙事里，他们是“华盛顿的沼泽” (the Washington swamp)，一个由政客、说客、官僚组成的自利集团。在脱欧派的口中，他们是“威斯敏斯特的泡沫” (the Westminster bubble) 和“布鲁塞尔的官僚”，一群脱离群众、出卖国家利益的“全球主义者”。将国内的政治对手描绘成与人民为敌的腐败分子，可以将政策分歧道德化，将其变成一场正邪之战。
2. **撒谎的主流媒体 (The Lying Media)**：这是精英的喉舌和帮凶。特朗普将任何对他不利的报道都贴上“假新闻” (fake news) 的标签，系统性地摧毁《纽约时报》、CNN 等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这是一种高明的“政

4.2 剧本第二幕:语言的魔力——“我们”与“他们”的创世神话49

治免疫”策略:通过预先将信源污名化,他可以确保即使有确凿的负面证据出现,他的支持者也会因为不信任信息来源而选择无视。同样,脱欧派也将所有警告脱欧经济风险的预测,斥之为“恐惧计划”(Project Fear),是建制派用来吓唬人民的阴谋。

3. 危险的外国他者 (The Dangerous Other): 这是右翼民族主义剧本中最具煽动性和危险性的部分。它将经济和文化上的焦虑,具体化为对特定外来群体的恐惧和敌意。

- 对特朗普而言,这个“他者”主要是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和穆斯林。他竞选时那段臭名昭著的言论——“他们(墨西哥)带来的不是最好的人……他们带来了毒品,他们带来了犯罪,他们是强奸犯”——以及他要求“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主张,都赤裸裸地诉诸于种族和宗教偏见。那句响彻云霄的“建墙!建墙!”(Build the wall!)的口号,不仅是一个政策提议,更是一个强大的象征,象征着将“我们”纯洁的内部与“他们”危险的外部彻底隔绝。
- 对于英国脱欧运动,这个“他者”主要是来自欧盟东欧成员国的移民。尽管官方的“投票脱欧”运动在言辞上相对谨慎,但其盟友,特别是法拉奇领导的英国独立党(UKIP),则毫不避讳地将移民问题作为核心议题。公投前夕,法拉奇公布了一张极具争议的海报,画面上是一长队看似

第四章 右翼民族主义者：特朗普与英国脱欧派

来自中东的难民，配文是“引爆点”（Breaking Point）。这张海报被广泛批评为煽动仇恨，但它精准地利用了部分民众对移民失控和社会不堪重负的恐惧。

通过这套“我们 vs 他们”的叙事，特朗普和脱欧派成功地将复杂的社会问题（如经济衰退、身份认同危机）简化为一个个易于理解、能够激发强烈情感的“抓手”。你的工作丢了？不是因为自动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而是因为墨西哥人或中国人“偷走”了它。你的社区变了？不是因为社会自然变迁，而是因为不受控制的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阴谋。你的声音没人听？不是因为代议制民主的固有缺陷，而是因为“沼泽”里的精英们在密谋反对你。这个剧本，为那些感到失落和愤怒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一个宣泄情绪的出口，以及最重要的——一个需要为之战斗的敌人。

4.3 剧本第三幕：比较视角——独角戏与大合唱

尽管共享着相似的剧本核心，但特朗普的崛起和英国脱欧在“表演”风格和组织形态上，却呈现出鲜明的对比。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我们把握右翼民粹主义的多样面貌。

4.3.1 个人崇拜的“独角戏”vs. 理念驱动的“大合唱”

特朗普的运动，从始至终都是一场围绕他个人的“独角戏”。核心吸引力在于特朗普本人——他的名人光环、他的“交易大师”形象、他敢于挑战一切的“斗士”姿态。支持者们追随的不是一套严谨的意识形态，而是特朗普这个人。他们相信他，是因为他“有钱，不需要听任何人的”，是因为他“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话”。对他的忠诚，是一种高度情绪化、个人化的联结。MAGA 运动如果失去了特朗普，就如同失去了灵魂。

相比之下，英国脱欧更像一场由共同理念驱动的“大合唱”。虽然它也有像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和奈杰尔·法拉奇这样的领军人物，但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像特朗普那样，成为运动的唯一化身。人们投票脱欧，可能因为认同约翰逊的乐观主义，也可能因为被法拉奇的激进所吸引，但归根结底，他们投票支持的是“脱欧”这个理念本身——为了主权，为了控制移民，为了摆脱布鲁塞尔。这是一场围绕“事业”（the cause）而非“领袖”（the leader）的运动。即使没有这些领军人物，脱欧的理念在英国社会中也早已根深蒂固。

4.3.2 体制外的“颠覆者”vs. 体制内的“叛乱者”

特朗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体制外“颠覆者”。他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他以一个商人的身份，向整个华盛顿政治建

制（包括他所竞选的共和党建制派）宣战。他像一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打碎了共和党内原有的派系平衡和游戏规则，最终通过敌意收购（hostile takeover）的方式，劫持了整个政党。他的胜利，是美国政治中一次罕见的、由外向内的颠覆。

英国脱欧的故事则更为复杂，它更像一场体制内的“叛乱”。脱欧运动的核心领导层——约翰逊和戈夫——本身就是执政的保守党内部的高级成员，是体制的一部分。他们的行动，是一场针对本党领袖（时任首相戴维·卡梅伦）和主流派系的“政变”。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疑欧派势力，并与体制外的民粹力量（法拉奇的独立党）结成了一个“权宜同盟”。因此，脱欧的胜利，可以看作是执政党内部的一股强大势力，借助民粹的浪潮，成功地推翻了原有的领导核心和国家大政方针。

4.3.3 殊途同归：共享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内核

然而，无论是一人主导的独角戏，还是多声部合唱的交响；无论是体制外的颠覆，还是体制内的叛乱，这两场运动的终点是相同的。它们都成功地将一种右翼的、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逻辑，注入了国家政治的核心。

“让美国再次伟大”与“夺回控制权”，本质上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它们都承诺要逆转全球化的潮流，让国家回归到一个想象中的、拥有完全主权和文化同质性的“黄金时代”。“建墙”与“控制边境”，都是将国家安全与排斥外来者直接挂钩的民族主义解决方案。攻击“华盛顿沼泽”

与攻击“布鲁塞尔官僚”，都是将民众的不满从具体的政策问题，转移到对整个精英治理体系的道德审判上。最终，特朗普和英国脱欧派都成功地将 2016 年的选举或公投，定义为一场“人民”对抗“精英”的终极对决。在这场对决中，他们是“人民”唯一的代言人，而投票给他们，则是选民能够“夺回”自己国家的唯一方式。

4.4 结语：剧本的胜利与民主的警钟

解剖特朗普与英国脱欧派的“剧本”，我们看到了一套精心设计、威力巨大的政治运作体系。它通过武器化的媒体策略，打破了旧的信息垄断；通过创造“我们 vs 他们”的强大叙事，将复杂的社会矛盾转化为简单的道德斗争；并通过灵活多样的表演形式，适应了不同的政治环境。

2016 年的结果证明，这套剧本是成功的。它成功地动员了那些在全球化中失落、在文化变迁中焦虑、在政治中感到被漠视的庞大群体，将他们的怨愤、怀旧与希望，锻造成了一股足以颠覆现有政治秩序的强大力量。他们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结构性矛盾的必然产物。他们为无数心怀不满的民众，提供了一个看似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快捷方式”：将权力交给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或者通过一次公投“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然后将国家的大门向世界关上一部分。

然而，当大幕落下，当竞选的狂热逐渐褪去，这套剧本的深远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它所依赖的社会分裂、对事实的攻击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敌意，并不会随着选举的结束而

消失。恰恰相反，它们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政治肌体之中。

特朗普的四年任期和英国脱欧后的漫长挣扎，都将是这套剧本的延续。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一些更为老练的“操盘手”正在观察和学习。他们看到，赢得选举只是第一步。如何将民粹主义的胜利，转化为对国家机器的长期掌控，如何将一时的群众狂热，固化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权力结构，将是他们要演绎的下一幕。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便是这方面的一位“大师”。在下一章，我们将前往多瑙河畔，看看这位“有耐心的民粹主义者”，是如何上演一出更为系统、更为深刻的“夺权”大戏。

第五章 非自由民主派：欧 尔班的匈牙利

在民粹主义的万花筒中，如果说特朗普代表着一种喧嚣、冲动、常常在边缘试探的右翼民族主义，那么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他是一位冷静、精明、极具战略眼光的“非自由民主派”建筑师。他没有选择推翻民主，而是选择掏空它，将其内核替换为一种看似民主实则威权的统治模式。匈牙利，这个中欧小国，在欧尔班的领导下，成为了全球政治实验室中一个令人不安的样本，展示了民粹主义者如何在赢得选举后，系统性地“捕获”国家机器，从而实现长期的权力垄断。

本章将深入探讨欧尔班的“剧本”，揭示他如何一步步将匈牙利从一个新兴的自由民主国家，改造为一个“非自由民主”的堡垒。我们将看到，这并非一蹴而就的革命，而是一场耐心而周密的“长线游戏”，其每一步都经过深思熟虑。通过与特朗普的对比，我们也将理解为何欧尔班的模式，对那些渴望在民主外壳下巩固自身权力的潜在威权领

袖，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5.1 从自由斗士到非自由建筑师：欧尔班的蜕变

要理解欧尔班的“非自由民主”模式，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他独特的政治轨迹。维克多·欧尔班并非一开始就是民粹主义者。在1989年东欧剧变时，他以一位年轻、充满激情的自由主义学生领袖形象登上历史舞台。在匈牙利共产党政权摇摇欲坠之际，正是他，在民族英雄伊姆雷·纳吉的重新安葬仪式上，公开呼吁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并要求举行自由选举。那时的他，是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坚定拥护者，是匈牙利向欧洲回归的象征。

然而，政治的舞台充满了变数。在1990年代，欧尔班领导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最初是一个自由主义政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敏锐地察觉到匈牙利社会深层的不满和渴望。在经历了一段在野时期后，欧尔班和他的青民盟开始向右转，拥抱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和基督教价值观。他不再是那个呼吁自由的青年，而是一个深谙民意、善于利用社会情绪的政治家。

2010年，在匈牙利经历了一系列经济危机和左翼政府的腐败丑闻之后，欧尔班和青民盟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议会选举，获得了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席位。这一胜利，不仅是选民对旧秩序的厌倦，更是欧尔班“非自由民主”实验的开端。他不再满足于仅仅执政，而是要彻底重塑匈牙利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5.2 系统性“捕获”国家机器：欧尔班的权力巩固剧本

欧尔班的“剧本”并非一味地煽动民意，而是以一种外科手术般的精准，对匈牙利的民主机构进行系统性改造。他深知，仅仅赢得选举是不够的，真正的权力在于对国家机器的绝对控制。

5.2.1 修改宪法：重塑国家基石

获得三分之二多数席位后，欧尔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宪法。这并非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一次彻底的“宪法革命”。2011年，匈牙利通过了新宪法，取代了1989年以来的旧宪法。新宪法不仅将“上帝与基督教”写入序言，强调民族认同，更重要的是，它为欧尔班政府巩固权力提供了法律依据。

新宪法缩减了宪法法院的权力，限制了其对议会立法的审查能力。它还允许议会通过“基本法”，这些法律需要三分之二多数才能修改，从而将青民盟的政策永久化，即使未来失去多数席位，也难以被推翻。例如，关于家庭、媒体、司法等领域的关键法律，都被提升到基本法的地位。这就像在民主的棋盘上，欧尔班不仅赢得了当前这局棋，还修改了棋盘的规则，让未来的对手难以翻盘。

5.2.2 安插亲信，掌控法院：司法独立之殇

司法独立是民主制度的基石，它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对政府权力形成制衡。欧尔班深知这一点，因此将司法系统作为其“捕获”战略的重点。

他首先通过立法降低了法官的强制退休年龄，导致数百名经验丰富的法官被迫退休。这些空缺随即被欧尔班政府任命的亲信填补。此外，他还设立了新的司法机构，如国家司法办公室，并任命忠于青民盟的人士担任负责人，从而将司法行政权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

宪法法院也未能幸免。通过修改宪法和任命新法官，宪法法院的组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判决往往与政府的意愿高度一致。曾经作为民主守护者的法院，逐渐沦为政府政策的橡皮图章。当公民或反对派试图通过法律途径挑战政府时，他们发现司法的大门已经不再敞开。

5.2.3 控制媒体：塑造“我的事实”

在信息时代，媒体是塑造公众舆论、监督政府权力的重要力量。欧尔班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是其“非自由民主”模式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首先，公共媒体（如国家电视台和电台）被完全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其新闻报道高度偏向政府，对反对派进行抹黑，并对政府的批评声音进行过滤。这些媒体成为了政府的宣传机器，而非独立的公共服务机构。

其次，私人媒体也未能幸免。通过政府支持的商业集团收购、广告投放倾斜、以及对独立媒体的打压（如撤销

5.2 系统性“捕获”国家机器：欧尔班的权力巩固剧本 59

广播执照、施加财政压力)，大量私人媒体被亲政府势力控制。一个庞大的亲政府媒体帝国逐渐形成，涵盖了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和网络媒体。独立媒体的空间被急剧压缩，记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甚至人身安全威胁。

匈牙利还设立了媒体委员会，其成员由政府任命，拥有对媒体内容进行审查和罚款的权力。这使得媒体在报道时不得不自我审查，以避免触怒当局。最终，匈牙利形成了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媒体环境，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被严重限制，只能听到政府希望他们听到的声音。这为政府推行其议程、打击异见创造了有利条件。

5.2.4 污名化公民社会：压制异见

公民社会组织（NGOs）、大学和智库是民主社会中重要的制衡力量，它们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和观点，并对政府进行监督。欧尔班政府将这些组织视为潜在的威胁，并采取措施对其进行压制和污名化。

最著名的例子是针对由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的打击。欧尔班政府将索罗斯描绘成一个“全球主义者”和“外国代理人”，指责他试图通过资助 NGOs 来干涉匈牙利内政，破坏国家主权。2017 年，匈牙利通过了《外国资助组织透明法》，要求接受外国资助的 NGOs 进行注册并公开其资金来源，否则将面临罚款甚至关闭。这一法律被批评为旨在恐吓和压制异见。

大学也成为攻击目标。中欧大学（CEU），一所由索罗斯创办的国际知名大学，因其自由主义的学术氛围和对政府的批评，长期受到欧尔班政府的打压。最终，在政府的持

续压力下，中欧大学被迫将其大部分课程从布达佩斯迁至维也纳。这不仅是对学术自由的侵犯，更是向所有独立机构发出的警告：不与政府保持一致，就将面临生存危机。

5.2.5 操纵选举制度：确保长期执政

尽管欧尔班政府声称自己是民主选举的产物，但它也对选举制度进行了修改，以确保青民盟的长期执政。

通过重新划分选区（“杰利蝾螈”），青民盟将支持自己的选民集中在某些选区，同时将反对派选民分散到多个选区，从而在选票数量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最大化其在议会中的席位。此外，选举法也进行了修改，例如增加了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使得小党派更难获得席位，从而有利于大党（青民盟）。

这些措施使得匈牙利的选举虽然形式上依然存在，但其公平性和竞争性大打折扣。反对派发现，即使他们能够团结起来，也难以在被操纵的选举制度下挑战青民盟的霸权。

5.3 国际舞台上的“孔雀开屏”：对内宣传与对外挑战

欧尔班的“非自由民主”模式不仅在国内大行其道，在国际舞台上，他也有一套独特的“孔雀开屏”式外交。他深知，匈牙利作为欧盟成员国，不能完全脱离国际社会。因此，他的国际策略旨在服务于其国内的权力巩固，同时挑战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

5.4 有耐心的民粹主义者：欧尔班与特朗普的对比 61

欧尔班经常在欧盟峰会、联合国大会等国际场合，扮演一个“民族主权捍卫者”的角色。他公开批评欧盟的“官僚主义”和“全球主义精英”，反对欧盟的移民政策，并宣称自己是在捍卫匈牙利的国家利益和基督教文明。他将欧盟的批评描绘成外部势力对匈牙利主权的干涉，从而在国内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巩固自己的支持率。

这种外交策略的本质是“表演给国内观众看”。当欧盟对匈牙利的民主倒退表示担忧时，欧尔班会将其解读为“布鲁塞尔”对匈牙利的打压，从而强化他在国内的“反抗者”形象。他利用国际舞台来强化其在国内的叙事：即他是一个敢于对抗强大外部势力的民族英雄。

与此同时，欧尔班也积极寻求与其他持相似观点的国家建立联系，例如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政府，以及一些中东欧国家的保守派领导人。他试图构建一个“非自由民主”的国际联盟，共同对抗他所称的“自由主义霸权”。这种策略不仅为他提供了国际上的支持，也为其他潜在的威权领袖提供了效仿的榜样。

5.4 有耐心的民粹主义者：欧尔班与特朗普的对比

将欧尔班与特朗普进行对比，能够更清晰地揭示“非自由民主”模式的独特之处，以及它为何对其他潜在的威权领袖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5.4.1 战略与混乱：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是喧嚣的、冲动的、常常是混乱的。他的权力巩固尝试往往是即兴的、反应性的，并且常常在法律和制度的边缘游走。他试图通过推特、大型集会和直接的言语攻击来绕过传统媒体和机构，但他的努力常常因为缺乏系统性规划和内部阻力而受挫。例如，他试图挑战 2020 年大选结果，但最终被法院、选举官员和国会所阻止。他的风格更像是一场持续的政治风暴，虽然声势浩大，但缺乏精准的打击。

相比之下，欧尔班的民粹主义是冷静的、精明的、极具战略性的。他不是一个“推特治国”的领导人，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建筑师。他的每一步行动，从修宪到控制媒体，从打击 NGO 到重塑司法，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和系统性实施的。他没有试图推翻民主，而是选择在民主的框架内，通过合法（但非自由）的手段，一点点地侵蚀和掏空民主的内核。他像一个耐心的外科医生，精确地切除民主的制衡机制，而不是像一个狂暴的破坏者。

5.4.2 制度的韧性与制度的捕获

特朗普的美国，尽管经历了民粹主义的冲击，但其强大的制度韧性（如独立的司法、自由的媒体、成熟的官僚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抵御了他的权力扩张。美国的制衡机制，虽然受到挑战，但最终发挥了作用。

而在匈牙利，欧尔班则成功地“捕获”了这些制度。他没有试图推翻法院，而是通过任命亲信来控制它；他没有废

除媒体，而是通过收购和审查来控制它；他没有解散议会，而是通过修改选举法来确保其多数地位。他将民主的“外壳”保留下来，但掏空了其“内核”，使其不再能有效制衡权力。这种“制度捕获”使得他的权力巩固更加持久和难以逆转。

5.4.3 为何欧尔班模式更具吸引力？

欧尔班的模式之所以对其他潜在的威权领袖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原因有以下几点：

合法性外衣：它提供了一种在民主框架内实现威权统治的“合法”路径。领导人可以通过赢得选举来上台，然后逐步侵蚀民主，而无需诉诸军事政变或暴力镇压。这使得其政权在国际上更具迷惑性，也更难被直接谴责为独裁。规避国际制裁：相比于赤裸裸的独裁，这种“非自由民主”模式在国际上更容易规避严厉的制裁和谴责。虽然欧盟对匈牙利启动了“法治程序”，但由于欧盟内部的复杂性，这些程序往往进展缓慢，难以产生决定性影响。持久性：通过系统性地改造国家机器，这种模式能够确保领导人长期执政，并为未来的权力继承做好准备。它不像特朗普那样，权力高度依赖于个人魅力和情绪煽动，一旦个人离开，其影响力可能迅速消退。蓝图效应：欧尔班的匈牙利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剧本”或“操作手册”，展示了如何一步步地削弱民主制衡，巩固个人权力。这种模式的成功，无疑会鼓励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效仿。

5.5 非自由民主的未来：对全球的警示

欧尔班的匈牙利，是 21 世纪民主面临的新挑战的缩影。它不再是简单的军事政变或共产主义独裁，而是一种更具欺骗性和渗透性的权力形式。它利用民主的工具来摧毁民主，利用民意来压制异见，利用法律来巩固非法治的统治。

这种“非自由民主”模式的兴起，对全球民主构成了严峻的警示。它提醒我们，民主并非一劳永逸的成就，而是一个需要持续捍卫和维护的脆弱体系。当公民社会被压制，媒体被控制，司法不再独立，即使选举依然存在，其民主的实质也已荡然无存。

欧尔班的匈牙利，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它告诉我们：民粹主义者一旦掌握权力，他们不仅会挑战旧秩序，更会系统性地重塑国家，以确保其权力的永久化。理解欧尔班的“剧本”，对于我们识别和应对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非自由民主”趋势，至关重要。它迫使我们思考，当选票不再是民主的唯一衡量标准时，我们该如何定义和捍卫真正的自由与公正。

第六章 强人救世主：莫迪 与杜特尔特

如果说唐纳德·特朗普和英国脱欧派是右翼民族主义的表演者，欧尔班·维克托是蚕食民主制度的工程师，那么我们现在要遇到的，是民粹主义光谱中一个更古老、也可能更具原始力量的原型——强人救世主。

他们不只是承诺要“夺回控制权”或“让国家再次伟大”，他们的承诺更为根本：从混乱中恢复秩序，用铁腕重塑国家之魂。他们不仅仅是政治领袖，他们将自己塑造成国家的化身、人民的守护神、历史使命的执行者。他们的崛起，往往伴随着对果断行动甚至铁血暴力的渴求。在那些国家制度脆弱、腐败横行、民众普遍缺乏安全感的社会里，这种“救世主”的叙事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

要理解这一模式，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两个截然不同但又惊人相似的亚洲民主大国：印度的**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和菲律宾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 (Rodrigo Duterte)。他们一位是禁欲苦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

者，另一位是满口脏话的“惩罚者”，但他们共享着同一套剧本：将民粹主义与强烈的个人崇拜、民族或宗教身份认同相结合，承诺以雷霆手段扫除国家的一切“污秽”，并在此过程中，将自己塑造成国家意志与力量的唯一象征。

本章将剖析这套剧本，探讨为何在 21 世纪的今天，仍有数以亿计的选民心甘情愿地将希望寄托于一个“强人”，以及这种选择将为他们的国家带来怎样的未来。

6.1 剧本第一幕：混乱的舞台与秩序的承诺

强人并非凭空出现，他们是在民众对混乱的极度厌倦和对现有体制的彻底失望中应运而生的。在他们登场前，舞台早已搭好，剧本只缺一位主角。

6.1.1 菲律宾的“罪恶之城”

在 2016 年杜特尔特当选总统之前，菲律宾正深陷于一种弥漫全社会的无力感之中。猖獗的毒品交易、高发的犯罪率、警察系统的腐败无能，以及一个似乎永远无法触及普通人生活的政治精英阶层，共同构成了一幅令人窒息的图景。对许多菲律宾人来说，法律和秩序不是现实，而是一种奢望。毒品不仅是社会问题，更是一种侵蚀家庭、吞噬未来的“癌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达沃市市长的杜特尔特横空出世。他在达沃市执政二十余年，以其严厉打击犯罪的

铁腕手段而闻名全国。关于他组织“**达沃敢死队**”（Davao Death Squads）法外处决毒贩和罪犯的传闻甚嚣尘上。然而，这些在西方人权组织看来骇人听闻的指控，在许多菲律宾人眼中，却成了他有能力、有魄力的最佳证明。达沃市被宣传为“**菲律宾最安全的城市之一**”，成了他治理能力的活广告。

他的竞选承诺简单、粗暴且极具煽动性：“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会把所有罪犯都杀了……把他们的尸体扔进马尼拉湾喂鱼。”他不像一个传统的政客，他更像一个民间传说中的“**惩罚者**”（The Punisher）。他满口脏话，鄙视繁文缛节，公开嘲笑人权组织是“罪犯的保护伞”。这种“不装”的姿态，与那些言辞优雅却毫无作为的马尼拉精英形成了鲜明对比，让厌倦了虚伪政治的民众感到无比“真实”和亲切。

他承诺的不是复杂的政策方案，而是一种立竿见影的“外科手术式”解决方案。他告诉选民，国家的沉痾需要猛药，而他就是那个唯一敢下猛药的医生。这场后来被称为“**禁毒战争**”的血腥风暴，在选举前就已经预告，而选民们用选票，热情地拥抱了这场即将到来的杀戮。

6.1.2 印度的“政策瘫痪”与巨人苏醒的渴望

与菲律宾街头的物理混乱不同，2014 年莫迪上台前的印度，陷入的是一种政治和经济上的“慢性病”。此前由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被一系列惊天腐败丑闻所困扰（如“**2G 频谱骗局**”、“**煤炭门**”），经济增长放缓，整个国家被一种“**政策瘫痪**”（policy paralysis）的氛围所笼罩。民众普遍认为，这个国家被一个腐败、世袭的精英家族（尼赫鲁-甘

地家族)所把持,国家潜力被无休止的官僚扯皮和贪污腐败所消耗。

纳伦德拉·莫迪,这位出身于古吉拉特邦一个普通种姓家庭的“**卖茶人**”(Chaiwala),恰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作为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他被塑造成一个高效、清廉、亲商的实干家。所谓的“**古吉拉特发展模式**”被宣传为印度未来的样板:基础设施飞速发展,外资涌入,行政效率高。他本人则是一个工作狂,一个为了国家而牺牲个人家庭生活的禁欲主义者。

但莫迪的形象远不止于此。他还是一个坚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长期成员。他的崛起,伴随着对**印度教特性(Hindutva)**的强调。2002年古吉拉特邦发生的大规模宗教骚乱,虽然给他的履历留下了血腥的污点,却也巩固了他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心中的“守护者”地位。

因此,莫迪向印度人民提供了双重承诺:

- **经济上的救赎者**:他将结束腐败和政策瘫痪,带来发展(**Vikas**),让印度这个沉睡的巨人彻底苏醒。
- **文化上的守护者**:他将重振印度教的荣耀,洗刷数百年来被外族(穆斯林和英国人)统治以及被“伪世俗主义”精英压制的“耻辱”,让印度人在世界上昂首挺胸。

无论是杜特尔特承诺的物理秩序,还是莫迪承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其核心逻辑是相通的:国家病了,旧的体制和精英治不好它,现在需要一个超越体制的强人,用非常规

6.2 剧本第二幕：领袖即国家——个人崇拜的精心构建

强人救世主的统治，不仅仅依赖于政策，更依赖于将领袖本人塑造成国家的化身。对领袖的忠诚等同于爱国，质疑领袖就是“反国家”。这种个人崇拜的构建，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

6.2.1 莫迪：从“人民公仆”到“世界导师”

莫迪的形象塑造堪称教科书级别。他既是亲民的，又是超凡的。

- **人民公仆 (Pradhan Sevak)**：他上任之初，便自称不是总理 (Pradhan Mantri)，而是“首席公仆”。他通过每月一次的广播节目“**心灵对话**” (Mann Ki Baat)，直接与民众沟通，绕过主流媒体，营造出一种领袖与人民之间没有距离的亲密感。
- **苦行僧与强人**：他的团队精心打造了一个禁欲、自律、不知疲倦的工作狂形象。他每天只睡几小时，严格吃素，没有家庭拖累，将全部生命奉献给了国家。这种形象在印度文化中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暗示着他不会被世俗的腐败所侵蚀。

- **无处不在的“莫迪”**：他的头像出现在几乎所有政府福利计划的广告上，从免费煤气罐到公共厕所。新冠疫苗接种证书上印着他的照片，仿佛疫苗是他个人的赠礼。政府的成就被宣传为莫迪个人的成就，国家的荣耀就是莫迪的荣耀。
- **神性与天命**：随着权力巩固，其形象塑造愈发大胆。他的支持者和党内同僚开始将他描绘成“天选之子”，是湿婆神的化身，是来完成神圣使命的。在他任内，备受争议的**阿约提亚罗摩神庙（Ram Mandir）**的落成，并将他作为首席主祭，完成了政治权力与宗教神性的终极合体。在奠基仪式上，他仿佛是一位现代的印度教君王，正在为他的王国奠定信仰的基石。

6.2.2 杜特尔特：“父亲迪贡”与街头硬汉

杜特尔特的个人崇拜则更具草根性和表演性。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街坊里那个令人生畏却又让你感到安全的“大家长”。

- **“父亲迪贡”（Tatay Digong）**：支持者们亲切地称他为“父亲迪贡”。这个称呼暗示了一种威权式的父爱：他严厉、粗暴，会惩罚犯错的孩子（罪犯），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整个家庭（国家）好。这种拟家庭化的政治叙事，极大地拉近了他与普通民众的心理距离。
- **“真实”的魅力**：他那些充满咒骂和暴力威胁的深夜电视讲话，被他的支持者视为“不虚伪”、“接地气”的证据。他公开承认自己年轻时的劣迹，甚至开一些关

于性侵的低俗玩笑。这些在传统政治中是不可想象的言行，反而强化了他“反精英”、“反建制”的形象。他看起来就像一个从街头酒吧里走出来的普通人，只不过恰好当上了总统。

- **权力的表演：**杜特尔特深谙权力需要被“看见”。他会亲自去探望受伤的士兵，在镜头前怒斥毒枭，甚至威胁要驾驶水上摩托去南海插上菲律宾国旗。这些戏剧化的表演，无论能否实现，都在持续不断地强化他“说到做到”的硬汉形象。他将治国理政变成了一场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真人秀。

通过这种方式，莫迪和杜特尔特都成功地将国家议程个人化。印度的未来捆绑在了莫迪的“保证”上，菲律宾的秩序则系于杜特尔特的铁拳。任何对他们政策的批评，都很容易被转译为对国家本身、对人民希望的攻击。

6.3 剧本第三幕：划分敌我——用身份政治巩固权力

民粹主义的核心是“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的对立。而强人救世主模式则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更具爆炸性的元素：身份政治。他们不仅要打击腐败的精英，更要清除那些被定义为对国家/民族/宗教纯洁性构成威胁的“内部敌人”。

6.3.1 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剧本

在莫迪的叙事中，“纯洁的人民”是印度教徒。而“敌人”的名单则很长：

内部敌人：

- 穆斯林：他们被描绘成历史上的侵略者后代，以及当下对印度教构成人口和文化威胁的“他者”。关于他们“不忠于国家”、“生育率过高”的阴谋论在社交媒体上泛滥。
- “反国家分子”：这个标签被随意贴给任何批评政府的人，包括左翼知识分子、人权活动家、独立记者和学生领袖。他们被指控为接受外国资助、意图分裂印度的“城市纳萨尔派”。
- 世俗主义精英：以国大党为代表的传统精英，被攻击为“伪世俗主义者”，为了骗取穆斯林选票而出卖了印度教徒的利益。

外部敌人：

- 主要是巴基斯坦，任何对巴基斯坦的强硬姿态，都能极大地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套剧本通过一系列争议性的法律和行动付诸实施。例如，《公民身份修正案》（CAA），为来自邻国的非穆斯林非法移民提供了获得公民身份的快速通道，却唯独将穆斯林排除在外。这与**全国公民登记册（NRC）**相结合，在

占印度总人口 14% 的 2 亿穆斯林中制造了巨大的恐慌，他们担心自己可能在一夜之间被剥夺国籍，沦为无国籍者。

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或许有限，但其政治象征意义是巨大的。它们清晰地向印度社会传递了一个信号：在莫迪的“新印度”，印度教徒是“一等公民”，而其他人的地位则取决于他们的“忠诚度”。每一次争议，每一次抗议，都反而成了莫迪动员其核心支持者的机会，让他们相信，领袖正在为保护他们而战。

6.3.2 杜特尔特的“反毒品”十字军东征

杜特尔特的敌人划分则更为简单直接，也更为血腥。

“人民”：

- 是遵纪守法、辛勤工作的普通菲律宾人。

“敌人”：

- 是吸毒者和贩毒者。在杜特尔特的语言体系里，这些人被彻底“非人化”。他们不是犯了错的公民，而是必须被清除的“社会毒瘤”、“行尸走肉”。他曾说：“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我真的会杀了你们。”

这场“禁毒战争”与其说是一项公共政策，不如说是一场道德上的“十字军东征”。警方公布的官方死亡人数超过 6000 人，但人权组织估计的真实数字可能高达数万。在贫困社区，仅仅是被人“指认”为涉毒，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这种划分的残酷性在于其有效性。通过将一个群体定义为“非人”，针对他们的暴力就变得可以被接受，甚至值得称赞。支持杜特尔特的民众认为，这些法外处决是在“清理垃圾”，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家庭和社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任何为这些受害者辩护的人——无论是人权律师、天主教会还是国际媒体——都会被立即打上“毒品同情者”和“国家敌人”的标签，从而在道德上被孤立。

通过这种清晰而残酷的敌我划分，莫迪和杜特尔特都成功地将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简化为一场正邪之间的道德决战。在这场决战中，他们是正义的化身，而他们的支持者则是正义大军的一员。

6.4 比较视角：为何此模式在发展中民主国家尤为盛行？

莫迪和杜特尔特的成功，揭示了强人模式在特定土壤中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土壤在许多发展中民主国家都存在。

- **制度的脆弱与信任的真空：**当司法系统缓慢而腐败，警察不可信赖，官僚体系臃肿低效时，民众对正式制度的信任就会崩塌。强人承诺的“法外正义”和“高效执行力”，成了一种诱人的替代品。他就像一个“超级CEO”或“超级警察”，能够绕过所有繁文缛节，直接解决问题。
- **后殖民时代的身份焦虑：**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始终面临着“我们是谁”的身份认同问题。国

家建构尚未完成，民族凝聚力脆弱。强人通过提供一个强大、统一、甚至排他的民族/宗教身份叙事，填补了这种身份焦虑。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正是要塑造一个“纯粹”的印度身份，以对抗殖民和“世俗主义”带来的“混杂”。

- **对安全和秩序的基本渴求：**在许多西方成熟民主国家，人身安全和公共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在犯罪率高企、社会动荡不安的地方，它们是最稀缺、最宝贵的公共产品。杜特尔特的支持者愿意用一部分民主权利，去交换街道的安全感。这种交换，在他们看来是理性的。
- **经济不平等与尊严的丧失：**全球化和快速的经济转型，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大量感觉被抛弃的群体。强人不一定能提供更好的经济方案，但他们能提供一种心理补偿：尊严。通过将国家的强大与领袖的强大划等号，通过打击“内部敌人”和在国际上展现强硬姿态，他们让那些在经济上失落的人，在心理上重新获得了作为“胜利者”的感觉。

6.5 结语：救世主的代价

强人救世主的剧本，无疑是民粹主义中最具诱惑力也最危险的版本之一。它精准地回应了人类内心深处对秩序、安全、身份和尊严的渴望。它将复杂的治理问题简化为一场激动人心的道德斗争，为民众提供了清晰的敌人和一位值

得追随的英雄。

然而，迎接救世主的代价是高昂的。为了换取强人承诺的秩序，社会往往需要牺牲民主的基石。法治被领袖的意志所取代，制衡机制被系统性地削弱，异议的声音被压制，少数群体的权利被无情地践踏。社会在“我们”与“他们”的对立中被撕裂，仇恨的种子一旦播下，便会疯狂生长。

杜特尔特的任期结束了，但他留下的血腥遗产和被毒化的政治文化，将长期困扰菲律宾。莫迪则仍在继续重塑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正走在一个通往“选举式威权主义”的危险轨道上。

强人或许能带来一时的稳定和虚幻的强大感，但他们最终会侵蚀一个国家赖以长期繁荣和稳定的制度与文化根基。他们承诺拯救国家，但最终，国家可能需要从他们带来的“拯救”中被拯救。理解了他们的剧本，我们才能更清醒地认识到，当一个领袖承诺要成为你的一切问题的答案时，他很可能本身就是那个最大的问题。这，正是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后果”中深入探讨的核心议题。

第七章 左翼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遗产

如果说民粹主义的浪潮在 21 世纪初席卷了欧美，让许多观察家措手不及，那是因为他们或许遗忘了，这股力量早已在世界的另一端演练了数十年。**拉丁美洲**，这片充满了魔幻与现实、革命与反抗的土地，堪称是现代民粹主义的“原始实验室”。在这里，民粹主义并非新鲜事，它早已深深嵌入了这片大陆的政治基因。更重要的是，拉美的经验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了：民粹主义绝非右翼的专利。

当我们谈论民粹主义时，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唐纳德·特朗普**式的民族主义者，或是**维克多·欧尔班**那样的非自由民主派。他们挥舞着文化和身份的旗帜，将矛头指向移民、全球主义者和“腐化的”自由派精英。然而，在赤道以南，民粹主义呈现出另一张截然不同的面孔。这里的“人民公敌”常常不是街角的移民，而是远在华盛顿的“**帝国主义者**”、华尔街的银行家，以及与之勾结的本国“**买办精英**”。这里的承诺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是“夺回属于人民

的资源”，将财富从少数压迫者手中重新分配给广大被遗忘的穷人。

这就是**左翼民粹主义**的剧本——一个关于救赎、主权和再分配的宏大叙事。它同样构建了一个“**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之间的道德对决，但其核心矛盾被定义为阶级和经济的斗争，而非文化或种族的冲突。这个剧本的主角，是一位“**救赎者**”式的领袖。他承诺将国家从外国势力的枷锁和国内寡头的剥削中解放出来，他化身为穷人的代言人，誓言要用国家的雷霆手段，实现社会的终极正义。

要理解这股力量如何运作，我们必须深入两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世界：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 (Hugo Chávez)**和墨西哥的**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简称 AMLO)**。查韦斯是这个剧本的“教父”，他将左翼民粹主义的能量发挥到了极致，创造了一个看似辉煌却最终崩塌的乌托邦；而 AMLO 则是这个剧本的新一代实践者，他试图在汲取前人教训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不那么激进、却同样充满争议的道路。他们的故事，不仅是拉丁美洲的政治悲喜剧，更是对全球所有关心民主与公平的人们发出的深刻警示与启示。

7.1 剧本分析：反帝国、反新自由主义的救赎史诗

左翼民粹主义的剧本并非凭空写就，它根植于拉丁美洲独特的历史创伤之中。从 19 世纪的“**门罗主义**”将拉美划为美国的“后院”，到 20 世纪冷战期间美国对右翼独裁

政权的支持，再到世纪之交由“**华盛顿共识**”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浪潮，这片大陆始终笼罩在北方巨邻的阴影之下。私有化、削减公共开支、开放市场——这些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奉为圭臬的政策，虽然在宏观数据上可能带来了增长，却也加剧了本已惊人的贫富差距，让无数普通民众感觉自己被全球化的列车无情地抛下。

这种普遍的被剥夺感和对外部干预的屈辱感，为“**救赎者**”的登场铺平了道路。他们的叙事核心，就是将民众所有的不满，都归结于一个清晰而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复合体。

7.1.1 第一幕：定义敌人，团结人民

左翼民粹领袖的第一步，就是重塑民众的身份认同。他们告诉人民：你之所以贫穷，不是因为你懒惰或无能，而是因为一个邪恶的联盟窃取了你的劳动果实。这个联盟由两部分组成：外部的“**帝国**”（通常直指美国）及其跨国公司，和内部的“**卖国精英**”（la oligarquía apátrida）——那些与外国资本勾结、出卖国家利益的传统政客、商人和媒体大亨。

查韦斯是运用这套叙事的大师。他将自己定位为 19 世纪南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继承人，将他的政治运动命名为“**玻利瓦尔革命**”。每一次演讲，他都在重述一部史诗：勇敢的委内瑞拉人民，正在对抗着现代的“**美帝国**”及其在委内瑞拉的代理人。在这种叙事中，政治斗争被升华为一场关乎民族尊严和历史使命的解放战争。“**人民**”被清晰地定义为穷人、工人、原住民和非洲裔后代，而“**精英**”则

是一切阻碍这场伟大革命的“寡头”和“叛徒”。这种清晰的二元对立，迅速地动员起了被传统政治所忽视的庞大底层社会。

7.1.2 第二幕：夺回主权，掌控命脉

言辞上的宣战，必须伴随着实际的行动。左翼民粹剧本中最具戏剧性、也最受民众欢迎的一幕，便是将国家战略资源**收归国有**。在拉美这片资源丰饶的大陆，石油、天然气、矿产等产业长期被外国公司所控制，这被视为国家主权旁落的直接象征。

查韦斯上台后，最惊天动地的举措便是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 (PDVSA)** 进行彻底的“革命化”改造。他撕毁了前政府与埃克森美孚、康菲石油等国际巨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大幅提高税率和国家持股比例，最终将整个石油产业牢牢掌控在政府手中。这一举动在国内激起了山呼海啸般的支持。对于一个普通委内瑞拉人来说，这不仅仅是经济政策的调整，更是一种扬眉吐气的精神胜利——我们终于从“美国佬”手里夺回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这种“**经济主权**”的宣示，是左翼民粹领袖构建其合法性的核心支柱。它传递了一个简单而有力的信息：国家的财富，将不再服务于华尔街的利润报表，而是要用来服务于本国的人民。

7.1.3 第三幕：财富再分配，收买人心

夺回来的财富如何使用？答案是：大规模的社会福利项目。这是将抽象的“人民”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忠诚的选民基础的关键一步。查韦斯利用飙升的油价所带来的巨额收入，推出了被称为“**玻利瓦尔任务**”（Misiones Bolivarianas）的一揽子社会计划。

- “**深入邻里任务**”（Misión Barrio Adentro）：数万名古巴医生被请到委内瑞拉，在最贫困的社区建立免费诊所，让那些从未看过医生的人第一次享受到医疗服务。
- “**鲁滨逊任务**”（Misión Robinson）：发起全国性的扫盲运动，向数百万成年人教授阅读和书写。
- “**梅卡尔任务**”（Misión Mercal）：建立国营的廉价食品超市网络，以补贴价格出售基本食品，直接对抗通货膨胀对穷人的影响。

这些“任务”绕过了传统的、被视为腐败低效的政府官僚体系，直接将福利送到了民众手中。这种直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恩惠，在领袖与底层民众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近乎神圣的联系。查韦斯不再仅仅是一位总统，他是给予他们健康、知识和食物的“**指挥官同志**”（Comandante）。他的支持者不是因为认同某种复杂的意识形态而追随他，而是因为他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为了强化这种联系，左翼民粹领袖还必须掌控信息渠道。查韦斯开创性的每周电视广播节目《**你好，总统**》（Aló

Presidente) 是这一策略的典范。在这个长达数小时、毫无脚本的节目中，查韦斯唱歌、跳舞、讲故事、痛斥敌人，甚至现场接听民众电话，直接下令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一种终极的、绕过“精英媒体”的直接沟通，将领袖塑造成一个无所不能、亲民爱民的大家长形象。

至此，左翼救赎者的剧本三部曲完成：以反帝叙事团结人民，以资源国有化掌控经济，以福利再分配收买人心。这个剧本的诱惑力是巨大的，因为它承诺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一个主权独立、经济自主、社会公平的国家。然而，正如**委内瑞拉的悲剧**所揭示的，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意的承诺铺成的。

7.2 比较视角（一）：查韦斯的遗产—— 当救赎走向毁灭

委内瑞拉的故事，是左翼民粹主义理想化模型遭遇严酷现实后，如何走向崩溃的教科书式案例。查韦斯在执政初期所取得的成就——贫困率大幅下降、社会福利显著改善——是真实存在的。然而，支撑这一切的华丽大厦，建立在两个极不稳定的基础之上：高昂的石油价格和领袖个人的绝对权威。

7.2.1 风险一：资源诅咒与经济的“荷兰病”

查韦斯的“**21 世纪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个石油驱动的再分配机器。当 2000 年代国际油价一路飙升至每桶 100

7.2 比较视角（一）：查韦斯的遗产——当救赎走向毁灭83

美元以上时，这个机器可以开足马力运转，巨额的石油美元足以支撑庞大的社会开销和进口需求。然而，这种对单一商品的极端依赖，是经济上的自杀行为。它导致了典型的“荷兰病”：石油产业一枝独秀，扼杀了农业、制造业等其他经济部门的竞争力，整个国家除了石油几乎什么都不生产。

更致命的是，为了将 **PDVSA** 彻底变为“革命的钱袋子”，查韦斯清洗了数万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换上了忠于自己的亲信。这导致公司的生产效率和专业能力急剧下降。当 2014 年国际油价暴跌时，委内瑞拉的经济引擎瞬间熄火。没有了石油美元，政府无法再维持福利项目，也无力进口足够的食品和药品。曾经的“救赎”承诺，变成了恶性通货膨胀、物资极度短缺和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的残酷现实。

7.2.2 风险二：制度的腐蚀与威权主义的降临

民粹主义的“**人民 vs 精英**”逻辑，天然地与民主制度中的权力制衡原则相冲突。在查韦斯看来，任何对他构成挑战的机构——无论是独立的司法系统、反对派控制的议会，还是批评他的媒体——都是“人民公敌”的同伙，必须予以清除。

他通过修改宪法，取消了总统任期限制，将最高法院塞满了自己的支持者，系统性地打压和关闭私营媒体，并利用国家机器来骚扰、逮捕政治对手。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和大学被污名化为接受“帝国主义”资助的颠覆力量。最终，一个本应服务于全体公民的民主制度，被改造成了一个只服务于领袖个人及其政治派系的**威权工具**。当查韦斯因癌

症去世，将权力交给继任者**马杜罗**时，他留下的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家，而是一个被掏空了制度根基、高度个人化、无法应对危机的脆弱政权。

委内瑞拉的悲剧在于，一个旨在赋权于民的运动，最终却以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和福祉而告终。那个承诺带领人民走出贫困的“救赎者”，最终将他的国家拖入了更深的深渊。这个故事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依靠个人魅力和单一资源建立的民粹主义天堂，是何等脆弱，又是何等危险。

7.3 比较视角（二）：AMLO 的“第四次转型”——左翼民粹主义的 2.0 版？

当查韦斯的遗产在委内瑞拉的废墟中燃烧时，许多人认为左翼民粹主义的模式已经彻底破产。然而，2018 年，墨西哥人民用选票将**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MLO）**送上总统宝座，证明这股力量远未消亡。AMLO 的崛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左翼民粹主义在新时代如何演变和调整的绝佳案例。

AMLO 无疑是一位典型的民粹主义者。他的核心叙事与查韦斯如出一辙：一场“**人民**”对抗“**权力黑手党**”（la mafia del poder）的斗争。他将自己的执政定义为继墨西哥独立、改革战争和墨西哥革命之后的“**第四次转型**”（La Cuarta Transformación），一场旨在根除腐败、重塑国家的

7.3 比较视角(二): AMLO 的“第四次转型”——左翼民粹主义的 2.0 版？ 道德革命。

在沟通风格上，他也深得查韦斯的精髓。他每天清晨召开长达两三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 (mañaneras)**，亲自设定议程，直接与民众对话，并猛烈抨击那些他称之为“**保守派**”的批评者，包括媒体、学者和公民组织。他刻意塑造自己节俭朴素的形象——卖掉豪华的总统专机，乘坐商业航班出行，生活简朴——以此来与被视为奢靡腐化的前任们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在相似的民粹主义外壳之下，AMLO 的内核却与查韦斯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或许是他汲取了委内瑞拉教训的结果。

7.3.1 差异一：经济上的审慎与务实

与查韦斯激进的国有化和无节制的财政支出不同，AMLO 在经济上表现出惊人的审慎和保守。他没有走上大规模没收私有财产的道路，反而严格控制政府债务，尊重**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并努力维持与美国这个最大贸易伙伴的稳定关系（尽管时有摩擦）。他没有像查韦斯那样用石油收入去“大水漫灌”，而是将有限的财政资源，精准地投入到针对老年人、学生和残疾人的**直接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中。

他的逻辑是：问题不在于市场经济本身，而在于腐败的精英利用市场规则来中饱私囊。因此，他的革命是一场“**道德净化**”运动，而非一场经济结构革命。他的口号是“杜绝腐败和奢侈，就能省下足够的钱给人民”。这种方法避免了委内瑞拉式的经济崩溃，但也因其紧缩政策在疫情期间未能给经济提供足够支持而受到批评。

7.3.2 差异二：对制度的“蚕食”而非“摧毁”

面对制度性的制约，AMLO 的策略也更为精明。他没有像查韦斯那样直接发动修宪公投来摧毁独立机构，而是采取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蚕食策略。他不断地在言语上攻击和削弱独立选举委员会 (INE)、信息透明度研究所 (INAI) 和司法部门的合法性，指责它们是“为寡头服务的昂贵官僚机构”。他试图通过立法改革来削减这些机构的预算和权力，并任命自己的亲信进入关键岗位。

这种做法比特朗普对“深层政府”的攻击更为系统，但比欧尔班在匈牙利的全方位“国家捕获”要温和。它同样对民主的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其过程是渐进的、缓慢的，因而也更难引起剧烈的反弹。

AMLO 的案例表明，左翼民粹主义正在演化。它可以在不引发经济崩溃的前提下，维持其对底层民众的吸引力。它证明了，一个民粹领袖可以通过将斗争焦点从“经济革命”转向“道德反腐”，并采取更为务实的经济政策，来获得更持久的政治生命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危险性有所减弱。AMLO 对独立机构的持续攻击、对批评声音的不容忍、以及将权力高度集中于总统一人之手的倾向，同样在侵蚀着墨西哥脆弱的民主制度。他的“第四次转型”最终会将墨西哥引向何方，是一个尚未有答案的开放性问题。

7.4 结语：永恒的诱惑，内在的风险

拉丁美洲的经验，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民粹主义的多重面相。它告诉我们，将民粹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右翼排外主

义，是一种危险的短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那些有着被殖民、被干预、被剥削历史和严重贫富差距的国家，左翼的“**救赎者**”剧本——承诺夺回主权、惩罚腐败精英、将财富还给人民——拥有着更为深厚和持久的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是真实的，因为它回应了真实的不公。当主流政党无法解决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时，民粹领袖所提供的简单、直接、充满道德感召力的解决方案，自然会赢得万千民众的拥护。从这个角度看，**查韦斯**和 **AMLO** 的崛起，都是对一个失效的旧秩序的必然反应。

然而，这份遗产的另一面，是其内在的巨大风险。将国家的命运寄托于一位魅力非凡的“**救赎者**”，本身就是一场豪赌。这种模式倾向于将领袖的意志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将政治对手妖魔化为“**人民的敌人**”，从而腐蚀民主赖以生存的多元与制衡。而当经济的顺风转为逆风时，曾经的慷慨福利会迅速蒸发，只留下一个被掏空了的、无法应对危机的国家。

最终，无论是右翼的民族主义者，还是左翼的经济救赎者，他们都共享着同一个核心逻辑：世界是一场“**我们**”与“**他们**”的零和博弈。他们都承诺用强人的意志，来取代复杂的制度程序。**拉丁美洲**的故事警示我们，无论“他们”被定义为谁——是移民、是帝国主义者、还是腐败的寡头——当一个社会开始拥抱这种分裂的逻辑时，它就已经走在了一条通往不确定未来的危险道路上。理解**左翼民粹主义**的独特剧本，不是为了谴责那些被其吸引的人们，而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到，在追求社会正义的崇高理想与滑向威权主义的深渊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第三部分

后果——民粹主义时代下的 生活

第八章 对真相的战争：从“假新闻”到“我的事实”

想象一下，你和一群人正计划穿越一片广袤而危险的森林。你们手中有一张经过几代人勘探、修正和验证的地图。这张地图或许不完美，但它标明了河流、山脉、沼泽和安全的路径。现在，一位魅力非凡的领袖站了出来，他指着地图大声宣称：“这张地图是骗人的！它是森林里的权贵们为了把我们困在这里而编造的谎言！”接着，他掏出一张自己手绘的、简单得多的地图，上面只有一条笔直的大道，直通他所承诺的“应许之地”。他告诉你们，只有懦夫和叛徒才会相信那张旧的“精英地图”，真正的爱国者应该追随他这张“人民的地图”。

于是，人群分裂了。一部分人继续相信经过验证的旧地图，而另一部分人则狂热地追随新领袖，将他的手绘草图奉为唯一的真理。很快，他们不再只是在争论哪条路更好，而是在争论河流是否存在，山脉是否只是幻象。他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现实里，共享的森林在他们眼中变成了两

个无法兼容的世界。最终，他们不再是探险的同伴，而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

这并非一则寓言，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上演的真实剧目。民粹主义的崛起，不仅仅是政策偏好或政治风格的转变，它更是一场深刻的认识论危机。它的运作，需要且必然导致一场针对“真相”本身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目标，不是为了赢得辩论，而是为了摧毁辩论赖以存在的基础。民粹主义领袖深知，要让民众接受他们那套“我们 vs 他们”的简单叙事，就必须首先摧毁所有能够提供独立、复杂、有时甚至是令人不悦的真相的机构。

这场战争并非民粹主义的副作用，而是其核心战略。它侵蚀着民主社会最根本的基石——一个共享的现实。当一个社会失去了共同的事实基础，它就失去了一起思考、一起解决问题的能力。剩下的，便只有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和部落间的相互敌视。本章，我们将深入这场战争的各个前线，揭示民粹主义者是如何系统性地攻击真相的裁决者，如何为他们的追随者构建一个另类的现实，以及这种“后真相”的诱惑，为何对现代人的心灵具有如此致命的吸引力。

8.1 第一前线：处决信使——对“主流媒体”的系统性攻击

在这场战争中，第一个被送上断头台的，永远是新闻媒体。这并非偶然。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中，自由、独立的媒体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守门人”和“监督者”角色。它们是公民获取信息、了解世界的主要渠道，也是监督政府权

8.1 第一前线：处决信使——对“主流媒体”的系统性攻击93

力、揭露谎言和腐败的关键力量。因此，任何想要垄断叙事权的民粹主义领袖，都必须将媒体——尤其是那些享有公信力的主流媒体——视为头号敌人。

唐纳德·特朗普是这套战术的集大成者，他将对媒体的攻击变成了一种政治行为艺术。他最伟大的“发明”，无疑是“假新闻”（Fake News）这个标签。这个词本身并不新鲜，但特朗普赋予了它全新的、武器化的含义。在他手中，“假新闻”不再是一个用于描述虚假信息的客观词汇，而是一个可以随时发射、用于摧毁任何他不喜欢的报道的“认知导弹”。一篇揭露其商业往来疑点的深度调查？假新闻！一项显示其支持率下降的民意调查？假新闻！一段记录其争议性言论的视频？还是假新闻！

这个标签的威力在于其简单粗暴的有效性。它不需要复杂的反驳或证据，只需要重复。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将《纽约时报》、CNN 等主流媒体斥为“假新闻”的制造者，特朗普成功地在他的支持者心中植入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怀疑”。这是一种高明的“政治免疫”策略：只要预先将信源污名化，那么无论这个信源未来发布多么确凿的证据，他的追随者都会因为不信任信源本身而选择无视。

更进一步，特朗普将对媒体的攻击仪式化、部落化。在他的大型竞选集会上，痛斥媒体是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当他用手指着记者席，怒吼他们是“人民的敌人”（enemy of the people）时，台下数万名支持者会报以雷鸣般的欢呼和嘘声。这不仅仅是在表达不满，更是在进行一场集体身份的确认。通过共同憎恨一个“敌人”，支持者们之间的情感纽带被极大地强化了。对媒体的每一次攻击，都在巩固“我

94 第八章 对真相的战争：从“假新闻”到“我的事实”们”（诚实的爱国者）与“他们”（撒谎的精英媒体）之间的对立。

当然，这套剧本并非特朗普独有。在巴西，雅伊尔·博索纳罗反复攻击该国最大的报纸《圣保罗页报》，称其为“厕所报”；在匈牙利，我们在第五章已经看到，欧尔班·维克托没有选择仅仅攻击媒体，而是通过各种经济和政治手段，系统性地将大部分媒体收购、改造，使其成为政府的宣传机器；在印度，纳伦德拉·莫迪的政府和支持者们，则将任何敢于提出批评的记者和媒体，都打上“反国家”的标签。

所有这些做法，其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摧毁独立媒体作为社会“真相公证人”的地位。当所有信使都被处决或被宣布为不可信时，信息的高地便出现了真空。此时，民粹主义领袖便可以通过他的“直通车”——无论是特朗普的推特、莫迪的广播节目“心灵对话”，还是杜特尔特深夜电视讲话——成为其追随者唯一的、最终的、也是最可信的信息来源。他不再需要与事实辩论，因为他自己，已经成为了事实的定义者。

8.2 第二前线：罢黜专家——对知识权威的全面否定

战火很快从媒体蔓延到了更广阔的知识领域。民粹主义的核心逻辑——“拥有常识的人民”对抗“脱离群众的精英”——天然地与任何形式的专业知识权威相冲突。在民粹主义者看来，专家、学者、科学家，不过是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他们用普通人听不懂的术语和复杂的模型，来服务于自

身的利益，并试图剥夺“人民”对自己生活的决策权。因此，对专家的攻击，是民粹主义“赋权于民”叙事的必然延伸。

气候变化议题是这场战争的典型战场。几十年来，全球绝大多数科学家通过海量的研究，达成了“全球正在变暖，且人类活动是主要原因”的压倒性共识。然而，在民粹主义者的叙事中，这一科学共识被描绘成一个巨大的“骗局”。特朗普宣称气候变化是“中国人为了损害美国制造业而捏造的概念”；博索纳罗则为亚马逊雨林的加速砍伐辩护，将环保组织视为阻碍巴西发展的“外国代理人”。

他们巧妙地将一个科学问题，转化为了一个政治和经济问题。他们告诉选民：这些所谓的“气候专家”和“全球主义精英”，正试图用环保的借口，来摧毁我们的工作（煤炭、石油产业），提高我们的生活成本，并向超国家机构让渡我们的主权。在这种叙事下，相信科学，就等于背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是，一个基于证据和理性的议题，变成了一场基于身份和忠诚的站队。

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则将这场对专家的战争推向了高潮，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全球上演。当病毒肆虐时，公共卫生专家和科学家的建议（如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实施封锁）本应成为各国政府制定政策的基石。然而，在许多民粹主义领袖治下的国家，这些专家反而成了被攻击的目标。

在美国，安东尼·福奇博士这位备受尊敬的传染病专家，被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描绘成一个试图通过制造恐慌来攫取权力、破坏经济的“**深层政府**”成员。戴口罩这一简单的公共卫生措施，被政治化为一场关于个人自由的文化战

争。与此同时，特朗普、博索纳罗等人则大力推广各种未经科学验证的“神奇疗法”，如羟氯喹。这背后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逻辑：领袖凭借其超凡的直觉和与“人民”的神秘链接，拥有超越“所谓专家”的特殊智慧。追随领袖的直觉，比相信科学家的证据，更能体现对部落的忠诚。

这场战争还延伸到了司法和情报领域。当法院的判决阻碍了民粹主义领袖的议程时，法官们便不再是独立的法律守护者，而是“阻碍人民意愿”的“激进派法官”。当情报机构的报告与领袖的政治宣传相矛盾时（例如，关于外国干预选举的报告），这些机构便会被斥为阴谋颠覆政府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

无论是科学家、医生、法官还是情报官员，他们工作的共同点是：尊重证据、遵循程序、并对超越党派政治的专业准则负责。而这，恰恰是民粹主义的强人意志所不能容忍的。通过系统性地摧毁对所有知识权威的信任，民粹主义领袖清空了所有能够制约其权力的独立判断标准。在一个没有专家、只有“敌人”和“朋友”的世界里，领袖的意志便成为了唯一的法律和唯一的真理。

8.3 构建另类现实：阴谋论的生态系统

摧毁旧的现实地图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必须为追随者们提供一张全新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另类现实地图。这张新地图，就是由无数阴谋论编织而成的。

阴谋论并非民粹主义时代的新发明，但它在今天扮演的角色却至关重要。它不再是边缘群体的窃窃私语，而成

为了民粹主义政治的“操作系统”。阴谋论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它为复杂、混乱、常常令人感到无力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极其简单、清晰且在情感上极具吸引力的解释框架。

你的生活不如意？不是因为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技术变革和教育不平等等复杂因素，而是因为一个由“全球主义精英”组成的秘密集团在背后操纵一切。国家的传统正在消亡？不是因为社会自然演进和文化多元发展，而是因为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正在资助一场旨在用移民“大置换”本土人口的邪恶计划。

在所有这些阴谋论中，美国的“匿名者 Q”（QAnon）堪称一个登峰造极的范例。它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阴谋论，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另类宇宙。在这个宇宙里，世界被一个由信奉撒旦的恋童癖组成的“深层政府”阴谋集团所统治，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民主党政客、好莱坞明星和金融大亨。而唐纳德·特朗普，则是被军方情报部门秘密选中、前来拯救世界、发动一场名为“风暴”的最终审判的救世主。

QAnon 的信徒们拥有自己的一套“事实”、术语和“解码”世界的方式。他们从特朗普的每一次拼写错误、每一个手势中解读出“秘密信息”。这个另类现实是完全封闭且能够自我强化的：任何与 QAnon 叙事相悖的证据，都被解释为阴谋集团用来掩盖真相的“假新闻”；任何对 QAnon 的打击，都反而证明了“风暴”即将来临。

这个另类现实的构建，离不开一个庞大而高效的另类媒体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由右翼新闻网站、谈话电台、播客、YouTube 频道、Facebook 群组 and 无数社交媒体“网红”组成。它们像一个巨大的共鸣腔，不断地放大和重复着

民粹主义领袖的叙事和各种阴谋论。

在美国，像福克斯新闻（Fox News）这样的主流有线电视频道，与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The Gateway Pundit 等网站，以及无数保守派意见领袖的社交媒体账户，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信息闭环。在这个闭环里，关于“被窃取的选举”、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新冠病毒的“真相”等叙事被反复传播，直到它们在受众心中变得比任何来自“主流媒体”的事实都更加“真实”。

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则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超级催化剂”的角色。为了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停留时间，算法倾向于向用户推荐更具煽动性、更能激发强烈情绪的内容。一个对主流媒体略感怀疑的用户，可能会被算法一步步地引导至越来越极端的阴谋论内容，最终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信息茧房”（filter bubble）。在这个茧房里，他所看到的一切，都在验证他最初的偏见，而所有相反的观点，都已被算法过滤掉了。

最终，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另类宇宙被成功地构建起来。生活在这个宇宙里的人们，与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们，使用着不同的语言，相信着不同的事实，怀抱着不同的恐惧，也期盼着不同的未来。

8.4 心理的诱惑：我们为何渴望“我的事实”

面对这一切，一个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愿意放弃可验证的事实，转而拥抱那些漏

洞百出、有时甚至荒诞不经的阴谋论和另类叙事？将他们简单地归结为“愚蠢”或“无知”，是一种傲慢的、无益的简化。要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必须深入其背后强大的心理诱惑。

首先，是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和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的力量。我们的政治观点，往往不仅仅是观点，更是我们身份认同的核心部分。如果你将自己定义为一位特定领袖的坚定支持者，那么当出现与这位领袖的言行或能力相悖的负面信息时，你的内心就会产生巨大的冲突。承认这些信息，就等于承认自己的判断失误，甚至否定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是非常痛苦的。因此，一个更轻松的心理选择是：拒绝这些信息，并攻击信息的来源。相信“假新闻”的叙事，可以完美地解决这种认知失调，保护我们免受心理上的不适。

其次，是对确定性的渴望。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全球化、技术革命、社会变迁，让许多人感到脚下的大地在移动，未来变得模糊不清。而民粹主义的简单叙事和阴谋论，恰恰提供了一种虚幻但诱人的确定感。它们将一个复杂的世界，简化为一场正邪分明的善恶之战，并为你指明了清晰的敌人。相信阴谋论，会让你感觉自己掌握了某种秘密知识，成为了少数“看清真相”的智者，从而在混乱的世界中重新获得一种掌控感。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对部落归属感的需求。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归属于一个群体是我们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在政治极化的时代，相信和传播同样一套“另类事实”，成为了一种表达对部落忠诚的“投名状”。在社交媒体上分

100 第八章 对真相的战争：从“假新闻”到“我的事实”

享一篇痛斥“假新闻”的文章，或是一个关于“深层政府”的阴谋论视频，其主要功能已经不是传递信息，而是在向你的同伴们发出信号：“我是你们中的一员。”这是一种强大的社会黏合剂。反之，质疑部落的“真理”，则可能面临被排斥和孤立的风险。因此，对许多人来说，坚持“我的事实”，是为了保住自己在“我们”这个集体中的位置。

8.5 结语：破碎的镜子

一个健康的社会，就像一群人共同注视着一面巨大的镜子。通过这面镜子，他们看到自己的全貌——有光荣，也有瑕疵；有共识，也有分歧。他们或许会为镜子中的影像该如何解读而争论，但他们至少承认，他们看到的是同一面镜子。

民粹主义的战争，其最终目的，就是彻底砸碎这面共享的镜子。当镜子碎裂成成千上万的碎片后，每一个部落都捡起其中一块。他们端详着自己手中的碎片，看到的只是自己被扭曲、放大的影像。他们坚信，自己手中的这块碎片，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他们对着其他部落高喊：“你们的镜子是假的！”却不知道，他们所有人都已经失去了看见全局的能力。

这场对真相的战争，是民粹主义时代最深远的后果，也是其最具腐蚀性的遗产。它并非暂时的政治分歧，而是一种长期的、对社会认知能力的结构性破坏。一个无法就基本事实达成共识的社会，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民主辩论，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公共政策，更不可能在面对危机时团结一致。

当“你的事实”和“我的事实”之间只剩下不可逾越的鸿沟时，对话便宣告死亡，妥协变得毫无可能。

这种共享现实的崩解，不可避免地会从认知领域蔓延到社会领域。当我们将一部分同胞视为生活在谎言中的“敌人”时，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社会信任便荡然无存。这种信任的瓦解，正是我们将在下一章深入探讨的主题——一个在“我们 vs 他们”的逻辑下，日益走向分裂与崩解的社会。

第九章 分裂的社会：“我们”的崩解

本章论点：“我们 vs 他们”的二元对立逻辑不只是口头言辞，它在现实中毒化了社会凝聚力，加剧了政治极化。

民粹主义的核心逻辑，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世界被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民粹主义领袖们，无论其意识形态底色是左是右，都熟练地操弄着这把“二元对立”的利剑。他们将社会中的复杂矛盾和多元观点，粗暴地简化为一场“正义与邪恶”的终极对决。在这场对决中，他们及其追随者，当然代表着“人民”的正义一方，而所有对他们构成挑战或批评的群体，则被毫不犹豫地打入“精英”的邪恶阵营。

这种“我们 vs 他们”的叙事，在竞选集会和社交媒体上，往往以口号和标签的形式呈现，比如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假新闻”，或是英国脱欧派的“夺回控制权”和“人民的公敌”。这些简洁有力的词句，如同淬了毒的箭矢，深深地刺入了社会肌理。然而，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

当民粹主义者成功地赢得选举、掌握权力之后，这种“敌我二元”的逻辑，便不再仅仅是一种修辞策略，而成为了一种塑造社会现实的强大力量。它像一种蔓延开来的病毒，侵蚀着社会信任，撕裂着共同体纽带，最终导致一个曾经多元、开放、充满活力的社会，一步步走向分裂和对立。

本章，我们将深入剖析民粹主义的“我们 vs 他们”逻辑，是如何从一种政治动员手段，演变成为一种深刻的社会病症的。我们将看到，这种逻辑不仅仅是言语上的攻击，更是一种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它从细微之处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从根本上改变着一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和政治生态。我们将通过数据、案例和个人故事，来揭示民粹主义如何破坏社会信任，加剧政治极化，并最终使得一个国家的凝聚力走向崩解。我们还将探讨，生活在一个同胞被描绘成敌人的社会里，普通人所承受的情感与心理代价。

9.1 信任的消解：当同胞变成“敌人”

在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里，信任都是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它是一种弥漫在人与人之间、公民与机构之间的无形纽带，是社会合作、公共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基石。然而，民粹主义的“我们 vs 他们”逻辑，从根本上瓦解了这种信任。它通过持续不断地制造和强化对立，使得社会成员之间不再以平等的公民相待，而是以敌对的阵营成员相处。

9.1.1 从政治对手到“人民公敌”

民粹主义的第一步，往往是将政治对手“非人化”。在正常的民主竞争中，不同政党或政治人物之间的分歧，被视为在政策、理念或发展路径上的差异。人们可以尊重对方的观点，即使并不认同。然而，在民粹主义的语境下，政治对手不再是拥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同胞，而是“人民公敌”，是“叛徒”，是“邪恶势力”的同盟。

例如，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给所有批评他的民主党人，都贴上了“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的标签。他将希拉里·克林顿描绘成一个“腐败”、“不诚实”的“骗子”，暗示她对美国构成了生存威胁。对于支持希拉里的选民，他则用一句轻蔑的“可悲的人”（deplorables）来概括，将他们贬低为与自己所代表的“真正美国人”截然不同的异类。同样，在英国脱欧公投期间，留欧派的政治家被脱欧派媒体和活动人士攻击为“叛徒”，甚至被指责为收受欧盟资金、出卖国家主权。

这种言辞上的暴力，绝不仅仅是竞选中的“过激言论”。当它成为一种常态，当它被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反复使用时，它就会逐渐渗透到社会意识的深层，改变人们看待政治分歧的方式。在民粹主义的社会里，不同政治立场的公民，不再被视为可以对话、可以妥协的同胞，而被视为需要警惕、需要斗争、甚至需要消灭的敌人。政治辩论不再是观点的交锋，而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9.1.2 从媒体批评到“真相之战”

在民粹主义的社会里，独立媒体也无法幸免于“敌我二元”的逻辑。媒体本应扮演监督权力、传递信息、促进公共讨论的角色。然而，当民粹主义者将自己定义为“人民”的唯一代表时，任何对他们的批评，都会被解读为对“人民”的攻击。

特朗普将所有批评他的主流媒体，都斥之为“假新闻媒体”（fake news media），是“人民的敌人”（enemies of the people）。他鼓励他的支持者不信任这些媒体的报道，甚至攻击记者是“骗子”和“坏人”。同样，在匈牙利，欧尔班政府系统性地打压独立媒体，通过税收、监管和所有权变更等手段，将越来越多的媒体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在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试图将公共电视台变成执政党的宣传工具。

这种对媒体的攻击，其目标并不仅仅是压制批评声音，更是要从根本上摧毁人们对客观事实的共同认知。当人们不再相信权威媒体，不再尊重专业记者，而是只从自己信任的渠道（往往是社交媒体或亲政府媒体）获取信息时，一个社会就失去了进行理性讨论的基础。每个人都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事实不再是客观的存在，而变成了可以被随意塑造和利用的工具。这就是民粹主义者所追求的“真相之战”：通过摧毁共同的“信息地基”，为自己创造一个可以不受约束地定义现实的世界。

9.1.3 从社会多元到身份对立

民粹主义的“我们 vs 他们”逻辑，往往与某种特定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相结合，从而在社会内部制造更深层次的分裂。这种身份政治，可以是基于民族、宗教、种族、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者常常将“人民”定义为一个具有共同身份的同质化群体，而将所有不属于这个群体的人，视为对“人民”的威胁。

例如，莫迪领导下的印度，印度教民族主义日益抬头。穆斯林等少数族裔，被视为对印度教文化和印度国家认同的潜在威胁，他们的权利和安全受到了侵蚀。同样，在杜特尔特统治下的菲律宾，贩毒嫌疑人被“非人化”，他们的生命权被公然剥夺，而那些为他们辩护的人权活动家，也被贴上了“毒品同情者”的标签，成为了社会中的“异类”。

即使在没有出现大规模暴力冲突的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也加剧了社会群体的对立。例如，在特朗普执政的美国，种族关系明显恶化，白人至上主义势力抬头，针对少数族裔的仇恨犯罪增多。在英国脱欧后，针对移民的攻击事件也有所上升。

民粹主义的身份政治，不仅仅是制造了新的社会分歧，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原有的社会多元性变得难以被容忍。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不同族群、宗教、文化和政治立场的个体，可以和平共处，彼此尊重，在法律框架下公平竞争。然而，当一种特定的身份被定义为“国家认同”的核心，当其他身份被视为“异己”甚至“威胁”时，社会就失去了包容性和开放性。多元的声音不再被视为丰富社会文化、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而被视为破坏社会团结、威胁社会稳定的因

素。

9.2 政治极化：失去共同的“对话空间”

信任的消解，往往伴随着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的加剧。政治极化指的是，社会成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日益扩大，中间地带逐渐萎缩，不同政治阵营之间的敌对情绪日益加剧。民粹主义的“我们 vs 他们”逻辑，是政治极化的重要推手。

9.2.1 观点两极分化，中间派消失

在民粹主义的社会里，人们的政治观点往往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温和、中立或持有混合观点的人越来越少，大多数人都被迫站队，选择一个明确的政治阵营。政治光谱不再是一个连续的平面，而变成了两个互不相容的孤岛。

这种现象，在美国的政治版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长期调查显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在过去几十年里持续扩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两党在几乎所有重要议题上的立场都截然相反，从税收、医保、移民到枪支管制、气候变化，几乎没有共同立场。更令人担忧的是，两党选民对对方的负面评价越来越高，认为对方不仅在政策上错误，而且在道德上可疑，甚至对国家构成了威胁。

在民粹主义语境下，即使是那些原本可以达成共识的议题，也往往会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被“劫持”。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戴口罩和接种疫苗等公共卫生措施，在美国

却被高度政治化。许多共和党人，尤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将这些措施视为侵犯个人自由，甚至将其与某种政治阴谋论联系起来。科学共识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措施是否与自己所属的政治阵营的立场相符。

9.2.2 “回音室效应”与“信息茧房”

政治极化的加剧，也与所谓的“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和“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密切相关。在民粹主义的社会里，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只接触那些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而主动屏蔽或回避那些与自己观点相左的信息。

社交媒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社交媒体算法会根据用户的偏好，推送其感兴趣的内容，这使得人们更容易陷入一个只听到自己声音的“回音室”里。在这样的“回音室”里，人们会觉得自己所相信的就是真理，而其他观点都是错误的、可笑的，甚至是危险的。

这种“信息茧房”的形成，使得不同政治阵营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变得更加困难。人们不再愿意倾听对方的观点，不再尊重不同的声音，而是将所有与自己不同的人，都视为“愚蠢”或“邪恶”的。曾经作为社会成员之间桥梁的公共空间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相互隔绝的“阵营”和“部落”。

9.2.3 污名化与人身攻击

在政治极化的社会里，不同阵营之间的交流往往充满了敌意和攻击性。人们不再就事论事，而是热衷于给对方贴标签、扣帽子，进行人身攻击和道德审判。

例如，在美国的政治辩论中，民主党人常常被共和党人贴上“自由派”、“社会主义者”、“白左”等标签，暗示他们脱离现实、过于理想主义，甚至对国家认同不忠诚。而共和党人则常常被民主党人贴上“保守派”、“种族主义者”、“法西斯”等标签，暗示他们思想落后、歧视弱势群体，甚至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

这种标签化和污名化，使得理性的讨论变得不可能。人们不再关注对方所说的内容，而是关注对方的身份和立场。一旦一个人被贴上了某个负面标签，那么他所说的任何话，都会被自动地视为不可信、不值得尊重的。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政治极化往往会从线上蔓延到线下，导致社会冲突和暴力事件的增多。当人们将政治对手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时，就很容易采取过激的行为，甚至诉诸暴力。

9.3 社区崩解：日常生活中的“敌我”逻辑

民粹主义的“我们 vs 他们”逻辑，并不仅仅停留在宏观的政治层面，它还会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侵蚀着社区的凝聚力。

9.3.1 邻里关系中的政治隔阂

在政治极化的社会里，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越来越难以避免政治立场的冲突。邻里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往往会因为政治观点不同而产生隔阂，甚至反目成仇。

原本，社区是人们共享生活、互助合作的场所。然而，当政治分歧渗透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当人们不再以普通居民的身份相处，而是以“特朗普支持者”或“拜登支持者”、“脱欧派”或“留欧派”的身份相处时，社区的信任和凝聚力就会被逐渐瓦解。

原本可以友好相处的邻居，可能会因为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次争论而不再往来；原本可以合作共事的同事，可能会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在工作中相互拆台；原本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可能会因为一次激烈的辩论而形同陌路。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个人观点，而变成了一种划分敌我的界线，它侵蚀着社会关系，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跨越政治立场的差异，建立真诚的联系。

9.3.2 家庭内部的政治战争

更令人痛心的是，民粹主义的“我们 vs 他们”逻辑，甚至会撕裂家庭。在政治极化的社会里，家庭成员之间也可能因为政治观点不同而发生激烈的冲突，甚至彻底决裂。

原本，家庭是最重要的情感纽带，是人们可以无条件信任和依靠的港湾。然而，当政治分歧变得不可调和，当家庭成员之间不再尊重彼此的观点，而是将对方视为“愚

蠢”、“顽固”甚至“邪恶”时，家庭的温暖和安全感就会被破坏。

父母可能会因为子女支持不同的政治人物而感到失望和愤怒；夫妻之间可能会因为在重大政治议题上意见相左而争吵不休；兄弟姐妹之间可能会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相互指责和攻击。原本应该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家庭成员，却因为政治而变成了“敌人”，家庭的和谐和幸福被政治纷争所吞噬。

9.3.3 公民参与的“阵营化”

民粹主义的“我们 vs 他们”逻辑，也影响着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在政治极化的社会里，人们参与公共事务，往往不再是为了促进公共利益，而是为了维护自己所属阵营的利益，攻击和压制其他阵营。

例如，在社会运动中，参与者不再是为了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而是为了展示自己阵营的力量，甚至与对方阵营发生冲突。在选举中，选民不再是理性地比较不同候选人的政策，而是盲目地支持自己所属阵营的候选人，对其他候选人进行妖魔化和攻击。

公民参与不再是促进社会整合和凝聚力的手段，而变成了加剧社会分裂和对立的工具。公共生活不再是一个不同观点可以平等交流、相互尊重的平台，而变成了一个不同阵营相互争夺、相互排斥的战场。

9.4 情感与心理代价：生活在“分裂”的阴影下

生活在一个被民粹主义“我们 vs 他们”逻辑所撕裂的社会里，人们不仅在社会关系和公共参与方面面临挑战，在情感和心理层面也会承受巨大的代价。

9.4.1 焦虑与恐惧

民粹主义的社会往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冲突。当社会被划分为敌对的阵营，当不同群体的利益和价值观难以调和，人们很容易对未来感到焦虑和恐惧。

人们可能会担心，自己所属的群体是否会受到攻击和歧视；可能会担心，社会的撕裂是否会导致更大的动荡和冲突；可能会担心，自己所珍视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否会被颠覆。这种焦虑和恐惧，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降低幸福感和安全感。

9.4.2 愤怒与仇恨

民粹主义的“我们 vs 他们”逻辑，会不断地激发人们对“对方”阵营的愤怒和仇恨。当人们被灌输一种“对方”是自己苦难根源、是社会进步阻碍的观念时，很容易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

这种愤怒和仇恨，可能会驱使人们采取过激的行为，例如在网络上发表攻击性言论、参与暴力冲突、歧视和排斥“对方”阵营的成员。仇恨的蔓延，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撕

裂，形成恶性循环。

9.4.3 无助与绝望

在民粹主义的社会里，即使是那些不认同“我们 vs 他们”逻辑的人，也可能感到无助和绝望。当社会被极化，当理性讨论变得不可能，当不同阵营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时，人们很容易对改变现状失去信心。

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己的声音被淹没，自己的努力毫无意义，整个社会正在走向崩溃。这种无助和绝望，可能会导致人们对政治和社会失去兴趣，选择逃避和沉默。

9.4.4 身份认同的困惑

对于那些不愿站队、不认同任何一方极端立场的个体，民粹主义的社会可能会带来身份认同的困惑。他们可能既不认同“我们”阵营的排他性，也不认同“他们”阵营的某些观点，却又难以在两极对立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们可能会感到孤独和隔离，可能会质疑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可能会在寻求归属感的过程中迷失方向。

9.5 结语：守护共同的“我们”

民粹主义的“我们 vs 他们”逻辑，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策略，它是一种深刻的社会病症。它侵蚀着社会信任，加剧着政治极化，瓦解着社区凝聚力，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和心理负担。

在一个被民粹主义阴影笼罩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被割断，公共生活失去了理性对话的基础，社会成员之间的

第十章 失序的世界：从联盟到“本国优先”

本章论点：民粹主义内向的本质，与二战后建立在联盟与合作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冲突。

想象一下，你生活在一个精心搭建的社区里。邻里之间有共同的规章制度，有共享的公共设施，有遇到困难时互相扶持的默契。大家虽然各有各的家庭，但都明白，只有共同维护这个社区的和谐与秩序，每个家庭才能真正安居乐业。然而，有一天，社区里的一些家庭开始高喊“我家优先！”的口号。他们质疑公共规章的合理性，拒绝分摊公共设施的维护费用，甚至开始拆除自家与邻居之间的围墙，声称要“夺回”属于自己的领地。

这并非危言耸听的寓言，而是 21 世纪以来，全球政治舞台上正在真实上演的剧目。在本书的前几章中，我们深入剖析了民粹主义在各国崛起的深层土壤——从经济的怨愤、文化的焦虑，到主流政治的失灵。我们也巡礼了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操盘手”，他们或喧嚣冲动，或精明隐忍，或铁

腕强硬，或悲情救赎，但他们都共享着一个核心逻辑：将社会简化为“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之间的道德斗争。当这股力量从国内政治的舞台，蔓延到国际关系的场域时，它所带来的冲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深远和危险。

本章将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全球，探讨民粹主义内向的、排他性的本质，是如何与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以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为基石的全球秩序发生根本性冲突的。我们将看到，“本国优先”的口号，不仅仅是国内政策的调整，更是一把锋利的解构之刃，它正在切割着曾经维系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国际联盟、贸易协定和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努力，将我们推向一个更加碎片化、更加不可预测的“失序世界”。

10.1 旧秩序的基石：从废墟中崛起的全球共识

要理解民粹主义对国际秩序的冲击，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一下这个“旧秩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人类付出了数亿生命的代价，才终于从极端的民族主义和零和博弈的深渊中爬出来。痛定思痛，国际社会的主流精英们达成了一个深刻的共识：要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就必须建立一个超越狭隘国家利益、以合作和共同安全为目标的国际体系。

于是，一系列旨在促进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国际机构和规则应运而生：

- **联合国 (UN)**：作为全球最大的政府间组织，旨在维

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

- **布雷顿森林体系 (Bretton Woods System)**：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 (World Bank)，旨在稳定全球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发展。
-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 及其继承者世界贸易组织 (WTO)**：致力于降低贸易壁垒，促进自由贸易，相信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能减少冲突。
-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在冷战背景下，建立了以美国为核心的集体防御联盟，强调“一个都不能少”的共同安全承诺。
- **欧洲联盟 (EU)**：从煤钢共同体起步，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超国家实体，旨在通过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彻底消除欧洲大陆的战争根源。

这个体系核心理念是多边主义：即通过多方协商、共同制定规则、集体行动来解决全球性问题。它强调共享主权（在某些领域，国家自愿让渡部分主权以换取更大的集体利益）、规则导向（而非强权政治）和共同责任。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个体系虽然不完美，也面临诸多挑战，但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大规模战争，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空前增长，并在应对贫困、疾病和环境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代表了一种对人类理性、合作和进步的信念。

然而，正如我们在前几章所见，全球化的果实分配不均，以及传统政治精英的失职，让一部分人感到被抛弃、被背叛。民粹主义者正是抓住了这种不满，将矛头指向了这些

国际机构和全球化本身。在他们看来，这些机构不是合作的象征，而是“全球主义精英”用来剥夺国家主权、出卖国家利益的工具。

10.2 “本国优先”的利刃：对国际秩序的切割

民粹主义的国际观，是其国内“人民 vs 精英”叙事的自然延伸。在国际舞台上，“人民”变成了“本国人民”，而“精英”则变成了“全球主义精英”、“国际官僚”以及那些与本国利益相悖的“外国势力”。因此，民粹主义的国际政策，核心就是“本国优先”（Our Country First）——将狭隘的国家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对国际合作持怀疑甚至敌视态度。

10.2.1 案例聚焦（一）：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从盟友到交易对象

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是民粹主义国际观最直接、最激进的体现。他将国际关系视为一场零和博弈，认为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被盟友“占了便宜”，被贸易伙伴“欺骗”，被国际组织“束缚”。他的目标是“夺回”美国的经济主权和战略自主权。

- **对北约的冲击：**北约是二战后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军事同盟。然而，特朗普多次公开质疑北约的价值，称其“过时”，并指责欧洲盟友没有承担足够的防务开支。他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这种言论极大地动摇了盟友

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削弱了北约的凝聚力，也给俄罗斯等潜在对手发出了危险的信号。集体防御的基石——“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在“美国优先”的冲击下变得摇摇欲坠。

- **贸易协定的解构：**特朗普上任后，立即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最终以《美墨加协定》(USMCA)取而代之。他认为这些多边贸易协定损害了美国的就业和产业。他还对中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征收高额关税，发动贸易战。这种从自由贸易向保护主义的急剧转向，以及从规则导向的多边贸易体系向强权主导的双边交易的转变，严重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增加了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
- **退出国际协议：**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并一度威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这些举动表明，他将国际协议视为对美国主权的束缚，而非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共同框架。这不仅损害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力，也使得应对气候变化、核扩散和全球疫情等人类共同挑战的努力变得更加艰难。
- **对联合国和多边机构的蔑视：**特朗普对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持明显的蔑视态度，认为它们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且经常对美国指手画脚。他削减了美国对这些机构的资金支持，并经常无视其决议和呼吁。这种对多边主义的系统性攻击，削弱了全球治理的权威性和有

效性。

在特朗普的眼中，盟友不再是共享价值观的伙伴，而是需要重新谈判的“交易对象”；国际规则不再是共同遵守的契约，而是可以随意撕毁的废纸。这种“交易式外交”和“实力至上”的逻辑，将国际关系从一个复杂的合作网络，简化为一场赤裸裸的利益博弈，使得全球秩序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大大降低。

10.2.2 案例聚焦（二）：英国脱欧——一场自我放逐的“主权至上”实验

如果说“美国优先”是全球霸主对既有秩序的“掀桌子”，那么英国脱欧（Brexit）则是一场中等强国为了“夺回控制权”而进行的自我放逐实验。它将民粹主义对主权的极端强调，推向了极致。

- **与欧盟的“离婚”：**英国曾是欧盟的重要成员，深度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然而，脱欧派成功地将欧盟描绘成一个官僚、低效、侵蚀英国主权的“怪物”。“夺回控制权”的口号，精准地击中了民众对主权流失的焦虑。脱欧公投的结果，是英国与欧盟长达数年、充满争议和痛苦的“离婚”过程。
- **贸易与边境的困境：**脱欧后，英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变得复杂，新的海关检查和贸易壁垒给英国企业带来了巨大负担。北爱尔兰问题更是成为了一个无解的死结，因为它涉及到英国主权、欧盟单一市场完整性和

北爱和平协议之间的复杂平衡。曾经无缝连接的边境，现在成为了政治和经济的痛点。

- **“全球英国”的愿景与现实：**脱欧派承诺，脱离欧盟后，英国将能够自由地与世界各国签订贸易协定，成为一个“全球英国”。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复杂。与欧盟这个巨大单一市场的脱钩，使得英国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失去了重要的筹码。在国际舞台上，英国的影响力也因脱欧而受到削弱，其在欧洲的传统盟友关系也变得紧张。
- **对国际合作的负面示范：**英国脱欧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即使是深度一体化的区域合作，也可能因为民粹主义的冲击而分崩离析。它鼓励了其他国家内部的疑欧派和民族主义势力，使得区域一体化和多边合作面临更大的挑战。

英国脱欧的案例表明，当“主权至上”被无限放大，并凌驾于经济利益和国际合作之上时，其代价可能是巨大的。它不仅损害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也削弱了国际合作的基石，使得曾经紧密的联盟关系变得疏远。

10.3 失序的涟漪：全球性挑战下的无力

“本国优先”的民粹主义浪潮，不仅仅是改变了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它更像一块块巨石，投入了全球性挑战的汪洋

大海，激起了层层失序的涟漪。当各国都只顾自家门前雪时，那些需要全球协同才能解决的问题，便无人问津，甚至被利用来加剧国际紧张。

新冠疫情的“各自为战”：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是 21 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它本应成为全球合作的典范，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景象。

- **边境关闭与旅行限制：**各国纷纷关闭边境，限制人员流动，这在短期内或许有助控制疫情，但也切断了全球供应链，阻碍了医疗物资和专业人员的流通。
- **“疫苗民族主义”：**当疫苗研发成功后，富裕国家纷纷囤积疫苗，而贫穷国家却迟迟无法获得足够的供应。这种“疫苗民族主义”不仅加剧了全球不平等，也延长了疫情的持续时间，因为病毒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传播，都可能产生新的变种，威胁到所有人。
- **甩锅与指责：**一些民粹主义领导人将疫情的责任推卸给外国，煽动排外情绪，而非专注于科学应对和国际合作。这种政治化疫情的做法，使得全球协同抗疫的努力举步维艰。

如果说在没有民粹主义冲击的时代，全球在应对埃博拉、SARS 等疫情时尚能形成一定程度的合作，那么在“本国优先”的当下，面对新冠这样规模的危机，国际社会却显得如此无力，令人扼腕。

10.3.1 气候变化的“拖延症”：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另一项生存威胁，它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减排和能源转型。然而，民粹主义的兴起，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遭遇了严重挫折。

- **退出国际承诺：**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以及一些民粹主义政党对气候科学的否认，都削弱了全球减排的共识和动力。
- **优先短期经济利益：**民粹主义者往往将环保政策描绘成“损害就业”、“阻碍发展”的负担，优先考虑短期内的化石燃料产业和经济增长，而非长期的环境可持续性。
- **“气候民族主义”：**一些国家指责其他国家没有承担足够的责任，或者将气候行动视为对本国经济的限制，从而拒绝采取行动。这种“气候民族主义”使得全球共同应对这一挑战的窗口期正在迅速关闭。

10.3.2 从多边主义到交易主义：

民粹主义的崛起，使得国际关系从一个以规则为基础、以多边机构为平台的体系，转向了一个更加以权力为导向、以双边交易为主导的模式。

- **国际规范的弱化：**当大国随意退出国际协议，无视国际法庭的裁决时，国际规范和国际法的权威性就会受到侵蚀。这使得国际关系变得更加丛林化，强权政治的色彩日益浓厚。

- **联盟体系的松动：**曾经坚不可摧的联盟，如北约，也面临着内部的裂痕和外部的压力。盟友之间信任的流失，使得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都大打折扣。
- **地缘政治风险的增加：**当合作的意愿降低，竞争和对抗的意愿上升时，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就会加剧。地区冲突、军备竞赛和贸易摩擦的风险都会随之升高。世界变得更加不稳定，更加不可预测。

10.4 旧秩序的裂缝与民粹主义的趁虚而入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并非完美无缺。它在设计之初就带有大国政治的烙印，其治理结构也存在民主赤字，未能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分配不均，也确实让一部分人感到被边缘化。这些都是旧秩序的“裂缝”，而民粹主义者正是趁虚而入，利用这些不满来攻击整个体系。

他们将国际合作描绘成“精英的阴谋”，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归咎于“外国势力”和“国际官僚”，从而为“本国优先”的政策主张披上“为民请命”的外衣。他们承诺，只要打破旧的国际束缚，国家就能重新获得自由，人民就能重新获得尊严。这种简单而有力的叙事，对于那些在复杂世界中感到迷茫和无助的民众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然而，民粹主义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往往是拆解而非修复。它没有试图弥补旧秩序的缺陷，而是选择将其彻底

摧毁。其结果，往往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甚至“拆了东墙，西墙也塌了”。当国际合作的平台被削弱，当全球治理的机制被破坏，当各国都只顾自身利益而忽视共同挑战时，最终受损的将是所有国家，包括那些高喊“本国优先”的国家。

10.5 结语：碎片化的未来与共同的命运

民粹主义的浪潮，正在将我们带入一个“失序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有清晰的规则，不再有可靠的盟友，不再有共同应对危机的意愿。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国际合作，现在变得奢侈而脆弱。

从“美国优先”到英国脱欧，从对国际机构的蔑视到对全球挑战的“各自为战”，民粹主义的内向本质，正在系统性地解构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它将世界从一个相互连接、相互依存的“地球村”，拉回到一个充满竞争、充满不信任的“部落世界”。

然而，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大流行病、核扩散和恐怖主义，并不会因为国家关闭边境、退出协议而消失。它们是无国界的，需要全球协同才能有效应对。当国际合作的平台被拆除，当各国都只顾眼前利益时，这些挑战将以更猛烈、更不可预测的方式反噬我们所有人。

这个“失序的世界”并非命中注定。它是一个选择的结果。民粹主义的剧本，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诱惑的“本国优先”的幻象，但其代价，是全球共同的和平与繁荣。理解

民粹主义对国际秩序的深远影响，是我们认识当前世界动荡根源的关键一步。它迫使我们思考：在一个日益互联互通的时代，我们究竟是选择走向碎片化的未来，还是重新找回合作的智慧与勇气，共同塑造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包容的世界？这，将是摆在我们面前最严峻的时代命题。

第四部分

十字路口——民主的应对与 权力的未来

第十一章 中间派能否守住 阵地？建制派的反击

本章论点：主流政治力量并非被动挨打，他们也在适应和反击，但成效不一。

在本书的前三个部分，我们如同侦探一般，追寻着民粹主义这股席卷全球的政治风暴的踪迹。我们勘察了它赖以生存的“沃土”——那是被全球化遗忘的经济废墟，是身份认同焦虑的文化裂谷，更是主流政治失灵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我们描绘了全球各地“操盘手”们的“剧本”——他们如何利用民众的愤怒与恐惧，将自己塑造成人民的救世主。我们还评估了这场风暴过境后留下的“后果”——对真相的侵蚀，对社会凝聚力的撕裂，以及对国际秩序的冲击。

至此，一幅令人忧虑的图景已经展开：民粹主义者或已登上王座，或已成为议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似乎正在改写 21 世纪的政治规则。那么，故事的另一方呢？那些被民粹主义者斥为“腐败精英”、“建制派”和“旧势力”的主流政治力量，难道就真的如此不堪一击，只能坐以

答案是否定的。政治舞台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独角戏。当一股强大的力量崛起时，必然会激发出相应的反作用力。在民粹主义浪潮的冲击下，那些曾经高枕无忧的主流政党和政治家们，正从最初的错愕与震惊中清醒过来。他们被迫走出舒适区，开始审视自身的失败，并尝试用各种方式进行反击。这场“建制派的保卫战”并非总能成功，甚至常常显得笨拙和迟缓，但它确实正在发生。

这场反击战没有统一的作战手册，更像是一场在迷雾中的摸索。在不同的国家，面对不同的敌人，主流政治力量祭出了迥异的“兵法”。有的选择高筑墙垒，试图将“野蛮人”隔绝于权力核心之外；有的则选择“师夷长技以制夷”，模仿对手的招数，希望能夺回失地；还有的，则试图点燃一盏新的明灯，用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未来愿景来驱散民粹主义的阴霾。

本章，我们将深入检视这三种核心的反击策略：“**卫生隔离带**”的坚壁清野、“**议题吸纳**”的釜底抽薪，以及“**另类愿景**”的正面迎击。通过分析它们在不同战场上的成败得失，我们将探寻一个核心问题的答案：在与民粹主义的缠斗中，民主的“免疫系统”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中间派，还能守住最后的阵地吗？

11.1 策略一：“卫生隔离带”——筑起高墙的原则与困境

在面对一个被认为是危险、具有传染性的政治力量时，最本能的反应或许就是孤立它。在政治学中，这种策略被称为“卫生隔离带”（Cordon Sanitaire）。它的核心逻辑是：主流政党之间达成共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与被视为极端的民粹主义政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合作——不与之组建联合政府，不在议会中依赖其支持，不提名其成员担任重要职位。其目的在于，通过政治上的“隔离”，阻止民粹主义政党获得执政经验和合法性，将其永远限制在“抗议者”的角色上，并向选民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政党是不可接受的，是民主肌体上的“病毒”。

这种策略植根于一种深刻的道德和历史自觉，在二战后的欧洲，它曾被用来成功地遏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残余势力。而在当代，它最坚定、最著名的实践者，莫过于德国。

11.1.1 案例：德国的“防火墙”——历史记忆与现实挑战

在德国，由于纳粹的历史原罪，对任何形式的极右翼势力保持高度警惕，已经成为战后政治文化的核心共识。当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在2015年难民危机后异军突起，并成功进入联邦议院和所有州议会时，德国主流政坛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启动了“卫生隔离带”。

从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到

其传统对手社会民主党（SPD），再到绿党和自由民主党（FDP），所有主流政党都公开承诺，绝不与 AfD 合作。这道“防火墙”（Brandmauer）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相当稳固。在联邦层面，它阻止了 AfD 参与任何执政联盟的讨论。在州一级，它导致了一些看似奇怪的政治组合。例如，为了将 AfD 排除在外，一些州不得不组建由中右翼、中左翼和绿党构成的“大联合政府”，意识形态差异巨大的政党为了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被迫携手。

“防火墙”策略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它捍卫了德国民主的道德底线，延缓了 AfD “正常化”的进程，并迫使 AfD 始终处于一个愤怒但无能的反对者位置，难以向选民证明自己具备执政能力。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道墙的裂缝也日益明显。尤其是在前东德地区，AfD 的支持率持续攀升，常常成为当地的第一或第二大党。这就给主流政党带来了巨大的执政难题。如果严格遵守“防火墙”原则，组建一个能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府就变得异常困难，有时甚至需要所有其他政党联合起来才能勉强凑够席位。这不仅导致了政府的不稳定，也让 AfD 的选民感到自己的选票被“无视”了。AfD 可以轻易地将这种局面描绘成“旧精英们抱团取暖，联合起来对抗人民意志”的阴谋，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反体制”的形象。

近年来，这道“防火墙”已经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在一些地方市镇层面，中右翼的基民盟政治人物已经开始与 AfD 进行项目性的合作。关于是否应该在州一级也打破禁忌的辩论，在基民盟内部愈发激烈。这暴露了“卫生隔离

11.1 策略一：“卫生隔离带”——筑起高墙的原则与困境¹³⁵

带”策略的内在困境：当被隔离的政党强大到一定程度时，隔离墙本身就可能成为政治僵局的根源。坚守原则的道德高地，与维持政府有效运作的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

11.1.2 案例：隔离带的崩塌——瑞典与荷兰的现实选择

如果说德国的“防火墙”还在苦苦支撑，那么在北欧的瑞典和低地之国的荷兰，我们已经目睹了“卫生隔离带”的彻底崩塌。

在瑞典，长期以来，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一直被所有主流政党排斥。然而，随着该党在选举中节节胜利，成为全国第二大党，这道隔离带变得摇摇欲坠。2022 年大选后，中右翼的温和党为了能够上台执政，最终打破了多少年的禁忌，选择与瑞典民主党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协议。虽然瑞典民主党没有正式入阁，但他们成为了新右翼政府在议会中的关键支持力量，并对其政策（尤其是在移民和犯罪问题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温和党的逻辑很简单：为了实现右翼的执政议程，与魔鬼交易是唯一的选择。

荷兰的故事则更为戏剧性。反伊斯兰的民粹主义者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和他的自由党（PVV）在荷兰政坛活跃了近二十年，一直被视为政治“贱民”。但在 2023 年的选举中，自由党出人意料地一跃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这一结果，如同一颗政治核弹，瞬间炸毁了荷兰的“卫生隔离带”。所有主流政党都被迫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他

们无法再假装这个国家的首要政治力量不存在。组建新政府的谈判，无论多么艰难和不情愿，都必须围绕着威尔德斯展开。

瑞典和荷兰的案例揭示了一个残酷的政治法则：“**卫生隔离带**”的有效性，与**被隔离政党的选举实力成反比**。当一个民粹主义政党能够持续吸引 20%、25% 甚至更多的选票时，主流政党要维持对其的完全隔离，就需要付出极高的政治代价，甚至可能意味着将自己永远放逐到反对党的席位上。在权力的诱惑和现实的压力面前，曾经坚不可摧的原则，往往会变得异常脆弱。

11.2 策略二：“议题吸纳”——偷走对手的雷声

如果筑墙隔离行不通，那么另一种看似更聪明的策略便是“招安”——不是招安民粹主义者本人，而是“招安”他们的议题。这种策略被称为“议题吸纳”(Issue Co-optation)，其核心逻辑是：主流政党，特别是中右翼政党，主动采纳一部分民粹主义政党的核心主张，尤其是在移民、国家安全和文化认同等议题上，用更“温和”、“体面”的语言和方式来包装它们。他们希望通过此举，向那些被民粹主义所吸引的选民证明：“你们的担忧我们听到了，你们不需要投票给那些极端分子，我们同样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像是试图在雷雨天偷走对手的雷声，让其只剩下空洞的闪电。

11.2.1 案例：奥地利的“神童”与丹麦的“左转”

奥地利前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Sebastian Kurz）曾是“议题吸纳”策略的典范。当他接管中右翼的奥地利人民党（ÖVP）时，该党正受到极右翼的自由党（FPÖ）的严重侵蚀。库尔茨采取了大胆的行动：他几乎全盘复制了自由党在移民和伊斯兰问题上的强硬立场，用年轻、干练、现代的形象，重新包装了这些右翼民粹主义的核心议题。他承诺严格控制边境，打击“政治伊斯兰”，并强调奥地利的文化身份。

结果是惊人的。在 2017 年的选举中，库尔茨领导的人民党大获全胜，不仅从自由党手中抢回了大量选民，还成功地以主导伙伴的身份，与自由党组建了联合政府。他似乎完成了一次完美的“驯化”：通过采纳对手的议题，他不仅赢得了选举，还将曾经的威胁变成了自己的执政小伙伴。

然而，库尔茨的成功也揭示了这种策略的巨大风险。首先，它极大地“正常化”了极右翼的言论。当主流政党的领袖都在谈论“移民威胁”时，这些议题便不再是边缘化的禁忌，而成为了政治辩论的中心。整个国家的政治光谱，不可避免地向右移动。其次，与民粹主义者共舞，本身就充满危险。库尔茨的联合政府最终因自由党卷入的“伊维萨丑闻”而垮台，他本人后来也因腐败指控而辞职。这表明，试图利用民粹主义的火焰来取暖，一不小心就可能引火烧身。

一个更有趣的变体发生在丹麦。在这里，采取“议题吸纳”策略的，反而是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在长期流失工人阶级选票给右翼民粹的丹麦人民党之后，社民党领袖梅特·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进行了一次惊人的

政策转向。她宣布，社民党将在坚持传统左翼经济政策（高福利、强工会）的同时，采纳极其严格的移民政策，包括设立“零庇护申请者”的目标。她成功地将“福利国家的捍卫者”和“国家边界的守护者”这两个形象结合起来，赢得了2019年的大选，并有效遏制了丹麦人民党的势头。

丹麦的案例似乎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中左翼政党是否可以通过在文化和移民议题上变得强硬，来赢回流失的传统蓝领选民？但这同样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批评者认为，这是对左翼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价值观的背叛，为了选票而牺牲了原则。

11.2.2 案例：英国保守党的“豪赌”

英国保守党与脱欧的故事，则是“议题吸纳”策略最惊心动魄、后果也最深远的案例。在21世纪初，为了应对日益壮大的英国独立党（UKIP）的挑战，时任保守党首相戴维·卡梅伦决定采取一次终极“议题吸纳”——承诺就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举行全民公投。他天真地以为，这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党内的疑欧纷争，让选民用一次投票来“终结”UKIP的吸引力。

我们都知道后来的故事。这场旨在“偷走雷声”的豪赌，最终引爆了一场真正的雷暴。卡梅伦输掉了公投，也输掉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在脱欧成为既定事实后，鲍里斯·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反而将“议题吸纳”策略发挥到了极致。他不再是半推半就，而是完全、彻底地拥抱了“硬脱欧”的民粹主义叙事，承诺“完成脱欧”（Get Brexit Done）。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地吸

11.3 策略三：“另类愿景”——点燃一盏新的希望之灯139

收了几乎全部的脱欧派选票，摧毁了残余的脱欧党（Brexit Party），并在 2019 年赢得了议会的压倒性多数。

英国的经历如同一部政治惊悚片，它告诉我们，“议题吸纳”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导致灾难性的误判，也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带来巨大的选举成功。但无论如何，它都将深刻地改变一个政党乃至一个国家的本质。当主流政党开始使用民粹主义的语言、采纳民粹主义的政策时，它可能在战术上赢得了战斗，但在战略上，民粹主义的逻辑或许已经赢得了战争。

11.3 策略三：“另类愿景”——点燃一盏新的希望之灯

如果说“卫生隔离带”是消极防御，“议题吸纳”是投机取巧，那么第三种策略则最具雄心，也最为艰难。它既不回避也不模仿，而是选择正面迎击。它试图用一个全新的、积极的、面向未来的替代愿景，来对抗民粹主义者那套基于怀旧、愤怒和恐惧的叙事。它不与对手在泥潭里缠斗，而是试图将战场拉到一片新的高地上。它要告诉选民，你们不只有“回到过去”和“维持现状”这两个选项，还有第三条路——一条通往更美好未来的道路。

11.3.1 案例：2017 年马克龙的“奇迹”

2017 年的法国总统大选，是“另类愿景”策略最辉煌的胜利，也是其魅力的最佳展示。当时的法国，正处在民粹

主义爆发的边缘。主流的左翼社会党和右翼共和党都因丑闻和执政失败而声名狼藉，极右翼“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势头正盛，似乎距离爱丽舍宫只有一步之遥。

就在此时，一个年仅 39 岁、从未参加过选举、来自建制内部却又宣称要打破建制的“局外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横空出世。他创建了自己的政治运动“前进！”（En Marche!），并提出了一个与当时政治氛围格格不入的愿景。

当勒庞鼓吹退出欧盟、关闭边境、拥抱民族主义时，马克龙的旗帜上写着的却是：拥抱欧洲、拥抱全球化、拥抱改革。他没有试图在移民问题上比勒庞更强硬，也没有回避经济改革的阵痛。相反，他将整场选举重新定义为一场根本性的选择：不是传统的左与右之争，而是开放与封闭之争，是进步与倒退之争，是希望与恐惧之争。

他本人，就是这个愿景的化身：年轻、聪明、充满活力，说着流利的英语，对科技和未来充满信心。他承诺要打破法国沉闷的政治僵局，释放经济活力，让法国重新成为欧洲的领导者。这个愿景，对于那些厌倦了旧政客、对勒庞的排外主义感到恐惧的选民——尤其是城市里的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看到了一个可以投票支持（for）的选项，而不仅仅是投票反对（against）勒庞。最终，马克龙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创造了一个政治奇迹。

然而，马克龙的成功也揭示了这种策略的脆弱性。首先，它极度依赖于领袖个人的魅力和特定的政治时机（旧政党的集体崩溃）。这种成功很难被复制。其次，宏大的愿景在执政的日常琐碎中很容易褪色。马克龙上任后，其雷厉风

11.3 策略三：“另类愿景”——点燃一盏新的希望之灯¹⁴¹

行的改革和高高在上的“朱庇特式”执政风格，让他很快被贴上了“富人总统”的标签，并引发了“黄背心”运动等强烈的社会反弹。他所对抗的“反精英”情绪，在他执政期间反而愈演愈烈。2022年，他虽然成功连任，但其胜利更多地被视为选民“捏着鼻子”再次阻击勒庞的结果，而非对其愿景的热情拥护。

11.3.2 案例：拜登的“灵魂之战”

2020年美国大选，乔·拜登的胜利可以被看作是“另类愿景”策略的一个变体。与马克龙那种充满未来感的革新愿景不同，拜登提供的“另类愿景”更像是一种“回归常态”的承诺。

面对唐纳德·特朗普四年执政带来的混乱、分裂和对民主规范的持续攻击，拜登将竞选的核心定调为一场“为国家灵魂而战”（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Nation）。他承诺要恢复体面、同情心和团结，要重建被特朗普破坏的联盟，要让政府重新由“专家”而非“煽动家”来领导。

这是一种“以静制动”的策略。当特朗普在集会上疯狂输出时，拜登则展现出一种沉稳、可靠的“长者”形象。他提供的愿景，不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新世界，而是一个人们所熟悉的、可预测的、不再每天充满戏剧性冲突的旧世界。对于那些被特朗普时代搞得筋疲力尽的美国人来说，这种对“正常”的渴望，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拜登的胜利表明，在经历了民粹主义的狂热之后，对稳定和秩序的向往，也可以成为一种能够动员多数选民的“另类愿景”。

11.4 结语：没有灵丹妙药，唯有漫长而艰难的跋涉

通过检视这三种主流的“反击”策略，一幅复杂的图景浮现出来：在与民粹主义的斗争中，没有一招制敌的“银色子弹”。

“卫生隔离带”是一项高尚的原则性立场，但在民粹主义政党日益壮大的选举现实面前，它正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甚至可能引发政治僵局，反过来成为民粹主义者攻击“体制”的口实。

“议题吸纳”是一场危险的政治赌博。它或许能在短期内赢得选票，但长期来看，它往往以牺牲自身原则、拉低整个政治辩论的底线为代价，最终可能正中民粹主义下怀。

“另类愿景”无疑是最理想、最鼓舞人心的策略，但它对领袖魅力、政治时机和选民心态的要求都极为苛刻，难以复制，且在现实的执政考验中极易磨损。

那么，建制派的出路究竟在何方？或许，真正的答案，并不在于选择哪一种战术，而在于回归政治的本质。最有效的反击，最终必须回到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所探讨的那些根源性问题上。这意味着，主流政党必须停止玩弄战术，开始做那些真正艰难的“功课”：

第一，学会倾听。他们必须放下精英式的傲慢，真正去倾听和理解那些被全球化和文化变迁所抛下的群体的痛苦与焦虑。不能再简单地将他们斥为“无知”、“偏执”或“无可救药者”，而是要承认他们不满的合理性。

第二，拿出方案。倾听之后，必须提出并实施能够真正

解决问题的政策。这意味着要严肃对待收入不平等、产业空心化、公共服务缺失以及移民融入等挑战。这需要的是具体的、可信的、能够让民众感受到生活得到改善的行动，而不仅仅是漂亮的竞选口号。

第三，自我革新。最重要的一点，主流政治力量必须清理自己的门户。他们必须与政治腐败、利益输送和“旋转门”现象进行彻底的切割，用行动来重建自身的信誉。他们必须向民众证明，自己并非民粹主义者口中那个只为自身利益服务的“腐败精英”，而是真正值得信托的公共利益守护者。

与民粹主义的斗争，归根结底，不是一场关于策略的智力游戏，而是一场关于民主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它考验的是，一个尊重多元、崇尚理性、保障权利的民主制度，是否还能比一个诉诸愤怒、煽动分裂、许诺强权的民粹主义模式，为更广大的民众提供一个更安全、更繁荣、更有尊严的未来。

王座并非注定失落，阵地也并非无法守住。但要赢得这场漫长而艰难的“保卫战”，建制派的先生们不能再指望用旧地图找到新大陆。他们必须证明，自己依然配得上人民的信任，依然有能力领导国家走出当前的困境。否则，无论他们筑起多高的墙，或是模仿多逼真的雷声，都无法阻止民众将希望投向那些承诺要“将权力还给人民”的挑战者们。而公民社会自下而上的抵抗力量，又将在这场博弈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正是我们下一章将要探讨的议题。

第十二章 自下而上的力量： 抵抗的崛起

论点：对民主侵蚀的最有力回应，往往来自公民自身。

在本书的前几章中，我们如同剥洋葱般层层揭示了民粹主义的剧本：它如何利用经济的怨愤、文化的焦虑和主流政治的失灵，在“空悬的王座”上加冕；它如何通过喧嚣的右翼民族主义、精明的非自由民主改造，以及铁腕的强人救世主，甚至左翼的救赎者，将“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逻辑推向极致；我们还看到了这种逻辑如何侵蚀真相、撕裂社会，并将国际秩序推向“本国优先”的失序深渊。

这幅图景无疑是令人忧虑的。它似乎在暗示，在民粹主义的强大攻势下，自由民主的堡垒正摇摇欲坠，甚至不堪一击。然而，历史的进程从来不是单向的。当一股力量试图颠覆既有秩序时，必然会激发出相应的反作用力。民主并非一劳永逸的成就，而是一个需要持续捍卫和维护的脆弱体系。它的韧性，往往在最危急的时刻才得以彰显。

那么，当民粹主义的浪潮汹涌而至，那些被其言辞所

攻击、被其政策所伤害、被其逻辑所排斥的群体，难道就只能坐以待毙吗？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对民主侵蚀的最有力回应，往往并非来自高高在上的政治精英，也并非来自僵化的传统机构，而是来自公民自身——那些在街头呐喊、在键盘上疾呼、在法庭上抗争、在日常生活中坚守良知的普通人。

本章，我们将把目光投向这些“自下而上”的力量。我们将看到，在民粹主义的阴影下，公民社会如何迸发出惊人的活力，独立媒体如何坚韧地守护真相，法律和学术机构如何成为抵抗的最后防线。每一次民粹主义的行动，无论多么嚣张，都可能激起一次民主的反作用力。这并非一场轻松的胜利，而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拉锯战，但正是这些看似微弱的抵抗之声，共同构筑起民主的“免疫系统”，提醒我们，权力的未来并非命中注定，而掌握在每一个清醒而勇敢的公民手中。

12.1 草根社会运动：街头与数字空间的呐喊

民粹主义者最擅长宣称自己代表“人民”，但他们所定义的“人民”往往是同质化且排他性的。然而，真正的“人民”是多元的、复杂的，他们拥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诉求和不同的价值观。当民粹主义的叙事试图压制这种多元性时，被排斥的声音便会在街头和数字空间中汇聚，形成强大的草根社会运动。这些运动，以其去中心化、灵活多变和强大的动员能力，成为对抗民粹主义最直接、最生动的力量。

1. 女性大游行：愤怒与团结的粉色浪潮

2017 年 1 月 21 日，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的第二天，一场声势浩大的“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席卷了美国乃至全球。华盛顿特区涌入了超过 50 万人，全球各地有数百万人走上街头，他们头戴粉色“猫耳帽”，手持标语，抗议特朗普的性别歧视言论、排外政策以及对民主规范的漠视。

这场游行不仅仅是对一位总统的抗议，更是对一种政治风格和价值观的集体反弹。它汇聚了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少数族裔权益倡导者、LGBTQ+ 群体支持者以及所有对特朗普上台感到不安的公民。游行组织者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但他们共同捍卫的是包容、平等、尊重的价值观。这场运动的成功在于其巨大的规模和多样性，它向世界展示了，即便在民粹主义者声称代表“沉默的大多数”时，仍有庞大的、充满活力的公民群体拒绝被代表，拒绝沉默。

“女性大游行”的意义不仅在于其一时的声势，更在于它激发了后续的公民参与。许多参与者从这次游行开始，积极投身于地方政治、社区组织和投票动员，将一时的愤怒转化为持久的行动。它证明了，民粹主义的胜利并非终点，而是公民觉醒和抵抗的起点。

2. “黑人的命也是命”：为正义而战的全球回响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BLM）运动，源于美国对警察暴力和系统性种族歧视的抗议，但在 2020 年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遇害后，它迅

速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社会运动。从伦敦到柏林，从悉尼到东京，无数人走上街头，声援美国的反种族歧视斗争，并反思本国存在的种族不公。

BLM 运动的强大之处在于，它不仅揭露了警察的暴行，更深入地挑战了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和不平等结构。它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信息传播和组织动员，使得抗议活动能够迅速响应，并形成全球联动。尽管面临着来自民粹主义政府的污名化和镇压（例如，特朗普政府曾将 BLM 描绘成“恐怖组织”），但 BLM 运动依然坚持不懈，成功地将种族正义议题推向了全球政治议程的中心，迫使各国政府和机构正视并改革其内部的种族歧视问题。

BLM 运动的韧性表明，即使在民粹主义试图通过煽动文化战争来转移视线时，公民社会依然能够将焦点拉回到核心的社会正义问题上，并为被压迫的群体争取权利。

3. 气候罢课与“反抗灭绝”：青年一代的未来之声

当一些民粹主义领导人否认气候变化，或将其描绘成“全球主义精英的骗局”时，全球的青年一代却以惊人的热情和决心，发起了“气候罢课”（Fridays for Future）和“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等运动。瑞典少女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的个人行动，迅速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青年运动，数百万学生每周五走上街头，要求政府采取紧急气候行动。

“反抗灭绝”则采取了更激进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通

过封锁交通、占领公共空间等方式，迫使政府正视气候危机。这些运动挑战了民粹主义的短视和“本国优先”的狭隘思维，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呼吁跨越国界和代际的合作。

这些青年运动的崛起，不仅是对环境危机的回应，更是对政治体制失灵的控诉。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即使在成年人的政治世界中充满了犬儒和妥协，年轻一代依然能够保持理想主义，并为更长远的未来而奋斗。他们是民主活力的重要源泉，也是对抗民粹主义短视和自私的希望所在。

4. 波兰与匈牙利的民主保卫战：抵抗“非自由民主”的侵蚀

在波兰和匈牙利，执政的民粹主义政府（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和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系统性地侵蚀民主机构。然而，公民社会并未坐以待毙。

在波兰，当政府试图控制司法系统时，法官们自发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捍卫司法独立。普通公民也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和对女性堕胎权的限制。在匈牙利，尽管欧尔班政府对公民社会组织施加了巨大压力，但仍有许多 NGOs 和大学（如中欧大学）坚持发声，揭露政府的威权倾向，并为民主价值观而斗争。

这些抵抗运动表明，即使在民粹主义者试图“掏空”民主内核时，公民依然能够通过集会、示威、法律挑战和国际呼吁等方式，捍卫民主的底线。他们是民主

制度的“活细胞”，在制度的骨架被侵蚀时，依然能够通过自身的活力来维持其生命力。

12.2 独立新闻工作者的坚韧：在“后真相”时代守护事实

民粹主义者深知，要垄断叙事权，就必须摧毁独立媒体作为“真相公证人”的地位。他们将独立媒体斥为“假新闻”、“人民的敌人”，试图让民众只相信他们所提供的信息。然而，即便在“后真相”时代，独立新闻工作者依然以其职业操守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成为守护事实、揭露谎言的关键力量。

1. 调查报道：穿透迷雾的利剑

面对民粹主义政府对信息透明度的压制和对腐败的掩盖，调查报道显得尤为重要。全球范围内的独立记者，冒着巨大的风险，深入挖掘真相，揭露权力滥用和不法行为。

例如，“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和“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等一系列泄露事件，揭露了全球政商精英如何利用离岸公司避税和隐藏财富。这些报道往往是跨国界、跨媒体的合作成果，它们向公众展示了，无论权力如何试图掩盖，真相最终都会浮出水面。虽然这些报道并非直接针对民粹主义者，但它们揭示了精英阶层的腐败和特权，而这正是民粹主义者声称要打击的对象。当独立媒体揭露这些真相时，

12.2 独立新闻工作者的坚韧:在“后真相”时代守护事实151

它们实际上是在履行其监督权力的职责，无论被监督者是传统精英还是民粹主义者。

在菲律宾，记者玛丽亚·雷萨（Maria Ressa）和她的新闻网站 Rappler，长期以来坚持报道杜特尔特政府的“禁毒战争”真相，揭露其血腥和非法性。尽管面临政府的持续打压、法律诉讼和死亡威胁，雷萨和她的团队依然坚守岗位，最终她因其勇气和贡献获得了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她的故事，是独立新闻工作者在威权民粹主义面前坚守职业道德的缩影。

2. 事实核查：对抗虚假信息的“免疫细胞”

在社交媒体时代，虚假信息和阴谋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成为民粹主义者操纵民意的强大工具。为了对抗这种“信息污染”，全球涌现出大量专业的事实核查机构。

从美国的 PolitiFact、Snopes，到国际事实核查网络（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 IFCN），这些机构致力于对政治人物的言论、社交媒体上的谣言进行核查，并公布其真实性。它们通过提供证据和数据，帮助公众辨别真伪，守护理性讨论的基础。尽管事实核查机构常常被民粹主义者攻击为“偏见”、“审查”，但它们的存在，为那些渴望了解真相的公民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参考。

事实核查的挑战在于，它往往无法像虚假信息那样迅速传播，也难以改变那些已经深陷“信息茧房”的受众。然而，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它们在不

断地提醒社会，事实依然重要，真相依然可寻。

3. 地方新闻与公民新闻：在社区层面守护真相

除了大型媒体机构，许多地方新闻媒体和公民记者也在默默地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国家层面的政治斗争日益激烈时，地方新闻往往能更深入地触及社区层面的问题，揭露地方腐败，监督地方政府。

在许多国家，地方新闻媒体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但它们依然是社区信息的重要来源。此外，随着技术的发展，普通公民也能够通过手机记录事件、发布信息，成为“公民记者”。在一些政府压制媒体的国家，公民记者甚至成为获取第一手信息的重要渠道。

独立新闻工作者的坚韧，体现在他们对真相的执着追求，对职业道德的坚守，以及在巨大压力下依然敢于发声的勇气。他们是民主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看门狗”，在民粹主义试图蒙蔽公众视听时，他们努力点亮一盏盏灯，照亮前行的道路。

12.3 公民社会组织：法律战线与倡导阵地

公民社会组织（NGOs）、智库、大学和各种倡导团体，是民主社会中重要的制衡力量。它们代表着多元的利益和观点，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为弱势群体发声，并推动社会进步。当民粹主义政府试图削弱这些力量时，公民社会组织便成为抵抗的法律战线和倡导阵地。

1. 法律挑战：在法庭上捍卫权利

在许多国家，当民粹主义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命令侵犯公民权利、削弱民主机构时，公民社会组织会积极利用法律途径进行挑战。

在美国，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等组织，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多次在法庭上成功挑战其争议性政策，例如针对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这些法律诉讼虽然耗时耗力，但它们成功地阻止了政府的过度扩张，捍卫了宪法权利和法治原则。

在匈牙利，尽管欧尔班政府通过修改法律和任命亲信来控制司法系统，但仍有律师和人权组织在欧洲法院和国内法庭上，对政府的争议性立法提出挑战，例如针对外国资助 NGOs 的法律。这些法律战线，虽然不总能取得胜利，但它们至少延缓了民主侵蚀的进程，并向国际社会揭示了政府的威权倾向。

2. 倡导与监督：发出被压制的声音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等国际性 NGOs，以及各国本土的公民社会组织，持续对民粹主义政府的人权状况、腐败问题和民主倒退进行监督和报告。它们通过发布报告、组织研讨会、向国际机构提交证据等方式，向全球揭露真相，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和干预。

这些组织的存在，使得民粹主义政府无法完全掩盖其侵犯人权和破坏民主的行为。它们为受害者提供支持，

为被压制的声音提供平台，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评估各国民主状况的独立信息。

3. 学术机构与思想阵地：捍卫理性与批判

大学和智库是社会思想的策源地，它们通过研究、教学和公共讨论，捍卫理性、批判性思维和学术自由。民粹主义者常常攻击这些机构为“精英的象牙塔”，试图削弱其影响力。

例如，匈牙利的中欧大学（CEU），因其自由主义的学术氛围和对政府的批评，长期受到欧尔班政府的打压，最终被迫将其大部分课程迁至维也纳。然而，中欧大学的抗争，以及全球学术界的声援，都表明了学术自由是不可被轻易剥夺的。

许多智库也积极参与到对抗民粹主义的斗争中，它们通过发布政策简报、组织专家讨论，为社会提供基于证据的解决方案，反驳民粹主义的简单化叙事。它们是民主社会中重要的“思想库”，为抵抗运动提供智力支持。

公民社会组织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包括资金限制、法律打压、污名化和人身威胁。然而，它们依然是民主社会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民粹主义“人民”单一化定义的有力反驳，它们在不断地提醒我们，社会是由多元的声音和利益构成的。

12.4 民主的韧性：每一次行动，都激起反作用力

民粹主义的崛起，固然是对自由民主的严峻挑战，但它也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激发了民主制度本身的“免疫反应”。这种韧性体现在多个层面，从制度性的制衡到公民的觉醒，每一次民粹主义的过度扩张，都可能激起一次民主的反作用力。

1. 司法制衡：法律的最后防线

在许多国家，独立的司法系统成为对抗民粹主义政府权力滥用的最后一道防线。当行政部门试图超越其权力边界，或通过立法侵犯基本权利时，法院往往能够发挥其制衡作用。

在美国，联邦法院多次阻止了特朗普政府的行政命令，例如其试图将公民身份问题加入人口普查的尝试。这些判决表明，即使总统拥有巨大的权力，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在波兰，尽管执政党试图控制司法，但一些法官依然坚守独立性，并寻求欧洲法院的支持，使得政府的司法改革进程受到阻碍。

司法制衡的有效性取决于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民对法治的信仰。当民粹主义者试图攻击司法系统时，公民对法院的支持，以及法官自身的勇气，就显得尤为关键。

2. 选举反弹：选民的最终裁决

尽管民粹主义者擅长操纵选举，但选举本身依然是民

主制度纠错的重要机制。选民可以通过投票，拒绝民粹主义者，或将其赶下台。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乔·拜登的胜利可以被视为对特朗普民粹主义统治的一次选举反弹。尽管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试图质疑选举结果，但最终，美国的选举制度和司法系统经受住了考验，确保了权力的和平过渡。这表明，即使在高度极化的社会中，选民依然有可能选择回归“常态”，拒绝极端主义。

在欧洲，虽然一些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取得了成功，但也有许多案例表明，选民最终会对其感到厌倦。例如，在法国，尽管玛丽娜·勒庞多次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但最终都被主流选民所阻止。这表明，民主的“钟摆”依然在摆动，选民并非永远被民粹主义的煽动所迷惑。

3. 官僚体系的抵抗：专业精神的坚守

在民粹主义者口中，官僚体系常常被描绘成“深层政府”（Deep State），是阻碍“人民意志”的腐败力量。然而，在许多国家，专业的公务员和技术官僚，在面对政治压力时，依然能够坚守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抵制政治化，维护公共服务的正常运行。

例如，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许多职业外交官、科学家和情报官员，尽管面临来自白宫的巨大压力，依然坚持提供客观信息，执行法律和政策，而非盲目服从政治指令。这种“无名英雄”的抵抗，虽然不引人注目，却是民主制度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

4. 国际社会的压力与支持：全球民主的联动

尽管民粹主义者试图推行“本国优先”，削弱国际合作，但国际社会依然能够对民主倒退的国家施加压力，并为当地的公民社会提供支持。

欧盟对匈牙利和波兰的“法治程序”虽然进展缓慢，但它至少向这些国家的政府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即其行为正在偏离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和全球公民社会网络，也能够为受压制的独立媒体和NGOs提供资金、技术和道义上的支持，帮助它们在困境中生存和发展。

这种国际联动，使得民粹主义政府无法完全孤立其国内的抵抗力量，也使得民主的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依然能够得到捍卫。

12.5 结语：历史的终结之终结

民粹主义的崛起，无疑是对 20 世纪末“历史终结论”的一次有力反驳。它告诉我们，自由民主并非人类政治发展的终极形态，它依然面临着内在和外在的挑战。然而，本章所展现的“自下而上”的抵抗力量，也同样有力地反驳了民粹主义的“宿命论”。它证明了，民主并非注定要被侵蚀，公民并非注定要被愚弄。

民粹主义的剧本，其核心在于将复杂的世界简化为“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并承诺由一位强人来解决所有问题。然而，公民社会的抵抗，恰恰在于重新引入了多元性、复杂性和参与性。它提醒我们：

- “人民”是多元的：真正的民主不是由一个单一的“人民”所代表，而是由无数个拥有不同声音、不同身份的个体和群体所构成。
- 真相是可寻的：即使在虚假信息泛滥的时代，依然有坚韧的独立新闻工作者和事实核查者在守护真相，理性讨论的基础依然存在。
- 权力是可制衡的：即使民粹主义者试图集中权力，但独立的司法、专业的官僚体系以及公民的积极参与，依然能够对其形成制衡。
- 民主是需要捍卫的：民主不是从天而降的礼物，而是需要每一代人去争取、去维护、去实践的活生生的过程。

21 世纪的核心政治冲突，将不再是传统左右翼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排他性的民粹主义与复兴的、包容性的民主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漫长的，充满挑战，没有简单的答案，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胜利。它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更清醒、更有效的参与者。

本书无意提供简单的预测，而是希望为读者提供一套思想工具，以识别民粹主义的剧本，理解其吸引力，并最终成为一个在捍卫民主价值时更清醒、更有效的参与者。因为，权力的未来并非命中注定，它掌握在每一个选择站出来、选择发声、选择行动的公民手中。当“群众的怒吼”试图撕裂社会时，我们必须用“公民的低语”和“抵抗的呐喊”，重新缝合信任，重建共识，共同塑造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公正、更加民主的未来。

结语：历史的终结之终结

在本书的开篇，我们站在华盛顿特区的寒风中，目睹了国会山那场震惊世界的“勤王风暴”；我们也在印度总理莫迪的集会现场，感受过那片由数十万狂热信众汇聚而成的橙色海洋。我们提出了这个时代最令人困惑的谜题之一：在一个本应走向更开放、更理性、更包容的全球化时代，为何来自截然不同国度的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会不约而同地将他们的信任与希望，投向那些言辞激烈、寻找替罪羊、甚至公然挑战自由民主根基的领袖？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开启了一场漫长而深入的探索之旅。我们首先挖掘了民粹主义赖以生存的“沃土”。在第一部分，我们看到，那破碎的经济承诺，如同一个幽灵，在全球化的盛宴散场后徘徊不去。去工业化的铁锈、自动化带来的焦虑、中产阶级的困境以及 2008 年金融危机彻底引爆的信任崩塌，共同织就了一张巨大的怨恨之网。我们还探寻了那更为幽微的文化裂谷，在“失落的部落”中，对身份的焦虑、对人口变迁的恐慌、对一个想象中“黄金时代”的怀旧，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暗流。最后，我们审视了那

“空悬的王座”——当主流政党因政策趋同、信誉扫地和脱离民众而失灵时，它们亲手为挑战者们制造了巨大的权力真空。

接着，在第二部分，我们开启了一场全球巡礼，近距离观察了那些坐上王座的“权力操盘手”们迥然不同的剧本。我们见识了以特朗普和英国脱欧派为代表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他们如何将媒体武器化，用“我们 vs 他们”的创世神话，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一场关于民族身份的道德决战。我们分析了匈牙利欧尔班这位“非自由民主派”建筑师，他如何以惊人的耐心和系统性的规划，在不推翻民主外壳的前提下，一步步“捕获”国家机器，掏空其自由主义内核。我们还直面了以印度莫迪和菲律宾杜特尔特为代表的“强人救世主”，他们将自己塑造成国家的化身，承诺用铁腕和秩序来拯救一个被腐败和混乱所困扰的国家。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了民粹主义的“原始实验室”——拉丁美洲，看到了以查韦斯和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为代表的“左翼救赎者”，他们如何以反帝国、反新自由主义的史诗叙事，动员起被遗忘的底层民众。

在第三部分，我们评估了这场全球风暴过境后留下的深刻“后果”。我们目睹了一场针对真相的战争，民粹主义者系统性地攻击媒体、专家和所有独立的真相裁决者，为他们的追随者构建起一个由“另类事实”和阴谋论组成的平行宇宙。我们感受了一个日益分裂的社会，当“我们 vs 他们”的逻辑从政治口号渗透到日常生活，社会信任被侵蚀，政治极化加剧，甚至家庭与社区也因此崩解。我们还看到，当“本国优先”的口号响彻全球，二战后建立在联盟与合作

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正如何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将我们推向一个更加失序、更加危险的世界。

最后，在第四部分，我们探讨了民主的应对。我们看到，主流政治力量并非束手待毙，他们尝试用“卫生隔离带”、“议题吸纳”和“另类愿景”等策略进行反击，但成效不一，且往往治标不治本。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希望的微光——那些来自公民社会“自下而上”的抵抗力量，从街头的呐喊到法庭的抗争，每一次民粹主义的行动，都在激起民主“免疫系统”的反作用力。

现在，当我们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是时候将所有线索汇集起来，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及其未来，做出一次整合性的升华与展望。

12.6 整合升华：一场对现代性的全面反叛

民粹主义的崛起，并非一场短暂的政治发烧，也不是某个国家独有的政治意外。它是一场深刻的、全球性的、对过去半个世纪主流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反叛。将这场运动的参与者简单地斥为“无知”、“偏执”或“无可救药者”，是一种危险的智识傲慢。这种傲慢，恰恰是催生民粹主义的“精英病”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承认，民粹主义的根源，在于真实的、普遍的、且被长期忽视的社会不满。

这场反叛，首先是对经济现代性承诺的背叛感的反叛。冷战结束后，世界的主流叙事是：拥抱全球化、市场化和技术进步，蛋糕会越做越大，最终每个人都将受益。然而，现

实却是，蛋糕的分配极不均匀。一部分人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丰厚红利，在光鲜的金融中心和高科技园区里指点江山；而另一部分人，则承受着工厂倒闭、薪资停滞、技能贬值的代价，感觉自己被时代无情地抛弃。民粹主义的经济叙事，无论是左翼的财富再分配，还是右翼的贸易保护主义，其核心都是对这种“精英的盛宴，民众的账单”的格局的愤怒控诉。它承诺要将那个“破碎的承诺”重新粘合起来，将经济的控制权从“全球主义者”手中夺回，还给“真正的人民”。

其次，这场反叛是对文化现代性后果的失落感的反叛。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传统社群的解体、社会规范的变迁和人口的流动。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机遇、更加多元和包容的新世界。但对于另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曾经处于文化主导地位的群体，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脚下大地在移动的世界。他们感觉自己的价值观被边缘化，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甚至在自己的家园里变成了“陌生人”。民粹主义的文化叙事，无论是捍卫民族身份、宗教传统，还是嘲笑“政治正确”，其核心都是对这种文化失落感的强烈回应。它承诺要在一个流动、碎片化的世界里，重建一个稳固的、想象中的“我们”，一个纯洁的、有边界的“部落”。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这场反叛是对政治现代性模式的无力感的反叛。战后建立的代议制民主和官僚体系，本应是调节社会矛盾、回应民众诉求的机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许多国家变得僵化、迟钝、腐败，并与民众日益脱节。当主流政党面目模糊，当政治阶层自我封闭，当“旋转门”成为常态，普通民众感觉自己的声音被淹没，自己的选票毫无意义。政治，在他们眼中，不再是实现公共福祉的

工具，而是一场由精英阶层上演的、与己无关的权力游戏。民粹主义的政治叙事，其核心正是对这种“政治失灵”的致命一击。它承诺要“排干沼泽”、“将权力还给人民”，用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意志，来取代那个看似坚不可摧却早已失去灵魂的“体制”。

因此，民粹主义并非一场无理取闹的风暴，它是对自由民主秩序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维度上同时出现的“系统性故障”的一次总回应。它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将这些深刻的不满——经济上的被剥夺感、文化上的被取代感、政治上的被无视感——巧妙地编织进同一个宏大叙事之中，并为这一切问题，都指向了同一个简单的敌人：那个腐败、自私、卖国的“精英”。

12.7 未来框架：排他性民粹主义 vs. 包容性民主

理解了民粹主义的根源与运作逻辑，我们便能更清晰地看清未来的政治图景。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结束时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显然已经终结了。历史并未终结于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而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加复杂和动荡的阶段。我们或许可以说，21 世纪的核心政治冲突，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左翼与右翼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一场更为根本的斗争：**排他性的民粹主义 (Exclusive Populism) 与复兴的、包容性的民主 (Inclusive Democracy)** 之间的斗争。

排他性的民粹主义，无论其外在形式是左是右，其内

核都是一致的。它将“人民”定义为一个同质化的、排他的群体，这个群体通常基于特定的民族、种族、宗教或阶级身份。它通过树立“内部敌人”和“外部威胁”来巩固团结，将政治简化为一场“我们 vs 他们”的零和博弈。它倾向于将权力集中于一位魅力型领袖之手，这位领袖宣称自己是“人民意志”的唯一化身。它不信任、甚至敌视那些制约权力的独立机构，如法院、媒体和专家。它诉诸情感、直觉和怀旧，而非理性、证据和妥协。它的最终愿景，是一个边界清晰、内部纯洁、由强人意志主导的封闭共同体。

而与之对立的，必须是一种复兴的、包容性的民主。它之所以需要“复兴”，是因为旧有的民主模式显然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当前的挑战。这种新生的民主，必须具备以下特征：

- 承认并回应真实的不满：它不能再对全球化和文化变迁带来的负面影响视而不见，必须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解决经济不平等、区域发展失衡和公共服务缺失等问题。它必须证明，一个开放的社会，同样可以为所有成员提供安全感和尊严。
- 重新定义“我们”：它必须用一个多元、开放、基于共同公民身份和普世价值的“我们”，来对抗民粹主义那个狭隘的、基于血缘或信仰的“我们”。它必须捍卫少数群体的权利，将多样性视为社会活力的源泉，而非威胁。
- 捍卫并革新民主制度：它必须坚决捍卫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等民主的“防火墙”，同时也要对

12.8 致读者：在破碎的镜子前，成为一个清醒的参与者¹⁶⁵

这些制度进行改革，使其更具回应性、透明度和公信力。它需要探索新的公民参与模式，让民众感觉自己是政治进程的真正参与者，而非旁观者。

- 拥抱复杂性与妥协：它必须有勇气告诉民众，世界是复杂的，没有简单的答案，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它必须重建对专业知识和理性辩论的尊重，并将政治重新定义为一门寻求共识、达成妥协的艺术，而非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 提供一个面向未来的愿景：它不能仅仅是防御，更需要进攻。它必须用一个充满希望的、面向未来的、关于共同繁荣和人类合作的积极愿景，来对抗民粹主义那套基于恐惧、愤怒和怀旧的消极叙事。

这场斗争，将在世界各国的议会、法庭、媒体、街头和每一个家庭的餐桌上展开。它的结果，并非命中注定。权力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作为公民、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如何选择，如何行动。

12.8 致读者：在破碎的镜子前，成为一个清醒的参与者

在本书的第九章，我们曾用一个“破碎的镜子”来比喻民粹主义对共享现实的侵蚀。当社会的镜子被砸碎，每一个部落都只愿相信自己手中的那块碎片时，对话便宣告死亡。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该如何自处？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本书无意提供简单的预测或宿命的论断，更不想开出一张包治百病的“药方”。因为真正的解药，不存在于任何一本著作里，而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与行动之中。本书的最终目的，是希望为亲爱的读者们，提供一套理解我们这个动荡时代的思想工具，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在捍卫民主价值时更清醒、更有效的参与者。

成为一个清醒的参与者，首先意味着要学会识别“剧本”。当一位政治人物开始将世界划分为“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当他将所有批评者都斥为“人民的敌人”，当他承诺用简单的方案解决所有复杂的问题时，我们脑中的警铃就应该响起。无论他的言辞多么动人，无论他来自左翼还是右翼，我们都应该意识到，这套民粹主义的剧本正在上演。识别它，是抵御其情感操纵的第一步。

成为一个清醒的参与者，其次意味着要培养“智识上的同理心”。这要求我们走出自己的“信息茧房”和“同温层”，去努力理解那些与我们持不同政见者的真实处境和感受。我们不必认同他们选择的政治解决方案，但我们必须尝试去理解他们为何感到愤怒、恐惧和被背叛。简单地将他们标签化为“坏人”，只会加剧分裂。唯有理解了不满的根源，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弥合分歧的桥梁。

成为一个清醒的参与者，还意味着要成为“真相”的守护者。在这个“后真相”时代，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这意味着我们要主动寻求和支持那些专业、独立、有公信力的新闻来源；意味着我们要对社交媒体上那些耸人听闻、激发强烈情绪的信息保持警惕；意味着我们要有勇气在自己的社交圈里，反驳那些明显的谎言和阴

12.8 致读者：在破碎的镜子前，成为一个清醒的参与者167

谋论。守护共享的现实基础，就是守护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共同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最后，成为一个清醒的参与者，意味着要将信念付诸行动。民主不是一场可以隔岸观火的体育比赛，它是一项需要亲身参与的实践。这种参与，可以是在选举中投下理性的一票，可以是关注并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可以是支持那些捍卫法治和人权的公民组织，也可以是仅仅在日常生活中，与不同观点的人进行一次尊重的、有建设性的对话。每一次微小的行动，都是在为那个破碎的镜子，重新注入黏合剂；每一次理性的发声，都是在为那个喧嚣的世界，增加一丝清明的回响。

民粹主义的崛起，是对自由民主的一次严峻的压力测试。它暴露了我们现有体系的脆弱与不足，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民主的真正含义。历史的钟摆不会停歇，权力的脸谱也将不断变换。但未来并非不可捉摸的命运，它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所共同塑造的。当“群众的怒吼”试图撕裂社会时，我们必须用“公民的低语”和“抵抗的呐喊”，用理性的坚韧和行动的勇气，去重新缝合信任，重建共识，共同守护并塑造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公正、也更加真实的民主未来。

这，便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挑战，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无可推卸的责任。

附录

12.9 术语解释 (Glossary)

本部分收录了本书中提及的核心概念和术语，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民粹主义及其相关现象。

- **民粹主义 (Populism)**: 一种政治逻辑或政治风格，其核心是将社会想象成两个同质化且相互对抗的阵营：“纯洁的、统一的人民”与“腐败的、自私的精英”之间的道德斗争。民粹主义者将自己定位为“人民”的唯一真实代表。
- **纯洁的、统一的人民 (The Pure, Unified People)**: 民粹主义叙事中被描绘为勤劳善良、拥有常识、代表国家真正意志和核心价值的沉默大多数。
- **腐败的、自私的精英 (The Corrupt, Selfish Elite)**: 民粹主义叙事中被指责为脱离群众、道德败坏、滥用权力、只顾自身利益，甚至与外国势力勾结的群体。

- **经济民粹主义 (Economic Populism)**: 民粹主义与左翼议程结合时的一种表现形式, 通常将“人民”定义为经济弱势群体, 将“精英”定义为大资本家、金融寡头等, 强调财富再分配和经济正义。
-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Nationalist Populism)**: 民粹主义与右翼议程结合时的一种表现形式, 通常将“人民”定义为特定民族、种族或文化群体的“土著”成员, 将“精英”定义为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纵容移民的“世界主义者”, 强调国家主权和传统文化。
- **文化民粹主义 (Cultural Populism)**: 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类似, 侧重于捍卫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 对抗被视为外来或“自由派精英”强加的文化变迁。
-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过程, 本书探讨了其带来的经济和文化后果, 以及如何成为民粹主义兴起的背景。
- **历史的终结 (End of History)**: 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理论, 认为人类历史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结束, 自由民主制与市场经济取得了最终胜利。本书认为民粹主义的兴起反驳了这一论断。
- **铁锈地带 (Rust Belt)**: 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 曾是传统工业中心, 因去工业化而衰落, 成为民粹主义的重要票仓。

- **去工业化 (Deindustrialization)**: 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衰退, 生产外迁至劳动力成本更低地区的过程, 导致大量蓝领工人失业。
- **自动化焦虑 (Automation Anxiety)**: 技术进步 (如机器人、人工智能) 取代重复性劳动岗位, 导致工人对失业和技能贬值的担忧。
- **中产阶级困境 (Middle-class Predicament)**: 中产阶级实际收入停滞不前, 生活成本 (如房价、教育、医疗) 上涨, 向上流动阶梯受阻的普遍压力。
- **2008 年金融危机 (2008 Financial Crisis)**: 源自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被视为彻底击垮普通民众对现有经济和政治体制信任的关键事件。
- **大置换 (Le Grand Remplacement)**: 法国极右翼作家雷诺·加缪提出的阴谋论, 声称欧洲白人基督徒人口正被非欧洲移民系统性“置换”。
- **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 指在言行上避免冒犯或歧视特定群体, 民粹主义者常将其视为“自由派精英”压制言论自由的工具。
- **想象的共同体 (Imagined Community)**: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概念, 指民族是人们在心理上构建的、共享身份认同的群体, 民粹主义常利用对“黄金时代”的怀旧来强化这种想象。
- **故土的陌生人 (Stranger in Their Own Land)**: 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提出的概念, 指一些群体 (如

美国白人蓝领) 感觉在自己的国家中, 因人口结构、社会规范变化而变得边缘化、不被理解。

- **第三条道路 (Third Way):** 20 世纪末西方中左翼政党 (如英国工党、美国民主党) 试图在传统左右翼之间找到平衡的政治路线, 拥抱全球化和市场经济, 同时强调社会公平。
- **政治阶层 (Political Class):** 指政治职业化后, 形成的一个与普通民众生活渐行渐远、自我封闭的精英群体。
- **旋转门 (Revolving Door):** 政府官员卸任后迅速进入其曾监管的大公司或金融机构担任高薪职位的现象, 常引发利益冲突质疑。
- **净手运动 (Mani Pulite):** 20 世纪 90 年代初意大利大规模反腐调查, 彻底摧毁了该国战后建立的政党体系。
- **五星运动 (MoVimento 5 Stelle):** 意大利一个由喜剧演员创立的激进民粹主义政党, 以“反政治”和“把他们送回家”为口号。
- **洗车行动 (Operação Lava Jato):** 巴西大规模反腐调查, 揭露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Petrobras) 的腐败网络, 为博索纳罗上台铺平道路。
- **非自由民主 (Illiberal Democracy):** 一种看似保留民主形式 (如选举), 但实质上侵蚀民主内核 (如司法

独立、媒体自由、公民社会) 的统治模式, 以匈牙利欧尔班政府为典型。

系统性“捕获”国家机器 (Systemic Capture of State Institutions): 指民粹主义政府通过修改法律、安插亲信等手段, 逐步控制和削弱国家关键机构(如法院、媒体、选举委员会) 的独立性。

- **主导文化 (Leitkultur):** 德国选择党 (AfD) 提出的概念, 指以基督教传统、德语、德国历史和特定社会规范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 用于排斥外来文化。
- **禁毒战争 (War on Drugs):**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发起的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行动, 伴随着大量法外处决, 体现了强人救世主模式的铁腕手段。
- **印度教特性 (Hindutva):** 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主张印度是一个印度教国家, 莫迪政府以此为基础推行政策。
- **卖茶人 (Chaiwala):** 印度总理莫迪的自称, 强调其出身普通, 与精英形成对比, 以赢得底层民众认同。
- **政策瘫痪 (Policy Paralysis):** 政府因腐败、官僚主义或政治僵局而无法有效制定和执行政策的状态。
- **玻利瓦尔革命 (Bolivarian Revolution):**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发起的政治运动, 旨在实现“21 世纪社会主义”, 强调反帝国主义和财富再分配。

- **玻利瓦尔任务 (Misiones Bolivarianas)**: 查韦斯政府利用石油收入推行的大规模社会福利计划, 如免费医疗、扫盲等。
- **21 世纪社会主义 (21st Century Socialism)**: 查韦斯提出的政治经济模式, 旨在超越传统社会主义, 通过国家控制关键资源和大规模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公平。
- **第四次转型 (La Cuarta Transformación)**: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提出的执政理念, 旨在根除腐败、重塑国家, 被视为左翼民粹主义的 2.0 版。
- **权力黑手党 (La Mafia del Poder)**: 洛佩斯·奥夫拉多尔用来指代墨西哥腐败的传统政治和经济精英的术语。
- **假新闻 (Fake News)**: 民粹主义领袖用来攻击任何对其不利报道的标签, 旨在摧毁主流媒体的公信力。
- **人民的敌人 (Enemy of the People)**: 民粹主义领袖用来指责批评者 (尤其是媒体) 的煽动性词语, 将政治分歧道德化为正邪之战。
- **深层政府 (Deep State)**: 阴谋论中指称的、由非民选官员 (如情报人员、官僚) 组成的秘密网络, 被认为在幕后操纵政府, 阻碍 “人民意志”。
- **匿名者 Q (QAnon)**: 美国极右翼阴谋论, 声称世界被一个由信奉撒旦的恋童癖组成的 “深层政府” 阴谋集团所统治, 特朗普是来拯救世界的救世主。

- **信息茧房 (Information Cocoon / Filter Bubble)**: 指人们在网络上因算法推荐而只接触到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 导致视野狭窄、难以接触不同观点。
- **认知失调 (Cognitive Dissonance)**: 当个体持有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或行为时, 所体验到的心理不适感, 常导致个体拒绝与自身观点相悖的信息。
- **动机性推理 (Motivated Reasoning)**: 个体在处理信息时, 倾向于以支持自己已有信念或偏见的方式进行推理, 而非客观分析。
- **政治极化 (Political Polarization)**: 社会成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日益扩大, 中间地带萎缩, 不同政治阵营之间敌对情绪加剧的现象。
- **回音室效应 (Echo Chamber Effect)**: 与信息茧房类似, 指人们在社交媒体等环境中, 只听到与自己观点相似的声音, 强化原有信念, 难以接触不同意见。
- **本国优先 (Our Country First / America First)**: 民粹主义内向的国际政策观, 将狭隘的国家利益置于一切之上, 对国际合作持怀疑甚至敌视态度。
- **多边主义 (Multilateralism)**: 通过多方协商、共同制定规则、集体行动来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原则。

- **卫生隔离带 (Cordon Sanitaire)**: 主流政党之间达成共识, 拒绝与被视为极端的民粹主义政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合作的策略。
- **防火墙 (Brandmauer)**: 德国主流政党用来形容拒绝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AfD) 合作的“卫生隔离带”策略。
- **议题吸纳 (Issue Co-optation)**: 主流政党主动采纳一部分民粹主义政党的核心主张, 以争取其支持者的策略。
- **另类愿景 (Alternative Vision)**: 主流政治力量提出一个全新的、积极的、面向未来的替代愿景, 以对抗民粹主义者那套基于怀旧、愤怒和恐惧的叙事。
- **草根社会运动 (Grassroots Social Movements)**: 由普通公民自发组织、自下而上发起的社会行动, 常用于对抗民粹主义政府的政策或价值观。
- **女性大游行 (Women's March)**: 2017 年在美国及全球范围内发起的, 抗议特朗普性别歧视言论和排外政策的大规模游行。
- **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 BLM)**: 源于美国对警察暴力和系统性种族歧视的抗议, 后演变为全球性社会运动。
- **气候罢课 (Fridays for Future)**: 由青年学生发起的全球性气候行动, 要求政府采取紧急气候行动。

- **反抗灭绝 (Extinction Rebellion)**: 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策略, 旨在迫使政府正视气候危机的环保运动。
- **调查报道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记者通过深入挖掘、揭露权力滥用和不法行为的新闻报道形式, 是守护真相的重要力量。
- **事实核查 (Fact-checking)**: 对政治人物言论、社交媒体谣言等进行核查, 辨别真伪, 对抗虚假信息的活动。
- **司法制衡 (Judicial Checks and Balances)**: 独立的司法系统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和限制, 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 **选举反弹 (Electoral Backlash)**: 选民通过投票拒绝或推翻民粹主义统治的现象。
- **官僚体系的抵抗 (Bureaucratic Resistance)**: 专业的公务员和技术官僚在面对政治压力时, 坚守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 抵制政治化的行为。
- **排他性的民粹主义 (Exclusive Populism)**: 将“人民”定义为同质化的、排他的群体, 通过树立“内部敌人”和“外部威胁”来巩固团结的民粹主义形式。
- **包容性的民主 (Inclusive Democracy)**: 一种复兴的民主模式, 承认并回应真实的不满, 用多元、开放、基于共同公民身份和普世价值的“我们”来对抗排他性, 并捍卫和革新民主制度。

12.10 建议阅读书目 (Suggested Readings)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关于民粹主义、政治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领域的著作与研究。以下列出一些与本书主题紧密相关、有助于读者进一步深入了解的经典及当代作品。请注意，本书正文并未采用严格的学术引用格式，此列表旨在提供延伸阅读的指引。

- 关于民粹主义的理论与概念：

- Mudde, Cas,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民粹主义的入门读物, 清晰界定概念)
- Jan-Werner Müller. *What Is Populis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深入探讨民粹主义的道德主张和反多元主义倾向)
- Laclau, Ernesto. *On Populist Reason*. Verso, 2005. (从后结构主义角度分析民粹主义的理论基础)

- 关于全球化与经济不满：

- Rodrik, Dani.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W. W. Norton & Company, 2011. (探讨全球化、民主和国家主权之间的三难困境)

- Milanovic, Branko. *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分析全球收入不平等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 关于身份与文化焦虑:

-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The New Press, 2016. (对美国茶党支持者深入的民族志研究, 理解文化和情感驱动的政治)
- Fukuyama, Francis.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探讨身份政治的兴起及其对自由民主的挑战)

- 关于主流政治失灵:

- Mounk, Yascha. *The People vs. Democracy: Why Our Freedom Is in Danger and How to Save I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分析自由民主的“脱钩”现象, 即自由与民主原则的分离)
- Levitsky, Steven, and Daniel Ziblatt. *How Democracies Die*. Crown, 2018. (探讨民主如何通过看似合法的手段被侵蚀, 而非军事政变)

- 关于特定国家案例:

- Vance, J. D. *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 Harper, 2016. (从个人视角描绘美国锈带地区的社会经济困境)
- Ressa, Maria. *How to Stand Up to a Dictator: The Fight for Our Future*. Harper, 2022. (菲律宾记者玛丽亚·雷萨对抗杜特尔特政府的亲身经历)
- Snyder, Timothy. *The Road to Unfreedom: Russia, Europe, America*. Tim Duggan Books, 2018. (探讨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欧洲和美国的影响)
- 关于“后真相”与信息环境：
 - McIntyre, Lee. *Post-Truth*. The MIT Press, 2018. (分析“后真相”现象及其对民主的威胁)
 - Pariser, Eli.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Penguin Press, 2011. (解释“信息茧房”的形成及其对信息获取的影响)
- 关于民主的韧性与应对：
 - Putnam, Robert 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Simon & Schuster, 2000. (探讨社会资本的衰退及其对民主的影响)
 - Diamond, Larry. *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12.10 建议阅读书目 (*SUGGESTED READINGS*) 181

American Complacency. Penguin Press, 2019.

(分析全球民主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